

目 錄

與會指引及議事規則	3
院區地圖	7
議程總表	9
各場次議題簡介與論文摘要	
1.1 清代八旗士人的學識構造與認同建構：從理學詮釋、經典閱讀到歷史敘事	15
1.2 清帝國的地域、經濟、物與物質文化	19
1.3 當經濟超越邊界	23
1.4 操作與轉化：清代制度的多重實踐	28
1.5 跨越文獻與實踐：民間文獻視角下東亞基層組織的秩序建構與整合機制	33
1.6 紙上的社會：明清民間文書映照的日常與秩序	38
1.7 治理的技藝：明清的地方運作、資源調配與知識實踐	43
1.8 從糧價到觀音：明清社會的制度治理、禮制實踐與信仰能量	48
1.9 鳥獸臣民：清帝國統治結構中的動物參與	55
1.10 亂世之前：十九世紀初的清代財政軍事創新及其流動	60
1.11 邊疆與帝國：清代的文化認同與治理策略	66
1.12 從戶役到民變：明清政制職能、社會治理與歷史意識	71
2.1 明清博戲文化的媒介特性、話語形構與社會想像	79
2.2 Networks, Narratives, and Negotiations: Missiona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85
2.3 文本・圖像・遊觀：明清女性的身體展演與媒介實踐	90
2.4 物質與體驗：明清文本中的技術與感官	95
2.5 文字、聲音與身體：明清戲曲的多媒介互動	100
2.6 形塑文學：明清文本內外的物質性與知識實踐	105
2.7 明清理學的實踐精神	110
2.8 圖志・植物・醫書：自然書寫、知識航程與健康實踐	114
2.9 明清家鄉禮的文本、論辯與實踐	121
2.10 輯古・考禮・釋經——清代「漢學」視域下《春秋》三《傳》的詮釋途徑	128
2.11 晚清文學中的跨域行旅與文化轉譯	130
2.12 在裂變中救贖：清代民國詩文的倫理、身體與焦慮	135

3.1 地氣的接通：明清的地方性知識體系與帝國基層治理	143
3.2 地景・奇觀：近世東(南)亞的地理文本與知識環流	148
3.3 明清大眾識字與女性識字	153
3.4 明清士人融貫幽明的倫理與治理	157
3.5 明清文化與韓國繪畫的連動	161
3.6 衝突與交融：晚清藝術在全球現代性構築中的角色	166
3.7 Entangled Landscapes: Rethinking Ming Art through Eco Art History	172
3.8 帝國邊界的文化實作：轉譯詮釋、跨界協商、族群想像	178
3.9 明代史學的再評價：以國朝史編纂為中心	185
3.10 捏碑修史：清代金石學典範的建立與中心轉移	189
3.11 瓷韻畫聲：東亞近代藝術物質與視覺文化的跨境詮釋	194
3.12 書籍、日記與碑刻：知識生產與社會擴散	199
4.1 東亞海域「界」的探索：15-19世紀的跨域互動	207
4.2 東亞跨文化視野中的知識、文學與社會實踐：交換、流動與轉型	209
4.3 近世東亞佛教之區域文化與社會：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216
4.4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840-1885.....	219
4.5 朝鮮史視角下的明清重構：理解帝國的另一種方式	225
4.6 身體作為超凡的象徵與據點：明清醫學實踐中的宗教面向	234
4.7 「國」文脈的形成：近世東亞複數文脈的重編與創生	238
4.8 海洋知識與邊疆視野：明清臺閩政治、文化與視覺實踐	243
4.9 近代東亞經世致用思想的裂變、重構與知識論述	250
4.10 聖俗合流：清季以來四川的學術、宗教思想與社會變遷之調	256
4.11 古跡新尋：運用數位人文與機器學習研究明清大型資料集	261
4.12 明清思想文化研究的數字化轉型：方法創新與多維整合探索	266
與會名單	269
籌備委員會與工作人員	283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指引及議事規則

與會指引及議事規則 (guidelines for attendees 1)

一、議程、會議論文、報到

(一) 議程安排是實體會議為主、視訊與會為輔。議程請見：

https://mingqing.sinica.edu.tw/conference/2025/2025CF_agenda.html

(二) 視訊會議僅限需以視訊與會的海外學者及場次，並不全程開放。大會視訊軟體為 **Google Meet**。視訊會議連結，另以 Email 個別通知。

(三) 論文發表學者請注意，因會議場地環境設定之故，發表人的簡報檔案格式，限定為 PPT 與 PDF。

(四) 會議論文 PDF 檔只對議程學者（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開放，將於 12 月 8 日 pm 12 時起開放，入口網址如下：

https://mingqing.sinica.edu.tw/conference/2025/2025CF_agenda.html

密碼另行發信通知，請尊重發表人智慧財產權。

所有會議論文保留至 12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台北時間）即清除，請自行下載或線上瀏覽，大會不會向全體與會學者寄送 PDF 檔。

※※※未經作者許可，請勿流傳論文，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

(四) 會議報到處為中央研究院人文館三樓大廳右側，請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

1. 報到時，請告知工作人員您的與會學者名單編號，可加快報到時間。

您會收到會議手冊、每日餐卷、晚宴邀請函。並受理：

2. 支付出席費、生活費，請您同時提交收據、護照影本等相關資料；

3. 收取事先代墊的入臺證簽證費 600 元。

(五) 餐飲：請自備容器、餐具，現場不提供茶杯。食物珍貴，請協助愛惜。午餐與晚宴，於人文館四樓交誼廳舉辦，請遵循工作人員引導前往晚宴會場。

二、視訊軟體與預錄報告檔格式

視訊發表學者，請注意以下各點：

(一) 大會視訊軟體為 **Google Meet**。

(二) **Google Meet** 預設的電子郵件信箱，為您報名時提供給大會者。

(三) 因視訊環境設定之故，發表人分享的簡報檔案格式，限定為 PPT 與 PDF。

三、預錄簡報影片

(一) 遠距視訊與會的論文發表人，亦可在 12/5 前提交影音視訊檔，限 mp4

格式，15 分鐘以內。

- (二) 一旦發表人因網路連線有問題或中斷時（超過 60 秒內無回應），大會視訊組將改為播放您的預錄檔案，取代口頭發表。恢復網路連線後，發言權順延至綜合問答時間。

四、議事規則

- (一) 會議進行方式：

1. 會議開始前 2 分鐘響鈴，請所有與會者入席會議室。
2. 論文組 (panel) 場次：四位發表者共 **100** 分鐘：
發表 60 分鐘（每位發表人 15 分鐘*4）+評論 20 分鐘+綜合問答 20 分鐘
3. 個別組 (individual) 場次：五位發表者共 **100** 分鐘：
 - A. 五位發表者共 100 分鐘：
發表 75 分鐘（每篇論文 15 分鐘*5）+綜合問答 25 分鐘（不安排評論人）
 - B. 六位發表者場次，共 120 分鐘：
發表 90 分鐘（每篇論文 15 分鐘*5）+綜合問答 30 分鐘（不安排評論人）
4. 發表人：第 13 分鐘按一聲響鈴提醒，第 15 分鐘按兩聲響鈴提醒時間已到，此後每隔 1 分鐘按一聲響鈴。
5. 評論人：時間已到按一聲響鈴提醒。
6. 綜合問答時間，請發言人先自述姓名及服務單位，發言以 2 分鐘為限。不提供線上提問。

- (二) 會議場地使用 3C 設備準則

1. 請自備可上網之 3C 設備，並請開啟靜音模式。
2. 會議場地無線網路頻寬有限，請自備 4G 網路服務。

五、網路報名學者報到指引

- (一) 網路報名學者名單，請密切留意大會網頁：

https://mingqing.sinica.edu.tw/conference/2025/2025CF_participants.html

- (二) 報到：為加速報到時間，與會報到時請提供您的序號。簽到後領取會議資料、當日餐卷即可入座。

- (三) 使用視訊設備準則，請見四- (二)。

- (四) 用餐區：請自備容器、餐具，現場不提供茶杯。茶敘時間請遵守工作人員動線指示。未持有晚宴邀請函者請勿進入晚宴會場。

六、智慧財產權聲明

為尊重發表人之智慧財產權，請勿在未經主辦單位許可下，於會場或視訊會議室使用任何錄音錄影之設備，將發表人之會議資料進行轉錄、側錄及散佈。亦請勿外流論文全文。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敬上

2025 OPEN HOUSE

實體活動場館 / 單位一覽 Activity Venues

◆ 為同時辦理院區開放及兒童科普日活動之單位

生命科學組 Division of Life Sciences

- 2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 4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 5 分子生物研究所
- 6 生物化學研究所
- 8.2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 9 生態時代館
- 12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 18 基因體研究中心
- 19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 27 新溫室大樓
- 62.1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C棟)

數理科學組 Division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 8.1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 13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 15 統計科學研究所
- 22 地球科學研究所
- 28.1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 28.2 永續科學中心
- 30 化學研究所
- 32 資訊科學研究所
- 33 物理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21 中國文哲研究所
- 3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34 胡適紀念館
- 36 歐美研究所
- 37 歷史語言研究所
- 47 歷史文物陳列館
- 37.2 數位文化中心
- 38 傅斯年圖書館
- 39 經濟研究所
- 40 民族學研究所
- 40.1 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 42 近史所檔案館
- 43 臺灣考古館
- 17 生態池
- 20 人文社會科學館
- 41 嶺南美術館
- 62 環境教育中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F棟1樓)

活動資訊



院本部



數理科學組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202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

時間	12月10日(三)				
08:30-09:00	報到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3樓			
09:00-09:10	開幕式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館 3 樓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開幕致辭人：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場地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遠距會議室	臺灣史研究所 802 會議室
9:20-11:00	第一場	1-1 清代八旗土人的學識構造與認同建構：從理學詮釋、經典閱讀到歷史敘事 主持：王汎森 發表：朴敏洙 (Min-Su PARK)、蔡名哲、葉詩詩 評論：王汎森、賴惠敏	2-1 明清博戲文化的媒介特性、話語形構與社會想像 主持：Tina Lu (呂立亭) 發表：楊婷、楊中薇、Zach Berge-Becker、張一帆 評論：Tina Lu (呂立亭)	3-1 地氣的接通：明清的地方性知識體系與帝國基層治理 主持：巫仁恕 發表：江豐兆、蔡仲岳、齊汝萱、曾双秀 評論：何淑宜、謝仁晏	4-1 東亞海域「界」的探索：15-19世紀的跨域互動 主持：陳國棟 發表：廖子萱、鄭竣元、楊雅蓉 評論：陳國棟
11:00-11:20	茶敘				
11:20-13:00	第二場	1-2 清帝國的地域、經濟、物與物質文化 主持：王鴻泰 發表：陳丹丹、張樂翔 (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 評論：賴毓芝	2-2 Networks, Narratives, and Negotiations: Missiona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主持：李奭學 發表：朱雯琪、許維萍、吳曉芳 評論：互評	3-2 地景・奇觀：近世東(南)亞的地理文本與知識環流 主持：陳建守 發表：毛文芳、申正秀、徐小潔、郭勘 評論：陳建守、郭勘	4-2 東亞跨文化視野中的知識、文學與社會實踐：交換、流動與轉型 主持：劉苑如 發表：周敘琪、崔文東、James Masaki Fujitani、Nguyễn Thanh Tùng (阮青松) & Trinh Thuỷ Dương (鄭垂楊)、NGUYEN TIEN LAP (阮進立)、NGUYEN QUOC SINH (阮國生) [*本場次時間為 11:20-13:20]
13:00-14:20	午餐				
14:20-16:00	第三場	1-3 當經濟超越邊界 主持：賴惠敏 發表：李典蓉*、許富翔、郭至汶、賴惠敏 評論：李典蓉*、許富翔	2-3 文本・圖像・遊觀：明清女性的身體展演與媒介實踐 主持：胡曉真 發表：唐雨薇、王藝霏、陳子悅、徐雅容 評論：胡曉真	3-3 明清大眾識字與女性識字 主持：衣若蘭 發表：李紀、徐寧*、溫海波 評論：衣若蘭、李仁淵	4-3 近世東亞佛教之區域文化與社會：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主持：陳玉女 發表：徐維里、劉瑋、吳瑾暉* 評論：徐維里、劉瑋
16:00-16:20	茶敘				
16:20-18:00	第四場	1-4 操作與轉化：清代制度的多重實踐 主持：陳熙遠 發表：蔡松穎、吳昌峻、王士銘、謝仁晏 評論：互評	2-4 物質與體驗：明清文本中的技術與感官 主持：劉瓊云 發表：陳柏言、鄭博元、曹鈞傑、吳佳鴻	3-4 明清士人融貫幽明的倫理與治理 主持：賀廣如 發表：呂妙芬、呂柏勳、林峻輝	4-4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840-1885 主持：劉序楓 發表：Trần Thị Xuân (陳氏春)、多賀良寬 (TAGA Yoshihiro)、吉川和希

			評論：劉柏正	評論：賀廣如	(YOSHIKAWA Kazuki) 評論：杭行
18:00-20:00	晚宴				
時間	12月11日(四)				
9:00- 10:40	第五場	1-5 跨越文獻與實踐：民間文獻視角下東亞基層組織的秩序建構與整合機制 主持：Michael Szonyi (宋怡明)* 發表：董思思*、羅臻輝、劉怡青、李朝凱 評論：互評	2-5 文字、聲音與身體：明清戲曲的多媒介互動 主持：王鴻泰 發表：盛亦惠、邱嘉耀、王爾馨、汪一舟 評論：蕭麗玲	3-5 明清文化與韓國繪畫的運動 主持：高蓮姬 (Kho, Younhee) 發表：朴慧美 (Park, Haemi)、周鶴群、元勢進 (Won, Sejin)、高蓮姬&李東攀 (Lee, Dongkook) 評論：高蓮姬	4-5 朝鮮史視角下的明清重構：理解帝國的另一種方式 主持：李在璟 (Lee, Jaekyung) 發表：李在璟 (Lee, Jaekyung)、黃慧智 (Hwang, Hyeji)、鄭相元 (Jung, Sangwon)、徐源翊 (Seo, Wonik) 評論：金雄鶴
10:40- 11:00	茶敘				
11:00- 12:40	第六場	1-6 紙上的社會：明清民間文書映照的日常與秩序 主持：邱澎生 發表：朴贊根 (Park, Changuen)、李承洙 (Lee, Seungsu)、瞿見*、鄭相浩 (Jeong, Sangho) 評論：李承洙、邱澎生、瞿見*、鄭相浩	2-6 形塑文學：明清文本內外的物質性與知識實踐 主持：許暉林 發表：黃康妮*、李昊玥*、曹競藝*、廖晏穎 評論：許暉林	3-6 衝突與交融：晚清藝術在全球現代性構築中的角色 主持：Caitlin Karyadi 發表：黃悅行、樊夢瑩、問曉敏、朱文祺 評論：Caitlin Karyadi	4-6 身體作為超凡的象徵與據點：明清醫學實踐中的宗教面向 主持：陳秀芬 發表：吳靜芳、劉世珣、Gessler Elena (高蓮安) 評論：陳秀芬
12:40- 14:00	午餐				
14:00- 15:40	第七場	1-7 治理的技藝：明清的地方運作、資源調配與知識實踐 主持：唐立宗 發表：謝忠志、李華彥、余璐*、連超 評論：互評	2-7 明清理學的實踐精神 主持：林月惠 發表：黃奕臻、Immanuel Spaar (石善也)、陳騰 評論：林月惠	3-7 Entangled Landscapes: Rethinking Ming Art through Eco Art History 主持：Henning von Mirbach (米翰寧) 發表：Henning von Mirbach、高瑞迎、Yeohoon Choi、莊鎮元* 評論：互評	4-7 「國」文脈的形成：近世東亞複數文脈的重編與創生 主持：葉宇軒 發表：葉宇軒、Zahid Daudjee、飛田英伸 (TOBITA Hidenobu)、林芳如 評論：齋藤希史*
15:40- 16:00	茶敘				
16:00- 18:00	第八場	1-8 從糧價到觀音：明清社會的制度治理、禮制實踐與信仰能量 主持：巫仁恕 發表：賴建誠&高志祥、盧樹鑫、楊煦、金蕙涵、林和君、Qijun Zheng (鄭麒駿)	2-8 圖志·植物·醫書：自然書寫、知識航程與健康實踐 主持：呂妙芬 發表：吳挺誌、張閏熙、胡中原、梁樹風、羅淳滄、Francis Newman (牛法鑫)	3-8 帝國邊界的文化實作：轉譯詮釋、跨界協商、族群想像 主持：孔令偉 發表：柳雨青、李剛、王永曦、王薈、松尾健司 (MATSUO Kenji)、關文昊 (Wenhai Guan)	4-8 海洋知識與邊疆視野：明清臺閩政治、文化與視覺實踐 主持：林正慧 發表：王建國、陳偉智*、牟立邦、黃宥惟、王威

時間	12月12日(五)					
9:00- 10:40	第九場	1-9 鳥獸臣民：清帝國統治結構中的動物參與 主持：李爾岑* 發表：梁鈺若*、時舒陽、王敬雅*、裴嘯山 評論：賴毓芝、賈建飛*	2-9 明清家鄉禮的文本、論辯與實踐 主持：林素英 發表：莊民敬、鄭雯馨、黃羽璿、劉柏宏 評論：林素英	3-9 明代史學的再評價：以國朝史編纂為中心 主持：王鴻泰 發表：Peter Ditmanson (戴彼得)、何幸真、黃聖修 評論：王鴻泰、Peter Ditmanson、衣若蘭	4-9 近代東亞經世致用思想的裂變、重構與知識論述 主持：林志宏 發表：施盈佑、黃麗頻、鄭栢彰、唐屹軒 評論：林志宏	
10:40- 11:00	茶敘					
11:00- 12:40	第十場	1-10 Before the Tumultuous Age: Emergence and Circ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Qing China 主持：Elisabeth Kaske (白莎) 發表：James Bonk、楊聖宇、毛瀟銳 評論：Elisabeth Kaske	2-10 輯古·考禮·釋經——清代「漢學」視域下《春秋》三《傳》的詮釋途徑 主持：劉德明 發表：張壹然、陳威睿、程雪茹 評論：張素卿	3-10 捗碑修史：清代金石學典範的建立與中心轉移 主持：楊佳玲 發表：施天宇、王晶、李子怡 評論：Lei Xue (薛磊)	4-10 聖俗合流：清季以來四川的學術、宗教思想與社會變遷之調適 主持：徐兆安 發表：林書漢、Felix Erdt (葉斐理)、魏綵瑩、延易橋 評論：徐兆安	
12:40- 14:00	午餐					
14:00- 15:40	第十一場	1-11 邊疆與帝國：清代的文化認同與治理策略 主持：蔡偉傑 發表：黃庭彰、Kevin Kind (童楷文)、Jacqueline Armijo (艾敏慧)、鍾恩瀚 (Chung Yan Hon Michael) 評論：蔡偉傑	2-11 晚清文學中的跨域行旅與文化轉譯 主持：廖肇亨 發表：羅秀美、陳室如、鄭雅尹、黃郁晴 評論：互評	3-11 瓷韻畫聲：東亞近代藝術物質與視覺文化的跨境詮釋 主持：賴毓芝 發表：林宜蓉、李招瑩、Lianming Wang (王廉明)、劉錡豫、游閔雅	4-11 古跡新尋：運用數位人文與機器學習研究明清大型資料集 主持：Paul Vierthaler (李友仁) 發表：Paul Vierthaler、Tina Lu (呂立亭)、毛元亨、席王知* 評論：互評	
15:40- 16:00	茶敘					
16:00- 17:40	第十二場	1-12 從戶役到民變：明清政制職能、社會治理與歷史意識 主持：廖小菁 發表：戎宗柳、尹敏志*、劉伊芳、阮寶玉*、王兆坤	2-12 在裂變中救贖：清代民國詩文的倫理、身體與焦慮 主持：嚴志雄 發表：張歡歡、吳志廉、葉倬璋、陳建銘 評論：互評	3-12 書籍、日記與碑刻：知識生產與社會擴散 主持：徐兆安 發表：王晴佳、徐兆安、堯育飛、羅珮瑄、丘文豪	4-12 明清思想文化研究的數字化轉型：方法創新與多維整合探索 主持：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發表：王安琪*、戰蓓蓓、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虞越 評論：Vincent Goossaert*	
17:50- 18:00	閉幕式	主持人：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備註：人名之後「*」，表示視訊與會				

第一會議室

論文組主題

1.1 清代八旗士人的學識構造與認同建構：從理學詮釋、經典閱讀到歷史敘事

議題說明

清代八旗士人作為統治階層，其知識體系與文化認同的構築方式，隱而未顯卻實為理解帝國文化政策與治理機制的關鍵。十八世紀中葉，松筠（1752-1835）編纂《百二老人語錄 Emu tanggū orin sakda-i gisun sarkiyan》一書，以滿文記載「老人回憶與教誨」的方式呈現對旗人之教育指南與文化反思，不但是少見的滿文原創作品，更是來自宮廷以外的觀點，成為探究此議題的珍貴文獻。

本小組從三個維度展開討論：首先，葉詩詩考察旗人知識分子如何將程朱理學中「性理」、「物欲」等核心觀念，轉化為切合八旗生活實踐的倫理體系；其次，蔡名哲分析旗人如何在翻譯科舉制度框架下，發展出有別於常規的滿文儒家經典學習策略，在「漢學化」與「滿洲性」間尋求平衡；最後，朴敏洙探究旗人通過歷史敘事重構「天命」概念，以及面對漢人官僚影響力擴張時的應對之道。

此三面向共同呈現了一幅多元文化交織下，八旗士人面對漢文化積累已久的文化資源與優勢，如何在文化適應與族群維繫之間作文化抉擇，藉以調適自身定位的複雜圖景。透過此研究，我們不僅能深入理解清代思想文化的多樣性，更能從新角度審視帝國認同政治與文化整合的辯證關係。

十八世紀滿洲歷史認知與正統性再建： 以《百二老人語錄》為中心

朴敏洙 (Min-Su PARK, 梨花女子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科副教授)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百二老人語錄》中關於開國、陵寢、上諭等章節的滿文史料，探討十八世紀後期清帝國統治精英的歷史認知與帝國正統性再建。研究聚焦於努爾哈赤、皇太極功績敘述中「天命」概念的運用，以及旗人官員制度變遷的敘事策略。通過對滿文原典的深入解讀，本研究將揭示清帝國如何通過歷史敘事強化統治合法性，同時應對漢人官僚影響力漸增的統治危機。此研究不僅呈現滿洲精英自我認知的複雜性，亦闡明清帝國多民族統治結構的內在邏輯，為理解清代歷史書寫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提供新視角，突顯滿文筆記類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獨特價值。

在儒學中重塑旗人的定位——《百二老人語錄》的滿文儒家經典閱讀方案

蔡名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博士級約聘人員）

摘要

滿洲人漢化與否曾是學術討論的熱點，但少有人注意到滿洲知識份子能否與如何掌握儒家經典這一關鍵問題。儒家經典雖有滿文譯本，且被列入繙譯科舉的考題，但旗人的閱讀方式為何，卻缺乏史料且鮮有討論。《百二老人語錄》一書則提供了解此問題的契機，該書不但是清代少有的滿文原創著作，作者松筠更是透過繙譯科舉得以平步青雲。該書告知旗人應如何學習滿文儒家經典，但其推薦的方案，卻並不完全同於繙譯科舉的出題範圍，也不同於當時的滿文參考書，是一種滿文學習的替代方案。本文將詳細考察與比較此方案，進而證明其是在滿漢共生的語境之中，試圖同時掌握儒家義理與滿文句式，不同於依賴字典、成語與考題指南的學習方式，是既讓試子熟悉清語也成為儒生，也反映儒雅化是作者心目中維繫旗人定位的良方。

十八世紀旗人理學管窺：以《百二老人語錄》為例

葉詩詩（Yap Sze Sze，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學界對清代學術的討論，歷來多聚焦於蔚然成風的考據學，較少論及清代理學。而東亞儒學，迄今研究碩果累累，卻未正視漢文世界以外的滿文文本。本文試圖通過探究十八世紀流傳的滿文書《百二老人語錄》與其漢文譯本，勾勒此書對程朱理學的詮釋。編者松筠（1752-1835）通過耆老述聞的方式，把旗人當學、當務之事與聖賢之道聯繫起來。本文將揭示編者如何消除理學為漢人之學，並以旗人日用事體論述「性命」、「忠孝」等概念，以及在盛清物資富饒時期與清代旗人特權的背景下，編者針對「物欲」的思考。此書雖以道聽途說自謙，亦可用來理解旗人理學。

論文組主題
1.2 清帝國的地域、經濟、物與物質文化
議題說明
<p>本小組圍繞清帝國的地域與文化建構、經濟機制、物與物質文化的延展，探討帝國如何通過地域、文化、物的流動、交換與利用，構建權力秩序與社會網路。陳丹丹的論文《“江南”在清代的漂移》聚焦作為地理與文化理念與實體的“江南”在清代的漂移，揭示地域與文化認同如何在政治語境與經濟變遷中被重新定義。林蕾的論文《邊疆之物：貢物、物質性與清朝在喜馬拉雅邊疆的朝貢關係》從物質性角度重新審視朝貢體系，強調貢物不僅是象徵，更是環境知識與政治感知的交匯點。這些邊疆之物凸顯了清廷如何通過物質實踐，進行帝國邊界的協商與再定義。張樂翔的論文《外包戰爭：康熙年間的捐納制度與軍事融資機制》深入康熙朝的捐納制度，揭示清廷如何通過以實物換取官職這樣的財政手段，調動社會資源、為征服戰爭籌資，體現出一種以“物”為媒介的權力運作邏輯。三篇論文共同展現清代的地域、文化、物的互動，如何嵌入帝國治理、財政制度與邊疆政治之中，構成一種地域/物質/權力三者交織的歷史圖景。本小組的研究亦將清帝國研究與全球史相連接，張樂翔的論文涉及戰爭、財政與軍事制度與帝國的相互形塑，林蕾的論文涉及全球史的物質轉向，陳丹丹的論文也屬於其“全球江南”研究的一部分。</p>

“江南”在清代的漂移

陳丹丹（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歷史地理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聚焦作為地理與文化理念及實體的“江南”，在清代的“漂移”。作為一種文化-空間結構，“江南”被本文視為具有複雜時間性與空間性的生成性範疇。文章通過歷史層面的時空節點追蹤，分析文化層面的符號再生產，重審“江南”如何在清代語境中從地方性文化傳統，逐步滲透進帝國中心乃至全球想像。借助德勒茲“褶皺”與“去地域化”概念，本文提出，“江南”並非一個靜態地域，而是一個可折疊、可流動的文化空間。作為帝國物質文化與知識生產的一部分，“江南”的漂移體現了清代中國內部與外部的空間再組織與認知重塑。

外包戰爭：康熙年間的捐納制度與軍事融資機制

張樂翔（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摘要

本文聚焦於清廷一項長期被學界忽視的融資方式：政府職務的出售（即捐納）在康熙時期的運作方式。在康熙與雍正年間，捐官者通常需以實物形式支付，具體繳納費用的地點則為物資或資金短缺的地區。在康熙年間，這類捐例多達十餘起，繳納要求的地點則集中於帝國的西南與西北地區。所征物資包括草料、糧食與牛馬駱駝等。向前線輸送這些物資的回報就是未來獲得文官任職機會的資格。這種“以物易職”的融資機制是清初征服戰爭中被忽視的一種稅收形式。它的靈活性不僅避免了政府財政的過度緊張，也使得朝廷利用社會的能力去調配資源。

論文組主題

1.3 當經濟超越邊界

議題說明

本組論文的主題為「當經濟超越邊界」，邊界可解釋為地理上的邊界，像中俄邊界；或者從法律上來看是合法或者非法的法制邊界。我們有四位學者報告：第一位是李典蓉副教授，報告題目「清律中東北黑龍江流域的『故縱』與『贓』」、第二位是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許富翔，報告題目「參務的制度化與皇帝的人參利益——以雍乾之際為中心的考察」、第三位是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郭至汶，報告題目「康熙朝俄商在齊齊哈爾的走私貿易」、第四位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報告題目「清代索倫部貢貂與越界獵捕」。本此報告人都是利用清代的滿漢文題本、奏摺撰寫論文，持之有據、證據確鑿。

清律中東北黑龍江流域的「故縱」與 「贓」

李典蓉（自由獨立學者）

摘要

清律中不乏針對邊界往來夾帶私物與守邊兵丁私自縱放的處罰情況。條例的制定，體現了邊疆行政區域的發展，漢人商業的拓展，以及清朝官方本身對於邊界防衛的態度變化。本文擬比對清朝法律中涉及官員兵丁涉及「故縱」行為的處罰區分，如兵律與刑律中量刑的差異。並討論黑龍江地區故縱案件中涉及的贓，其背後體現出的當地居民經濟活動問題。

參務的制度化與皇帝的人參利益—— 以雍乾之際為中心的考察

許富翔（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摘要

雍正至乾隆朝初期的參務制度與順治、康熙時期獨佔人參資源政策迥然不同，開放民眾穿越柳條邊，至東北邊疆地區採集人參，這代表人參經濟活動已超越原有封禁邊界。官方雖然讓民眾分享採參利益，但為保證皇室人參利益最大化，在參務制度上做出以下規定：其一，以歇山輪採制確保人參資源。其二，以原有參票制度控制採參人數，並規定最低採參重量。其三，招募商人促使民眾領取參票。不過，由於相關制度屬於初創，在施行過程重仍不斷調整。故本文擬探討人參經濟突破原有封禁邊界後，清朝官方對參務政策不斷調整的過程。

康熙朝俄商在齊齊哈爾的走私貿易

郭至汶（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康熙皇帝召見理藩院大臣，指出俄羅斯尼布楚城守尉以追拿逃人為藉口協同俄商進入中國邊境，名義上是辦案，但實際上是在齊齊哈爾地區從事走私貿易。為示立場，康熙皇帝命令將相關俄商帶來之貨物一律禁止交易，並以正式文書遣返，展現嚴禁邊貿走私的決心。《尼布楚條約》雖明文規定「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並許其互市」，但實際上，俄商無照進行交易者屢見不鮮，甚至出現假公務之名的走私行為。本文探討《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俄商於齊齊哈爾及其周邊地區所從事的走私貿易活動。

清代索倫部貢貂與越界獵捕

賴惠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清朝自順治年間的貢貂來自黑龍江的索倫部、達呼爾部、鄂倫春部等，清朝為有效管理貢貂事務，在黑龍江地區上游設立布特哈總管衙門蒐集毛皮。貢貂的牲丁，或因獵貂不足，遂越過額爾古納河至俄羅斯境內獵貂。故，本文討論索倫貢貂制度，以及法律審理走私和越界的案件。本文利用已出版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以及《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硃批奏摺軍機處檔摺件》。

論文組主題

1.4 操作與轉化：清代制度的多重實踐

議題說明

「制度」是體現國家治理的基本座標軸，但在實際運作中，往往隨時勢與操作者的實踐而被轉化與重構。本組從清代職官、武舉與監獄制度，展現制度如何在實務運作過程中，被轉化為適合人們需求的工具。

蔡松穎與謝仁晏關注職官制度。蔡松穎以社會網絡分析為方法，視覺化清代職官體系，透過對履歷等檔案共現紀錄（co-occurrence），觀察官員之間是否有潛在的網絡關係，進而反思以隸屬關係為核心的官制史敘述。謝仁晏從物質文化角度著眼，分析「頂戴」，如何成為清代官員的顯著象徵物，並就清宮檔案為例，指出使用者如何操作這一物件，以標誌身分差異。

王士銘和吳昌峻留意制度的在地實踐。王士銘運用多語言史料，探討清代蒙古地區的監獄建置與運作，並以此討論清律在蒙古地區的實踐情形。吳昌峻探討「武童」身分在晚清被地方官員靈活運用，從武舉制度中最初階的身份，變為晚清軍事動員的重要機制，反映制度遭遇軍事危機時所產生的調適與應變。

綜而言之，四篇論文聚焦於清代，從制度的設計、構築、不同制度間的有機聯繫，到身在制度網絡之中的人們，如何操作、挪用制度，最終反過來再次形成新的制度。透過本小組的討論，能讓我們理解「制度」自身的生長週期樣貌，以及研究制度史的可能取徑。

從視覺化的職官體系來思考「清承明制」問題

蔡松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摘要

本研究透過將整體職官制度視覺化，來重建學界對明清官制的理解。本研究引入社會網絡分析作為核心方法，藉由分析清代官員的履歷資料，以及他們在各類檔案中的共現紀錄（co-occurrence），對其關係進行視覺化與分類。透過這樣的分析，突破傳統上從制書中的統屬關係出發所描繪的結構圖譜，轉而以各官職間實際的關係網絡為基礎，探討清代職官體系的結構性問題。

清代武童的制度變化與戰時入營、升遷

吳昌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武童原指未通過武舉童試者，屬於考試制度的一環。然而，咸豐年間，面對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等戰亂，武童身分的應用已超出武舉制度設計，成為擴大軍隊與收編地方武力的關鍵身分。地方官員與軍事首領，靈活運用武童頭銜，將地方頭領與其鄉勇納入軍隊，使地方武力得以名正言順地被編入體系，成為軍隊擴編來源。這種挪用，不僅解決兵源短缺，也使武童逐漸成為穩定的任官途徑，反映清廷試圖藉由有限度地調整既存制度，以應對軍事危機。此種挪用與改造，也對晚清軍隊內部升遷造成實質影響。

清代喀爾喀蒙古的犯罪、社會與治理： 以庫倫監獄為例

王士銘（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人文講座專任研究助理）

摘要

近年學界對清代監獄制度研究雖已豐碩，但多聚焦內地州縣，較少關注蒙古地方。本文以庫倫監獄為中心，分析康熙至光緒年間監獄制度的建立與運作。最初清朝因應準噶爾戰爭，仍以蒙古包關押人犯。戰爭結束後，隨著蒙漢貿易深化，犯罪型態從單人偷盜轉為集團搶劫。乾隆四十九年（1784）烏拉爾寨案成為建造固定監獄的轉折點。該監獄關押的犯罪者包括貧困牧民、喇嘛及民人，犯案動機涉及生存壓力、債務糾紛與族群衝突，反映遊牧經濟結構與蒙漢互動的複雜性。清朝採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因遊牧社會之災荒衝擊及人口流動等因素，導致囚犯死亡、越獄頻發等治理困境。

關鍵字：庫倫監獄、司法治理、蒙漢互動、遊牧經濟

官階之外：清朝頂戴制度及其實踐

謝仁晏（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摘要

冠服差異，是帝制中國用以區別身分的方法之一，既能辨識職官層級，亦可區隔士庶。自滿洲發展以來，帽頂裝飾成為區隔身分，入關持續調整制度，使官場與日常穿戴均可識別官員品級。過去從消費文化等角度討論明清服飾等議題，爾後也注意到清代皇帝品味、內務府的作用。但對於「頂戴」的討論，仍側重於製造與服儀制度，較少注意到，當頂戴成為辨識身分的方法後，人們如何操作原來用於分別官等的制度。本文梳理制度演變，再就檔案分析使用者在甚麼情境下利用頂戴，達成自己想達成的目的，使得這一物件，成為遊走職官制度內外的工具。

論文組主題

1.5 跨越文獻與實踐：民間文獻視角下東亞基層組織的秩序建構與整合機制

議題說明

本組研究聚焦明清時期東亞基層社會的運作機制，透過福建佛教網絡、台灣神明會、山西鄉約組織及越南村社契約等多元案例，探討地方治理、宗教發展與社會組織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揭示基層秩序形成的內在邏輯。

首先，明末福建德化龍湖寺的臨濟法派佛教，透過《龍湖寺燈譜》建構代際傳承體系，與地方祠廟形成緊密互動。此一現象不僅展現佛教在地化的歷程，更反映宗教組織如何透過文獻記錄維繫其社會網絡，進而參與地方秩序的塑造。其次，清代台灣岸裡大社的媽祖會以神明信仰為核心，透過契約文書規範成員的祭祀活動、土地交易與資金融通。此類民間信仰組織在移民社會中兼具宗教與經濟功能，成為調解族群衝突、整合地方勢力的重要機制。另一方面，山西忻州新發現的《鄉約牌冊》與《村庄都甲糧簿》，呈現清代基層組織從都甲制向里甲制的轉變過程。這些文獻不僅記錄賦稅徵收與地方行政的實際運作，更反映國家制度與地方實踐之間的動態調適。最後，越南後黎朝時期的〈買籌文契之碑〉，記載村社與官方教坊司之間關於祭祀役務的契約關係，凸顯民間組織如何透過協商與權利讓渡，與官方體系形成既合作又博弈的互動模式。

綜上所述，民間文獻不僅填補傳統史料的空白，更提供一個自下而上的視角，重新審視東亞基層社會的秩序建構。多元的地方案例共同揭示宗教、契約與行政制度如何交織成複雜的地方治理網絡，理解東亞地區的地方秩序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

清代山西忻州四鄉諸村莊鄉約牌冊考釋

董思思（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講師）

摘要

近年來新見於世的數種被統稱為「忻州四鄉諸村莊鄉約牌冊」民間文獻與雍正末年的「村莊都甲糧簿」在內容上有一定關聯，可能系由後者發展而來；至遲在道光年間形成今貌，並在咸豐年間持續發揮作用。文獻系由歷任「總約」傳抄，輾轉流傳於擔任「總約」者之手，內容包括忻州地方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總約的遴選方式，以及各村莊所需負擔雜項差派的名目與額度的記載等。文獻的產生和流變，反映了清代忻州基層社會組織由都甲向里甲轉變的過程及其在地方的運作實態。

明末以降閩中臨濟法派的傳衍與網路聯結 ——以德化龍湖寺為中心

羅臻輝（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講師）

摘要

明末以降，佛教臨濟法派的“法緣宗族”影響遍及福建各地，且不論寺觀祠宇，抑或社廟村庵常見臨濟法派僧人入駐，閩中德化龍湖寺臨濟法派最為典型。龍湖寺僧通過接續臨濟法脈，織造《龍湖寺燈譜》，同時開支衍派，形成僧徒式傳衍的代際網路。臨濟派僧人寓居民間祠廟處理僧俗兩方事務，民間祠廟則依託僧人維繫信仰香火，體現了佛教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交融。這一互動交融過程，不僅是從明清福建佛教史發展的延續考察佛教中國化在區域社會中的演進路徑，而且對思考民間信仰融合佛教信仰有所裨益。

越南後黎朝〈買籌文契之碑〉所見縣教坊司與民間社亭之管理與契約關係

劉怡青（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副教授）

摘要

刻於後黎朝正和五年（1684）〈買籌文契之碑〉，記載著鳳池社向國威府丹鳳縣教坊司購買本社亭每年入席、藏鬪、求福唱歌、籌錢全錢及除殃選木等役務與相關權利的契約內容。此類民間契約碑廣見於越南漢喃碑刻之中，多為各地「社」向「縣教坊司」買斷祭祀活動中「唱籌」的紀錄。透過〈買籌文契之碑〉的具體案例，可以觀察越南歷史時期「社」的組織運作與活動內容，以及民間與官方之間契約關係的具體樣貌。因此，以此契約碑記為切入點，得以探討越南教坊司對民間社亭之管理權限，並分析權利移轉過程中教坊司與村社組織之間所建立的契約機制與互動關係。

清代台灣媽祖會的社會機制與經營模式—— 以《岸裡大社文書》為核心

李朝凱（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清代台灣「番社」契約文書為核心，探討媽祖神明會的社會機制與經營模式。清代台灣岸裡大社「熟番」與漢人移民共同設立以媽祖信仰為紐帶設立的神明會，其相關契約文書一方面反映了媽祖會在移民社會發展歷程中調解族群衝突、維護地方秩序中的社會機制；另一方面，媽祖會以團體名義共同參與土地典賣、出租、放貸取利等經濟活動，也規範了成員的祭祀、財產管理及利益分配等事項，是民間信仰組織制度化、規範化的重要見證。通過《岸裡大社文書》的文本分析，得以深入揭示媽祖信仰組織的內部功能、經營模式及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重層關係。

論文組主題

1.6 紙上的社會：明清民間文書映照的日常與秩序

議題說明

本組以「紙上的社會：明清民間文書映照的日常與秩序」為題，透過四組互補案例，探討契約、檔案與宗族文書如何形塑地方經濟網絡、制度運作與環境治理。李承洙以清水江范氏宗祠七十餘件契據，揭示宗族資產管理與信任機制；樸贊根比較中朝土地契約中的貨幣與定價，勾勒跨區域經濟互動；鄭相浩從孔府檔案卷封格式出發，重建官府檔案分類與流轉秩序；瞿見則以「砍不完的樹」的集體記憶，剖析黔東南人工營林中的股份契約與永續機制。四篇論文共同顯示，民間文書不僅記錄交易，更是構築資源分配、社會協商與制度變遷的核心載體。本組將以跨學科視角結合社會史、經濟史與環境史的方法，嘗試回答：民間文本如何在制度外緣生成權威？基層行為者又如何透過書寫協商權利義務、重塑社群邊界？我們期望藉由個案比較與對話，重新審視契據、帳冊、檔案在構築明清社會秩序中的功能，並提出民間文書研究的方法論反思。透過文本互證、量化統計與環境考古等多元方法，本組旨在激發對民間文書社會功能的跨學科討論，並為重新理解東亞前近代社會的秩序生成機制提供啟示。

清時期中・朝土地契約文書所見貨幣使用 與買賣價格形成機制的比較研究

朴贊根（Park, Changuen，延世大學歷史文化學系講師）

摘要

本研究以清代中國與朝鮮王朝後期土地契約文書為基礎，系統比較兩國土地交易中貨幣使用與地價形成機制，探討東亞前近代經濟的區域特徵與互動關係。通過考察契約文書中貨幣種類、使用頻率、地域分佈及定價標準，分析中朝在貨幣經濟結構、交易類型與價格決定慣例上的異同，進一步揭示政府政策、賦稅制度與地區經濟環境等社會政治因素對貨幣流通與價格機制的綜合影響。

十九世紀清水江下游岩灣寨范氏宗族財產的形成與運作——以清水江文書為中心

李承洙 (Lee, Seungsu, 韓國明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教授)

摘要

本研究分析清代後期貴州省清水江下游岩灣寨範氏宗族資產的形成與管理。自 1846 年起，範氏以宗祠為中心，通過買賣、典當購置山場、農田、池塘、倉庫、菜園以及杉木等資產。宗祠的首事、執事負責資產的購置、借貸、運營與處分。對 1846-1911 年間的 71 份文書統計顯示，清代後期宗祠購置的土地數量激增，尤以山場和杉木最為突出。資金不足時，他們通過出售或典當資產獲取流動性，依賴同族之間的信任與團結。由此可見，範氏憑藉系統化管理嵌入區域商業網絡，成為重要的經濟主體。

「砍不完的樹」？清代黔東南清水江地區的傳統人工營林（1750–1911）

瞿見（中國農業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摘要

數百年來，中國西南的苗侗村寨裡流傳著一句古老諺語：清水江兩岸有「讀不完的書、殺不完的豬、砍不完的樹」。前二者容易理解，但為什麼會有「砍不完」的樹？事實上，其所表明的當地發達的可持續林業。然而，在沒有法律政策要求的情況下，該地區大面積的人工營林是如何持續的？當地寨民為何選擇不斷造林？本研究通過對從清水江文書的剖析，試圖揭示在18至19世紀的清水江社會中，人們如何通過對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關鍵要素的配置，依據契約所構建的多元股份結構，型構出的一種兼顧森林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文化價值的可持續林業經營模式。

紙上的社會：以《孔府檔案》透視崇禎改曆

鄭相浩 (Jeong, Sangho, 韓國東國大學文化學術院研究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通過分析明清時期（明中期後期至清後期）孔府檔案所藏的檔案資料的封面（或卷宗首頁）形式及其記載內容，考察當時文書的分類體系與保管方式。研究的核心在於實證性地理解明清官僚體制下的行政運作與檔案管理制度。與以往著重于文書內在內容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將聚焦于文書外部的格式與記載方式，力圖深入揭示當時文書分類原則、流轉路徑、存檔機制及其制度性結構，從而對明清時期檔案行政與國家治理體制提供更為細緻的理解。

論文組主題

1.7 治理的技藝：明清的地方運作、資源調配與知識實踐

議題說明

明清二朝的地方治理，重視因地制宜與分官治理。地方政務的推廣，有賴於官員對政策的理解、落實以及地方的配合。本組聚焦於地方制度運作、資源動員與治理技術間的關係，從個人施政、物資生產、財政調度到邊疆開發，重新審視明清地方治理策略。

首篇以陳璧（1437-1514）為例，探討其如何結合自身的政治操守與治理經驗，整飭山東臨清軍政與文教事業，發揮明代地方官員在制度轉型與城市發展中的實踐策略。

第二篇聚焦明代南京制錢制度的形成與困境，指出貨幣鑄造與政策調配間的摩擦，並援引貨幣非對稱性理論解析「南鑄北用」的失敗，揭示制度與市場接受度之落差。

第三篇以江西吉安府修造漕船為中心，探討明清之際官、軍、民三方如何在財政壓力下協力，地方士紳更藉輿論聲量，促成民間協濟納入國家財政機制。第四篇回溯清代雲南邊疆銀礦之開發，透過對耿馬地區銀廠經營與稅收制度的考察，呈現清廷在征緬戰後，透過市場手段與邊民合作，重建地方秩序並補充國家稅收。

本組藉由四篇論文，橫跨明清、南北與中心邊陲，探討官制設計與地方治理如何在地理環境、社會現實與人情互動中，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治理技藝，進而呈現制度運作過程中權責協調與地方應變的面向。

陳璧的地方治理與臨清發展

謝忠志（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明代陳璧（1437-1514）在弘治年間出任山東臨清兵備副使為中心，探討其地方治理與臨清城市發展之間的關聯。弘治六年（1493），陳璧自監察御史陞任副使，此一拔擢在史上殊為罕見，引起程敏政、王鏊等友人以詩文相賀。除讚頌陳璧剛直風範外，多指涉臨清為漕運要衝與「南北襟喉」，反映臨清在成化後設置兵備道之因。陳璧到任時，臨清商旅繁聚與豪強橫行，其治理採用裁減冗濫、修築城池與整練兵馬等措施，並藉法度以掖良善，使臨清秩序肅然。這些舉措既符合兵備官員「文人知兵」的定位，也形塑臨清為軍商並重、漕運樞紐的發展樣貌。本文透過《實錄》、詩文與個人傳記，重建陳璧生平作為，指出兵備道的設立與運作不僅強化治安與防務，更推動臨清在明代中期成為「天下咽喉」的城市格局。

清朝時期雲南邊界茂隆銀廠考

李華彥（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緬甸土司建立洞吾王朝，至乾隆中期被壅籍牙王朝取代。乾隆三十年代清軍征緬甸，戰後，緬甸開始定期入貢清朝，雙方開關互市，江西、湖廣、雲南等地之人更大量進入清緬交境之處的礦山，開發銀礦等產，今緬甸包德溫礦區等礦場因之興起。漢人移民代表吳尚賢在乾隆初年於耿馬西南的佤族地區開辦銀廠，獲得酋長蜂築信任，每年上繳銀課三千多兩，發展蓬勃。本文擬探究這段歷史，瞭解十八世紀清朝在西南邊疆的用兵與發展。

明末清初江西漕船修造經費中的官軍民聯動

余璐（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師）

摘要

明末因各地戰亂而物價飛漲，漕船修造經費大幅增加。江西各府採取清屯清軍、清費加費、官造等方式，分別從官、軍兩方節省籌措經費，緩解運軍賠累之苦。清初因戰火波及，江西各地漕船損失殆盡，需費更巨。各府縣民情不同，漕船修造的經費來源也不盡相同，或是民間協濟，屯糧、屯租收歸縣徵後也被納入漕船修造經費中，由此形成官、軍、民三方聯動、共同負擔的局面。在清初嚴禁加派的明令下，民間協濟與政令有違，但部分地區得到士紳民眾的輿情支持，也得以推行。在官、軍、民各方努力下，漕船修造經費由官府統一支給，被徹底納入清代的地方財政之中。

難用與南用：明代的南京制錢鑄造與部門 博弈

連超（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南京作為明代條件最優越的鑄錢地，具有銅料較易獲得、成本低廉、技術先進、行政資源豐富等特點。朝廷卻很少能善用資源，在不足二百年的明代鑄錢史上，南京可謂重挫頻頻：南京錢因在北京難用而轉為純南用，南京本地行錢導致幾乎發生民變，北錢南鑄只持續三年便宣告失敗，鑄錢還經常無利可圖，轉型追求利潤後則鑄錢品質常出問題，明末的銅荒、缺乏本錢更導致南京鑄錢量也不穩定。本文試圖跳出純經濟史的框架，以部門博弈的視角，分析南京鑄錢的制度困局。本文將揭示，由於在南京鑄錢問題上，存在皇帝、戶部、工部、南京戶部、南京工部、南京兵部、應天府等多個利益實體及其各自對鑄幣問題的思考，頂層協調往往失靈，各方從本位利益出發，追求「理性」的目標。這些局部最優解的總和，卻常常導致整體的堵塞甚至癱瘓。部門間的內耗與掣肘，最終如何共同扼殺了南京的鑄錢潛能，並將國家貨幣的主導權拱手讓給私鑄市場，即便南用也難用。

關鍵字：博弈、南錢、北錢、買銅、鑄額

個人組

1.8 從糧價到觀音：明清社會的制度治理、禮制實踐與信仰能量

議題說明

清代珠江流域的糧價結構： 數據可信度與市場整合度分析

賴建誠（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高志祥（清華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摘要

以往對糧價的研究，大多從靜態角度計算某個地區（例如廣州），與另一個地區（例如福州）的糧價相關度（市場整合度）。這種方法不關心廣州與福州之間，有無實質的糧食交易，也不關心廣州與福州之間，由於各自的地形地勢，造成運糧成本差異。以水系來分析可以避免這些缺點，因為很容易有實質交易，水系網內的運送成本差異較小。水系具有天然、價廉、快速的優勢，這是影響糧價與整合的重要條件。

本文探討珠江水系三大省（貴州、廣西、廣東），中級白米價格的長期結構變化，得到幾項具體觀察。(1)這三省的中米價格在乾隆晚期（約 1780 年代）之前大致可信，乾隆晚期到嘉慶初期（約 1780-1810 年代），數據可信度屬於「半信半疑」，1810 年代至 1911（清末）大都「可疑」。所以我們只能分析乾隆朝的中米價數據。(2)屬於珠江水系的 21 個府州，糧市整合度會明顯高於非珠江水系的 12 個府州。(3)這 33 個府州之間，糧價的交互整合度高低不一，看不出簡潔的分布型態，請看文內 3 個熱圖的解說。(4)雖然糧價數據越晚期越不可信，但整合度反而會越來越高，主因是 1850 年代後逐漸引進現代貨輪，航速明顯加快、載運量大增、運送成本大降。

明代帝陵祭祀日程之研究

金蕙涵（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明代陵寢祭祀的日程從明初年延續唐宋舊制的特點，到明中後期改為以民間祭祖的冬至、清明、中元為三大祭，反映了陵寢祭祀從模仿太廟到俗節禮制化的過程。目前學界多以明中晚期文獻討論明陵祭祀日程，故多將焦點放在三大祭，忽略了早期的日程變化反映了明初陵寢祭祀與太廟、奉先殿等祭祀儀式的磨合，此過程有助於探討陵寢禮制意義和功能的變化。本文將重新梳理明代陵寢祭祀日程的演變、探討影響陵寢祭祀日程的因素，以及這些日程變化對陵寢禮制地位改變的意義及其對清代陵寢祭祀的影響。

明代方志中的巫、巫俗與巫風：以《閩書》為中心

林和君（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約聘副教授）

摘要

明代筆記與小說中常見關於民間巫術的記載和描述，例如《三國演義》中的占夢與《滇載記》中的占夢巫術，特別是《金瓶梅》穿插於其中的占卜等巫術。而從《永樂大典》等類書中也能窺知明代的巫術符籙等紀錄。本文則以方志為研究文本，從方志的人文記憶、風土歷史等角度，探尋巫、巫術、巫風諸項記載，期能突顯過往仰賴筆記小說為研究文本的侷限，尋繹明代巫風在民間的面貌與義涵。特別是常謂巫風盛行的閩地，因此本文也將以《閩書》為著眼重心，作為探究明代巫風與巫俗的初步研究。

Guanyin: The Religious Ascension of a Celibate Maid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Qijun Zheng (鄭麒駿，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生)

摘要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focused investigation of the Guanyin cult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building on existing scholarship, and extending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grassroots religious dynamics.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in Buddhist studies predominantly emphasizes canonical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elite monastic interpretations, our research interrogates how ordinary devotees actively produced, circulated, and transformed ritual texts to negotiate everyday crises and secure merits and benefits during apocalyptic periods.

By drawing on the canonical narrative of Miaoshan—a model for religious celibacy that challenges orthodox gender roles—this study reveals how celibate renunciation functioned as both a spiritual remedy and a countercultural state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Meanwhile, to address our central research topic, we have compiled and analyzed a comprehensive corpus of primary sources that have recently become available in large reprint collections and are currently under study within the ongoing CRTA project (<http://crtal.info>). Our typology categorizes these primary sources into seven interrelated groups: (1) Liturgical Manuals; (2) Incantatory Manuals; (3) Divination Slips; (4) Miracle Tales; (5) Prefaces and Morality Tracts Revealed through Spirit-writing; (6) Precious Scrolls; (7) Gazetteers; (8) Press Articles; Furthermore, our project incorporates archival research and extensive fieldwork on pilgrimage practices at the Tianzhu Temple in Hangzhou. Despite abundant press coverage attesting to its popularity and significance throughout the Jiangnan region, Tianzhu Temple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scholarly attention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Buddhist pilgrimage centers. Our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s that pilgrimages to this site provided a vital arena for communal ritual performanc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religious texts and miracle narratives, thereby reinforcing social bonds and enhancing Guanyin's perceived efficac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Guanyin cult was not merely a top-down doctrinal process but a vibrant, community-driven phenomenon. By integrating a variety of primary sources with ethnographic fieldwork of local pilgrimages, our study reveals how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mmunal textual production, ritu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 devotional practices initiated by various social groups who rearticulated Guanyin as one of the most efficacious deities in daily life for common folks since late imperial China.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interpretive models by foregrounding the synergy between ritual continuity and local innovation, thereby offering fresh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Buddhism, popular religion, and social history in Jiangnan from late imperial periods to the present day.

論文組主題

1.9 鳥獸臣民：清帝國統治結構中的動物參與

議題說明

清朝撫御四方，不僅構建起含納多元族群的帝國，更將不同生態群系的動物納入到帝國統治之中。這些鳥獸經歷制度、知識與生態的塑造，成為帝國的「臣民」，參與到清朝的歷史進程中，同時它們也深刻影響著清朝的制度建構、生態變遷與文化圖景。本組論文即以清帝國的動物臣民為主題，從飛禽（孔雀、鷹隼）到走獸（老虎、駱駝），從西南邊疆到京師皇城，以豐富多元的視角，試圖討論動物與清帝國統治結構的互動關係。

兩篇有關飛禽的文章，關注動物被帝國符號化的過程。梁鈺若博士關注 18-19 世紀孔雀進入帝國體系的路徑，及其引發的邊疆環境危機。該文指出帝國在將孔雀符號化的同時，也受到地域生態閾值的制約。時舒陽博士關涉清代宮廷鷹隼知識的建構過程，以馴鷹實踐與中西自然知識交流的雙重角度，思考帝國知識系統如何型塑鷹隼。

兩篇有關走獸的文章，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清代出巡圍獵中的動物問題。王敬雅教授以清代圍獵中打虎活動為切入點，辨析清人有關打虎減少標誌著軍隊戰力衰弱的論斷，並提出生態惡化或是根本原因。裴嘯山博士則關注清帝出巡路上駱駝的使用，及服侍駱駝的牽駝者。通過分析牽駝制度的轉變，考察動物資源對軍政制度變遷的重要影響。

裝點與崩壞：清代孔雀、權力與生態危機

梁鈺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歷史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聚焦於十八至十九世紀清代西南邊疆孔雀的大規模養殖，探討其如何在帝國權力象徵需求的驅動下，引發結構性的生態危機。研究指出，孔雀由邊疆野生物種轉化為政治符號的過程呈現雙重路徑：其一，在帝國上層，孔雀翎透過重構滿漢文化符號體系，取代明代天鵝羽，成為官僚等級與軍功的制度性標誌；其二，在地方社會，孔雀內臟與肉食被賦予“益氣明目”等藥理與奢侈價值，實現從民間食材到精英特供的符號增值。這一雙重象徵化過程推動了西南地區的擴張式養殖，並依託“以雞代孵”等低成本技術迅速擴大規模。然而，高密度飼養所產生的糞污在廣西、雲南等地積聚入河，導致“水色紅碧相雜，疾疫隨飲而發”的生態崩潰。孔雀既以羽毛裝點官員冠冕，成為帝制制度的視覺化權力景觀，又以其生物性存在揭露帝國生態治理的脆弱性——“金翠蔽天”的繁榮背後，是“糞毒染江”的環境代價。本文綜合運用生態學、考古學與物質文化史的方法，結合滿文與漢文史料，追溯孔雀從邊疆農戶到宮廷貢品的流通軌跡，揭示象徵性資源在流轉過程中的異化與生態反噬。研究表明，當文化與政治賦予資源合法性時，其環境風險往往呈現延遲性與擴散性。

鷹隼之學：清代鷹狗處的動物實踐、制度 知識與跨文化交流

時舒陽（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考察清代鷹狗處作為知識生產場域，如何通過環境實踐、制度運作及跨文化互動建構猛禽知識。不同於傳統文本分析，研究聚焦馴鷹者身體經驗、狩獵季節性節奏，以及基於氣候觀察、遷徙追蹤與獵物習性形成的實操知識體系。通過解析鷹狗處訓練記錄與《柳邊紀略》等筆記，揭示清廷對獵鷹能力的評估標準。同時本文通過分析利類思所譯《進呈鷹論》，以探討制度性知識如何與耶穌會士引進的歐洲博物學相遇，並考察其中所涉之歐洲馴鷹理論是否滲入清宮實務中，抑或僅作為邊緣化知識存在。

駝峰上的武備：清朝巡幸用駝制度探析

裴嘯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駝駝憑藉其卓越的載負效率與程途適應性，成為清帝巡幸後勤中重要的運載工具，負責馱運帳房、糧米、獵物等關鍵物資。隨著巡幸規模不斷擴大，用駝需求持續攀升，逐漸形成一套由「自京調駝」與「沿途換駝」構成的用駝體系。前者之駝源歷經從太僕寺駝館到八旗拴養，再到直隸備駝的轉變；後者則廣泛整合牧廠調撥、外藩進獻與大臣報效等多種渠道，共同支撐起巡幸途中的駝力供給。為保障駝隻沿途飼喂，清廷建立了「隨巡牽駝制度」，此制亦隨駝駝資源的變動而屢經調適。剖析巡幸用駝制度的沿革可見，即使在駝源緊張的背景下，清廷仍堅持巡幸用駝，並屢次通過制度調適，以竭力保護駝力。這不僅體現了清廷對巡幸機動性的追求，更承載其意圖宣揚尚武精神的深層意涵。

關鍵字：巡幸 後勤 駝駝 牽駝人 尚武精神

論文組主題

1.10 Before the Tumultuous Age: Emergence and Circ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Qing China

亂世之前：十九世紀初的清代財政軍事創新及其流動

議題說明

Institutions never arise out of thin air but have origins. It is well known that new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in military and finance, like militia and fiscal lijin, were adopted in the wak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However,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practices had pre-Taiping local origins before they circulated transregionally to become influential nationwide. By looking at the pivotal developments of various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1850s, this panel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continuity of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Against the perception of a history compartmentalized by the Taiping war, we show how post-Taiping reform could draw from a variety of indigenous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racing the origins of lijin, Shengyu Yang's work uncovers merchant activism in profiting from lijin before the Taiping period and negotiating with the state to convert lijin for fiscal use in Shanghai. In the military realm, James Bonk examines the growing tendency of patronage and personal bonds of the Green Standards, especially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its leadership. Finally, Xiaorui Mao explores the pre-Taiping practice of local militia in Sichuan and its spreading impacts on the local power landscape. The papers foreground the continuity and connectivity of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in a transforming era of increasing needs for state capacity and elite participation. They also provide a transregion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imperial governance as the flow of knowledge and tactics.

制度從來不會憑空產生，而自有其長時段的歷史淵源。眾所周知，像團練與釐金這類清代軍事和財政上的新舉措，是在太平天國之亂之際才開始被廣泛採用的。然而學界較少注意到，這些制度在逐步跨區域傳播並最終產生全國性影響之前，多已在太平天國戰前於地方層面出現。本組論文通過回溯 1850 年代以前若干關鍵制度的萌芽發展，試圖重構清代行政運作的連續性。有別於將十九世紀歷史以太平天國戰爭為界限截然分割的理解方式，我們展示了後太平天國時期的清代改革如何從多種各地既有的制度資源中汲取養分。楊聖宇的研究聚焦於釐金制度在上海的起源，揭示太平天國之際商人如何積極參與釐金運作並從中獲利，並與國家協商將釐金納入正式財政體系。James Bonk 的研究集中於軍事領域，分析十九世紀綠營中人身依附與私人庇護關係的增長趨勢，特別是其領導階層的省籍化現象。毛瀟銳的研究探討太平天國之前四川地區的早期團練實踐，分析其如何從非正式措施轉為常設制度，並在跨區域制度擴散中重塑地方權力結構。這些論文共同凸顯了在十九世紀這一國家能力與菁英參與需求日益增長的轉型時代中清代行政體系所展現出的制度延續性與互聯性，並以跨地域的視角將帝國治理理解為相關知識與策略流動的歷史過程。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Qing's Long Nineteenth-Century (1790–1911) / 清朝的軍隊省籍化 (1790–1911))

James Bonk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ollege of Wooster, East Asian Studies)

摘要

In many ways, the Taiping War (1850-1864) was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Qing military. The conflict ushered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hastened the adoption of new weapons,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armies and navies. The extent of these changes,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 fit into a broader narra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meant tha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ontinuities in the old Qing armies, such as the Green Standards. One such continuity, which I explore in this paper, was a pattern of provincial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aiping, the upper ranks of the Green Standards had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officers from a single province. In the Daoguang reign (1820-1850), approximately 20% of provincial commanders (tidu) were natives of Sichuan province. Under Tongzhi and Guangxu (1856-1908), approximately 25% of tidu were from Hunan. The paper first explores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is pattern, including wars that opened new career paths in the military and regulations that allowed high-ranking officers to influence appointments. I then rais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provincializ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 consider whether the capacity of the Green Standards to accommodate provincialization may have benefited the Qing, allowing powerful commanders to gain personal prestige and influence while also dissipating forces that could have led to a greater decentralization of military power.

從許多方面來看，太平天國戰爭（1850-1864）是清朝軍事結構的轉折點。這場衝突開啟了洋務運動、加速了新武器的採用、導致了新陸軍和海軍的組成。這些變化的廣泛影響，以及它們與中國現代化敘事的契合，意味著人們對包括綠營在內的舊軍隊的延續性關注較少。我在本文中探討的其中一種延續性為省籍化對軍隊的影響(provincialization)。太平天國前後，綠營上層來自同一省份的軍官數量不成比例。道光年間（1820-1850 年），約有 20% 的提督是四川人。同治、光緒年間（1856-1908），約有 25% 的提督來自湖南。本文首先探討了導致這種現象的因素，包括開闢軍隊新職業道路的戰爭和允許高級軍官影響任命的過程。然後，我提出了一些有關軍事省籍化的動態及其在政治格局中的意義的問題。我探討了綠營吸收省級化的能力是否有助於清朝：一方面讓強大

將軍獲得了個人威望與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分散了可能導致軍事權力進一步分裂的力量。

Taxation, Donation, or Contribution? Coming to terms with Fiscal Lijin in Shanghai

楊聖宇（香港中文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摘要

As a crucial fiscal innovation, lijin was instrumental in sustaining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Yet, its origins remain a subject of debat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state archives, commercial records, and officials' account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lijin in its early stage was a convergence between Lei Yixian's fiscal innovations,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techniques from big Shanghai merchants, and the conventional fiscal method known as contributions (juanshu/juanna) --- hence the term lijuan. And this fusion was catalyzed by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Uprising which occupied Shanghai, the new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a. Once the uprising was quelled by the forc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lijin persisted as a fiscal imposition and ultimately became fundamental to local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hanks to their activism, big business in Shanghai not only acquired mo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reconstruction, but also consolidated control ove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釐金制度作為晚清最重要的財政創新之一，對清末民初各級政府和公共組織的正常運行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對於釐金制度起源的討論，學界尚未達成共識。本文通過分析清宮檔案、商業徵信錄、以及當事官員的記錄，提出早期釐金制度是雷以誠的財政創新、上海商人先進的商業釐金管理技術、以及清朝既有捐納制度的融合產物，因此有“釐捐”之稱。小刀會起義的爆發加速了這些要素的融合，成為財政釐金制度誕生的催化劑。儘管小刀會起義遭到清廷與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聯合鎮壓，但是釐金制度卻得以延續，並成為地方重建的財政支柱。上海的巨賈們一方面捐出釐金，積極參與地方重建，另一方面又通過把持釐金局鞏固對同業公會的控制，進一步擴大了其政治話語權。

Instant Measure, Long Aftermath: Early Militia Practice and Administrative Renewals in Sichuan, 1796–1859

毛瀟銳（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摘要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litary forms to emerge in late Qing China, the local militia groups, known as tuanlian, started gaining prominence with official endorse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t was turned from a wartime measure to an accepted supplement for local security in some regions. Despite this, the overall status of local militia within the system remained uncertain for the next half century until it eventually became a nationwide initiative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Drawing on local archival evidence,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early militia practice in Sichuan prior to the 1850s and examines how the Qing state's paramilitary policies evolved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massive migration and banditry in the borderlands. It situates the rise of normalized militia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security and social crises that followed the White Lotus War (1796–1804), when militias were embraced by officials, elit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to absorb the itinerant population and restore local order. By tracing the provincial origins of new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like militia, the article bridg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provides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imperial governance from the flow of knowledge and tactics.

作為晚清中國最重要的地方軍事形態之一，團練自十九世紀初起便在若干地區逐漸獲得了官方認可，由一種戰時應急措施轉變為可接受的地方治安補充手段。儘管如此，在隨後近半世紀的時間內，團練在官方層面的整體地位仍不穩定，直到太平天國時期方發展為全國性的制度實踐。本文藉由四川地方檔案資料，追溯1850年代之前早期團練的實踐軌跡，探討清政府因應內陸邊疆地區大量移民與盜亂問題而調整準軍事政策的過程。文章將團練常態化的興起置於白蓮教之亂（1796–1804）後的安全與社會危機背景之中，考察當時團練如何被官員、士紳與地方社會廣泛接受，成為吸納流動人口、恢復地方秩序的替代治理策略，開始在區域內部流通，並逐步擴展至全國。透過對如團練等新型行政實踐之省域起源的考察，本文突出了清代行政在十九世紀前後半期之間的制度延續性，並從區域視角出發，通過考察相關知識與策略的流動來理解帝國治理。

論文組主題

1.11 邊疆與帝國：清代的文化認同與治理策略

議題說明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發展迄今已經三十多年，學界不斷推動探索清帝國統治的多元性和全球性，由此關注作為內亞、中國西南與東南邊疆的主體性和生活在邊疆的族群。本論文組承襲前人學者對帝國、意識形態和殖民主義等概念的關注，同時進一步運用新材料和檔案擴展「新清史」的研究法和推論，更詳細地分析社會與地方史，從而推進對清代邊疆和族群的思考。本論文組從政治史、科技史、環境史、族群史和歷史人類學的多元視野出發，結合運用多語種文獻和圖像，探討清代（入關前和入關後）遼東、雲南和新疆地區的族群、環境、文化認同和王朝治理，以及清帝國的殖民性和意識形態在邊疆地方的形塑與回應。

鍾恩瀚利用《八旗世襲譜檔》建構資料庫，探討清入關前遼東滿漢邊疆社區的族群認同、文化融合和軍事技術的互相交織，指出此時的滿洲統治者相比投誠漢人的軍事職業化程度，更在意這批人的族群忠誠和宗族忠誠。黃庭彰利用《木氏宗譜》、文人文集、清實錄、奏摺、方志和《皇清職貢圖》研究清帝國在雲南麗江針對當地非漢族納西族群的征服與文明化工程背後的動機與過程，木氏土司遭剝奪特權後各群體對此事的歷史書寫，以及多重視角與敘事在帝國並存的現象。艾敏慧藉由解讀潘泰之亂後清廷在雲南的管治方針，討論這場跨邊地亂事結束後，清廷新政策對雲南各地的回民，特別是女性回民在生活和經濟方面的長期影響。童楷文著眼於清末新疆政府在羅布淖爾地區的行政區劃改革和環境改造，乃至各族群對當地的開發，探討當地環境，以及羅布人的族群認同和經濟活動因清廷殖民而受到的衝擊。

綜上所述，四篇論文分別通過清代東北、西南和西北邊疆探索清帝國在邊疆的殖民及帝國與邊疆族群的互動。本論文組特別邀請蔡偉傑擔任主持及評議人，敬希推動「新清史」範式和觀點在臺灣的傳播。

Native Nakhi Chieftain and People in the Qing Yunnan Frontier: Conquest, Localism, Civilizing Project and Imperial Ideology of Colonial Lijiang

黃庭彰 (Wong Ting Cheung, PhD Candidate, Binghamton University)

摘要

The Mu family (木氏土司) was a powerful Nakhi (納西) native chieftain rooted in Lijiang (麗江) for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The Qing Empire (1636-1912) is well-known for its conquests marching west. However, this pape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march of the Nakhi people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during and after Yongzheng's reign. Since the late Kangxi's reign, the Mongols in Tibet continuously threatened the Qing's western frontier. For the sake of securing the crucial transportation artery connecting Yunnan province and Tibet, the Qing court decided to abolish the hereditary power of the Mu family. On the one hand, a straightforwa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t as another instance of "gaitu guiliu" (改土歸流) ignores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cision to abol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vilizing project w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and strengthene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Mu family. A long durée observation shows distinct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processes between the native aristocratic Mu family and the Nakhi commoners. The diversified Chinese written and painting materials also presented the legitimization constructed by the Mu aristocrats, and the conflicted imperial projections and local visions coexist in the vast empire. The case study of the Nakhi people living o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kaleidoscopic nature of the Qing Empire's colonial rule.

Into the Marshes Environment, Epidemics, and Imperial Politics in Late Qing Lop Nur, 1759–1900

Kevin Kind (童楷文,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摘要

本文探討清末時期新疆省政府在羅布淖爾地區推行的殖民與開墾政策。儘管清朝早在 1759 年征服新疆，然而直到 19 世紀末，羅布淖爾地區仍未受到其直接統治，而羅布人依然保有獨特的語言、文化與族群認同。1890 年代，省政府在羅布淖爾地區設立「撫輯招來局」，招募漢族、回族及維吾爾族墾民，以開發塔里木河下游的荒地。這些政策深刻地改變了當地的自然環境與羅布人的社會文化。其中，對有限水源的過度利用導致該地區的水域逐漸乾涸，使原以捕魚為生的羅布人被迫離開家園，遷移至新設的墾殖區，轉而從事農業以維持生計。因此，羅布人逐漸被同化為維吾爾族群的一部分。最終，羅布淖爾地區成為現在中國最乾旱的地區之一，羅布人也幾乎完全消失。

Qing Pacification Policies in Yunna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thay Rebellion

Jacqueline Armijo (艾敏慧，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fghanistan)

摘要

Between 1856-1873,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led by Du Wenxiu was able to control much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face of growing abuses carried out primarily by those from among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central China, local indigenous peoples, together with local Hui, and some long term Han residents, organized a resistance movement. Their “capital” was in Dali, in western Yunnan. It flourished until the Qing army, having finally brought uprisings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under control, was able to focus on what was happening in Yunna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bellion the population of Yunnan was devastated. It is estimated that half the population were either killed or fled to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Hui population was especially hard hit, having lost 90% of the population. The Qing state instituted a series of restrictions to control the lives of the surviving Hui. They were forced to live outside of city walls, restricted to a limited number of occupations, and often lost their land and property. This paper documents the long term impact of these different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Hui women in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some of the most devastated Hui communities in Yunnan.

Ethnic-Loyalty, Artillery Technology, and Empire: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Formation of Early Hanjun Eight Banners Companies (1633–1636)

鍾恩瀚 (Chung Yan Hon, 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摘要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Hanjun Banner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s of its earliest company captains from 1633 to 1636, emphasizing how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intersected at the Manchu-Han ethnic frontier in pre-conquest Qing state formation.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lineage and familial ties of these captains, leaving their broade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xperiences relatively unexplored. By integrating Manchu and Chinese archival sources, notably the Baqi Tongzhi and the Eight Banners Genealogy (八旗世襲譜檔), this study employs text-mining method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dataset detailing each captain's political allegiance, military background—especially artillery training due to the Hanjun's later identity as an artillery corps—family lineage, and timing of defection.

Analysis reveals two key patterns. First, many companies emerged directly from pre-existing Han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transforming civilian communities along the Manchu-Han frontier into military-administrative units. Second, numerous companies were strategically granted as rewards to influential Han defectors and their families, embedding political loyalty within ethnic and clan networks. Interestingly, despite the later emphasis on artillery skills among the Hanjun, few initial captains possessed prior artillery experience. Systematic artillery training occurred post-recruitment, illustrating that the Qing strategically prioritized ethnic allegiance and lineage loyalty over immediate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in its frontier governance.

Ultimat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Hanjun companies represented a deliberate pre-conquest Qing imperial strategy aimed at stabilizing and redefining the Manchu-Han ethnic frontier, intertwining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assimilatio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loyalty into the fabric of Qing state formation.

個人組

1.12 從戶役到民變：明清政制職能、社會治理與歷史意識

議題說明

親女與寡婦的財產權分別：以戶絕財產繼承為中心的考察

戎宗柳（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摘要

明初國家為保證戶役制度有效推行，頒布戶絕相關法律，盡力避免「戶絕」。其辦法是允許民間無子家庭通過過繼等方式延續戶的存在，相應地，在法律上保證嗣子繼承家產的權利。家族作為父系繼嗣共同體，藉助法律控制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排斥親女繼承權。但不同的婚嫁地位帶來權利差異，寡婦作為維持這一體系的重要一環，被法律賦予掌管夫產與擇嗣的權利，擁有家長的權威。因此，親女與寡婦權利地位的差異來自於明清賦役制度對家族的支持。

關鍵詞：親女 寡婦 財產權 戶絕 家族

元明之際江南驛遞系統的運作——以新見 浙江行省文書為中心

尹敏志（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摘要

明承元制，在地方遍設水馬驛、急遞鋪、遞運所，構成全國驛遞系統。據靜嘉堂藏《漢書》《後漢書》紙背文書，洪武五年浙江行省溫州府永嘉縣象浦驛平均每月接待使客 19 起，每起使客耗廩給米 41 升，年耗 93.48 石，相當於該縣民田秋糧總額 5% 左右。水馬驛的水夫、步夫、水站夫，急遞鋪的鋪司、鋪兵，遞運所的運夫、遞運夫等，均編入裡甲組織的外役戶，由正管戶代管，免除裡甲正役。急遞鋪在元代鋪兵、鋪司的基礎上，另設鋪長、提調官，形成四級組織結構。文武官員使用水馬驛、遞運所必須遵守規定，甚至由明太祖親自批准。明初繼承並改良蒙元遺留的驛站制度，同時厲行節約，強化管理，使其與新創的黃冊、裡甲、衛所制度相適應，完善中央集權。

關鍵字：明代；江南；水馬驛；急遞鋪；遞運所

設巡檢到立縣——明代福建延汀漳地區的基層治理與地方社會

劉伊芳（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

明代景泰至隆慶年間，福建共設立十個新縣，其中九處位於延平、汀州及漳州三府。這些新縣多處於省界或府際交界地帶，顯示該地區長期存在基層治理薄弱、行政控制不足的問題。正統後期，朝廷曾試圖通過增設與調整巡檢司強化地方管控，但效果有限，最終轉向「立縣」以鞏固統治。值得注意的是，此過程並非單純由國家主導，地方家族勢力亦積極參與，甚至推動行政區劃的變革。在國家「自上而下」的治理需求與地方社會「自下而上」的利益訴求之間，形成複雜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朝廷試圖透過行政建置加強控制；另一方面，地方勢力藉立縣獲取賦稅、科舉等實際利益。兩者雖目標不同，卻在博弈中達成某種妥協，最終塑造出新的地域秩序。此現象不僅反映明代地方治理的動態過程，亦凸顯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相互調適。

以衛統幫：清代漕運衛所的職能與運作再探

阮寶玉（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

清朝政府為保證京師供應，在衛所改制的過程中仍然下令漕運衛所照舊。然而，在清代衛所民化研究的大趨勢影響之下，現有對明清漕運衛所改制的探索認為清代漕運衛所同樣經歷民化，存留的衛所組織事實上已經喪失衛所行政功能，蛻變為單純的運糧組織——漕幫。因此，關於明清漕運的演變，多聚焦於漕幫或者軍戶家族，清代漕運衛所就此淡出研究視野。事實上，清代漕運管理架構從明代的把總——衛所變為了糧道——衛所——漕幫，衛所的行政職能並非被廢除，依舊在統轄著漕幫的各項事務。光緒《太倉衛志》就記載了嘉慶年間太倉衛前幫如何處減船屯田的事情。嘉慶十一年松江府婁縣通過了坍荒減則案，作為兌運該縣漕糧的太倉衛前幫可以減免譚世隆船一隻，相應屯田二頃四十餘畝，按例應分派前後幫各丁均勻執業。太倉衛灑帶漕船的屯田並非簡單地裁併，而是由衛飭收田租，歲收存備大王廟社會等公用，前後兩幫領用。從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點是，以往被研究認為已經“裁併”的漕運衛所的「衛」還在發揮著相當關鍵的作用，裁減漕船屯田籽粒的征收與調用，都以「衛」為總的單位實現，讓人不得不思考清代漕運組織從衛所到漕幫的轉變表達是否準確，清代漕運衛所應有更為複雜的面相。

叛賊的思想史：重訪清中葉東南民變中的 「明朝意識」（1736-1840）

王兆坤（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講師）

摘要

本文旨在重新檢視清代「反清復明」的歷史性質，試圖超越「民族主義長期延續」與「單純符號工具」這兩種傳統觀點，提出「休眠的象徵體系」作為框架，用以詮釋乾嘉道三朝百年間東南社會的民變活動。本文指出，清初的復明政治訴求逐漸沉寂，「明」的意象轉向休眠狀態，沉澱進入讖緯、儀式、會簿、口號，既非系統性的反叛意識，亦非空洞的迷信，而是可被隨機激活的功能性符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與「明」相關的話語在民間文本中明顯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明朝意識」的增強。與此同時，包括皇帝在內的行政系統對「明」之意象的本能恐懼加上官僚體系的運轉習慣，反而在緝捕與奏報過程中不斷複製並強化這些符號，構建出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反叛巨網」。19世紀中葉之後，隨著太平天國的巨震、海外被西方人建構的「充滿反叛精神的秘密結社」概念的回流、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這套休眠符號被激活並重構為連貫的「三百年反清復明」敘事。

關鍵詞：休眠象徵；反清復明；天地會；民變；歷史記憶

第二會議室

論文組主題

2.1 明清博戲文化的媒介特性、話語形構與社會想像

議題說明

博戲在主流論述中向屬小道，但其強大的流行與適應能力，以及與金錢暗通款曲、依違於消閒與曠業之間的道德灰度、同時又能涵攝多樣文化修辭的媒介特殊性，使它特別適於捕捉明清兩代急遽變遷的經濟、倫理、品味與社會關係。本組四位發表人分別採取不同進路，既將遊戲機制與博具本身作為文本閱讀，也探討博戲如何在文本中被變形與再現。

楊婷的文章首先觸及本組選題意識：「遊戲」何以值得被獨立捻出探討？她以「本色」為考察對象，指出「本色」在古典文論、戲曲批評、乃至思想史中的用例皆已見充分研究，但該概念在遊戲語境中的出現卻鮮少獲得關注。楊婷梳理出明清遊戲中「自報本色」與「擲骰定色」兩種範式，勾勒出戲曲、心學等面向之「本色」所未能呈現的、關於身份想像的代際差異。

而「本色」的固化與牌骰、戲譜的印造技術密不可分。張一帆的研究聚焦十七世紀江南葉子戲的製播生態，細緻分析紙牌本身的物質性，討論印刷工藝如何強化其時尚價值，並進一步考察葉子戲如何在實踐中打破地域、階級、雅俗等多重界域，從而揭示遊戲在社會文化流動中的關鍵角色。

有別於張一帆視紙牌市場為媒介匠人、士大夫、庶民等不同族群的文化交涉場域，Zach Berge-Becker 則著眼於此階級、族間張力如何導致話語資本的不均，進而框定我們長期對圍棋作為「高雅風尚」的認知。他重新發掘那些以圍棋為業、行賭、甚或視之為敗德之藝的平行論述，還原明代圍棋文化的立體樣貌。

相對於 Berge-Becker 聚焦於話語如何形塑博戲的文化想像，楊中薇則以「小說」為分析對象，探討話語如何透過文類特有的敘事邏輯，回應博戲文化背後更深層的信用型態與風險意識轉變。她從博奕與小說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出發，指出賭博在明清小說中往往轉

化為對不確定情境下決策行為的隱喻，並將小說視為一種圍繞風險計算、資源投注與報償機制所建構的類遊戲敘事體系，進而揭示小說與早期近代信用經濟之間的隱秘連動。

從本色到擲色：明清遊戲中的兩種身份機制

楊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色”一詞在中文語境中俯拾可見，學界論述已詳，但它在遊戲中的用例，卻少有學者措意。本文透過分析“本色”在明清遊戲中的用例，辨認出“犯本色”、“自報本色”、“擲骰定色”等幾種圍繞“本色”概念展開的遊戲模式，進而揭示遊戲如何對觀念史做出貢獻。

自唐宋以降，“本色”就在仕宦、戶役、伎樂、戲劇等各領域中成為一個與人物歸類、人物典型息息相關的概念，明清遊戲中的“本色”也延續此一線索，聯動了對“人”分類與想像的工程，並見諸晚明酒令場合中常見一種平準主客視閾、鼓勵自我客體化的“自報本色”令約。同時，“色”字作為骰子與骰色（擲色所得之采數）的別名，為骰戲語境中的“本色”注入了依違於“骰色”與“角色”兩端的歧義性。本文後半分析打馬戲、《攬勝圖》及《續紅樓夢》所錄一則骰戲酒令，追索遊戲術語“本采”一詞向“本色”的過渡，並指出“骰色”與“角色”、骰子一枚六采與人事百態在個別遊戲中的互動與張力。在這些骰戲機制的中介下，以“本色”為名的人“種”想像也隨之浮動，呈現出與“自報本色”型截然不同的、對於“本色”圖景的間離態度。

關鍵詞：本色 遊戲 酒令 明清 媒介研究

下注於未來：十七世紀李漁小說中的虛擬價值與想像的信貸 / Wagering What Is Not Mine: Fictive Value and the Credit of Imagination in Li Yu's Fic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楊中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本文以李漁兩篇小說〈鬼輸錢活人還賭債〉與〈失千金福因禍至〉為核心，探討十七世紀信用體系擴張下的「虛擬價值」(fictive value) 及其與敘事結構之間的關係。相較於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晚明清初現金流通的再現，本文則關注越來越多人以未來資本為預期的心理。本文探討〈鬼輸錢〉如何以賭博作為信用社會的縮影，賭局中的籌碼、抵押與延期清算，揭示以過度擴張信用的危機，以及抵押的物質基礎被抽空所造成的金融泡沫。〈失千金〉則以再放貸與海上貿易為題，顯示信貸中延遲的時間性如何形塑小說敘事結構。兩篇小說揭露了以信任、符號與預期為基礎的「以虛生實」運作方式，並轉化為敘事的時間結構。李漁藉此將小說中因果報應的道德框架轉化為信貸體制的寓言，展示在虛擬價值橫行的時代，個人、制度與敘事皆被捲入信用的危機與誘惑之中。

This paper centers on two of Li Yu's stories, *The Ghost Loses Money, the Living Repays the Debt* (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and *Fortune from Misfortune* (失千金福因禍至), to explore the notion of “fictive value” and its relation to narrative structure within the expanding credit system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re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ngible monetary circulation in late-Ming and early-Q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merging psychology of anticipating future capital. *The Ghost Loses Money* presents gambling as a microcosm of the credit economy: through chips, pledges, and deferred settlements, the story exposes the risks of overextended credit and the financial bubble that results when the material basis of collateral is hollowed out. *Fortune from Misfortune*, centered on re-lending and maritime trade, illustrates how the temporal deferral inherent in credit shapes narrative rhythm and causality. Both stories reveal operations of “creating reality out of the fictive,” grounded in trust, symbols, and expectation, and transform this logic into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narrative itself. By reframing the moral framework of karmic retribution as an allegory of the credit system, Li Yu exposes how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narratives are all entangled in the crises and temptations of a world sustained by fictive value.

從修身之道到敗德之藝：明朝的多元圍棋文化

Zach Berge-Becker (Postdoctoral Fellow,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摘要

作為前現代中國「琴棋書畫」四藝之一，圍棋通常被視為一種高雅的藝術形式與理想的消遣活動，並與自我修養、宇宙觀、與儒家道德緊密相連。這些源自於古代士人話語的象徵與價值觀延續至今，影響現代學者與棋手對圍棋的理解，也讓現代圍棋成為高雅顯赫的地位象徵意義。然而，持續強調這種士人話語，也導致了對其他圍棋文化與群體的忽略。這篇文章旨在將圍棋作為高雅藝術的既有話語重新再語境化，指出這種主導話語僅能代表明代眾多圍棋文化中的一種。明代圍棋文化也包括以圍棋為職業的棋手、地位低微的賭棋者，乃至那些將圍棋視為有害的娛樂而反對下棋的士人等。本文將比較這些不同社會群體及其各自與圍棋互動的方式，期待能有助於我們對明代多元圍棋文化更細緻和全面的理解。

時尚牌戲：晚明蘇州紙牌的圖像、市場與遊戲空間

張一帆 (Yifan Zh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Scholar, Heyman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聚焦於十六世紀中葉源起蘇州崑山的紙牌遊戲成為一種新興的地方時尚。一副四十張的小牌，何以憑藉其印有金錢和《水滸傳》人物的新奇圖象，和做工精良的紙張質地，風靡一時？晚明蘇州，作為出版印刷、工藝製作和娛樂文化的中心，如何催生出了跨區域的紙牌市場？本文通過馮夢龍、潘之恆等人編纂的遊戲譜錄為切入點，考察晚明以蘇州為中心的紙牌生產和消費網絡中紙牌本身的可觀、可感和可玩之魅力。譜錄的編者，亦作為玩家，向我們揭示了紙牌如何成為一種時尚的媒介，溝通高雅話語與日常娛樂，形塑出一個使精英與大眾共享的遊戲空間。

論文組主題

2.2 Networks, Narratives, and Negotiations: Missiona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議題說明

This panel synthesizes three studies on Jesuit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impact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first study examines John Hu 胡若望, a Chinese Catholic who traveled to France with Jesuit support. Unlike other pioneers who exemplified obedienc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Hu resisted these expectations and ended up in a mental hospital. Jonathan Spence's narrative, *The Question of Hu*, reconstructs this episode, revealing the limitations of Jesuit strategies when they confronted "the Oth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s story challenges the view of him as merely a failed convert, presenting him instead as an agent whose actions highlight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The next research explores the literary practice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It focuses on the Chinese writings they produced, specifically those with titles or chapter headings that include terms such as *Zhi Jie* 直解 (Direct Explanation), *Xing Shi* 行實 (Deeds), or *Tu Shuo* 圖說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which were part of traditional form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texts, the study aims to show how missionaries imitated classical Chinese textual formats to achieve religious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last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the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 texts at the Royal Library of France, spanning from the 1660s to the 18th centur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19th-century French translations of these works. Focusing on the renowned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西遊記,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Jesuit missionaries in securing thes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Chinese novels and dramas in their homeland. It also reveals that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novel entered the Library at distinct times, leading to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xt being translated, especially as the same sinologist produced French translations in two separate periods.

Taken together, these studies illuminate the complexities of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literary and religious adaptation, as well as the travel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literary knowledge in early globalization.

Deviation, Dissonance, and the Limits of Conversion: Reimagining John Hu Across History and Narration

朱雯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as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e universality of Christian truth through native converts, the story of John Hu (Hu Ruowang 胡若望)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this vision. A Chinese Catholic sent to France under Jesuit auspices, Hu failed to embody the ideal convert—obedience, restraint,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as modeled by earlier figures like Michael Alphonsus Shen (Shen Fuzong 沈福宗, c. 1658–1691), Arcadio Huang (Huang Jialüe 黃嘉略, 1679–1716), and Louis Fan (Fan Shouyi 樊守義, 1682–1753). Instead, Hu’s refusal to conform led to his confinement in a French lunatic asylum. Jonathan Spence’s *The Question of Hu* reconstructs this episode through historical fiction, filling archival silences with narrative texture. But this reconstruction is itself revealing. In what ways did John Hu resist the “convert” archetype? How does his experience illuminate the limits of Jesuit strategies when confronted with “otherness”? By examining Hu’s deviations from Jesuit expectations and Spence’s narrative choi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 must be seen not as a failed convert, but as an agent whose resistance exposes the underlying tensions with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and whose life story, situated at the crossroads of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colonialism, madness, and early globalization, opens unsettling avenues for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inquiry.

《直解》、《行實》與《圖說》：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古籍形式的模仿、繼承與開展

許維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明清時期在華傳教士為了傳教，穿漢服，習漢語，讀中國經書，調查中國風土民情，已為週知。而他們的中文著作隨著越來越多的整理，也逐漸廣為流傳。在這些標榜由西人撰述的著作中，有不少從書名到內容形式，均有相當的中國色彩——不論藏於梵帝岡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或徐家匯藏書樓，均不乏其例。本文擬以明清時期耶穌會士所撰之中文著作為對象，特別聚焦在標題中出現「直解」、「行實」、「圖說」等傳統中國書籍類型的文本，藉此梳理其形式模仿的特徵與脈絡。期能勾勒出傳教士如何借助中國古籍體式進行宗教本土化的文化策略與實踐歷程。

論文組主題

2.3 文本・圖像・遊觀：明清女性的身體展演與媒介實踐

議題說明

本組論文主要討論了明清女性的身體展演及相關的多元媒介實踐，圍繞性別、文化、道德、國族、消費等議題展開。四篇文章將藉助詩歌、繪畫、遊觀、女性傳記等媒介，探討明清女性在公與私、國與家、中心與邊緣、文化規訓與自我表達之間的思考與行動。唐雨薇以奢香夫人（約 1361-1396）及安履貞（1824-1880）為討論對象，揭示從明至清彝族女性創作中由公開到閉鎖的敘事轉型中反映出的女性身分重構及漢、彝文化斡旋；王藝霏以貞女畫家姜桂（?-1762）之《栢舟圖》為例，探索貞女群體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表達，以及在畫作的流轉、意義生產、功能形成中起到的作用；陳子悅考察道光朝閨秀嚴衡（1822-1846）編纂之《女世說》及其詩集內容，闡釋清代閨秀如何將對女性命運的關懷融入著述事業，並揭示書中由詩書畫藝等多重面向構成的女性「人文世界」；徐雅容則考察晚清至民初的上海花選活動，通過梳理此時期女性形象及性消費的變遷，揭示性資源與租界社會權力的多邊互動。小組論文試圖從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民族、不同媒介來討論明清女性與社會歷史環境的相互映射，以及她們在實踐過程中的能動性。

從奢香到安履貞：水西安氏的女性空間敘事

唐雨薇（南京林業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摘要

明代奢香夫人（約 1361-1396）開闢「龍場九驛」，為閉塞的水西土司實現地理擴張，而其後代女性安履貞（1824-1880）的詩中最常出現的空間意象是「闌闈」「重門」等閉鎖性場景。水西安氏女性從奢香（政治領袖）到安履貞（閨秀詩人）的敘事轉型，映射了彝族女性從「公共英雄」到「儒家閨範」的身份重構過程，其背後是漢文化規訓對土著性別秩序的重塑與收編，亦是家族在政治失勢後向文化正統靠攏的隱秘策略。本文將聚焦女性空間敘事，探究從土司制度建立至改土歸流的時代背景下，彝族水西安氏女性如何在「被書寫」與「自我書寫」之間，呈現歷史劇變的複雜張力。

創作貞女與貞女創作：姜桂《栢舟圖》及其題跋論述

王藝霏（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研究生）

摘要

本文聚焦於現藏香港藝術館的清代貞女畫家姜桂（?-1762）的畫作《栢舟圖》及其題跋，討論貞女本人在畫作的功能與意義形成時扮演的角色。作為名門閨秀，姜桂的畫作一方面可以視作清代守貞風潮中地方文人集體聯文以爭取當地道德資本的實例，牽連起複雜的文人網絡，也投射出他們對貞女的想像；另一方面，《栢舟圖》還是姜桂受另一位貞女「程夫人」之託的創作，貞女群體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呈現出與文人不同的企圖、樣貌和路徑，其自主性也在此過程中生成。因此，本文試圖經由圖像及文本分析，發掘貞女本人在其形象塑造、畫作流通、跋文創作、甚至利益爭取時起到的作用。

書寫「她史」：清道光朝閨秀嚴衡的《女世說》研究

陳子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女世說》由浙籍閨秀嚴衡（1822-1846）編纂，收錄明末至道光朝女事87篇，堪稱清人的「當代婦女史」著作。《女世說》最主要的取材對象是女性詩歌總集《國朝閨秀正始集》。《國朝杭郡詩輯》、《兩浙輶軒錄》等地方詩文總集，文人別集，以及《畫林新詠》等傳記彙編類書籍，亦是素材來源。通過重新編織素材、效仿詩文評等方法，嚴衡於編纂中注入了關懷女性情感和身體經驗，以及書畫成就的個人視角。《女世說》的內容顯示出，清代閨秀視野中，存在著一個有別於傳統知識秩序的，關心詩、書、畫、藝、技，以及情感聯結的，女性的「人文世界」。

關鍵詞：清代，婦女史，《女世說》，學術史，人文世界

百花何處依：以花榜變遷談晚清民初上海性消費的經營

徐雅容（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晚清《遊戲報》中「花榜」以文人活動示人，文人品評妓女風靡一時，刊物受到坊間熱捧。1917年末，《新世界報》與新世界遊戲場，共同舉辦「群芳選舉大會」，「群芳選舉大會」調整活動環節，提升了該活動公共性和商業性。其不僅是一場恩客炫富的財富表演，也是性資源與社會資源的互動。花榜作為消費文化活動的盈利功能由此拓寬：文人們圍繞該活動發行相關文本並多次印刷；遊戲場在票務上的商業盈利提升，呈現民初性消費的蓬勃發展。在租界禁娼壓力下，1920年後花選廢止。本文將從晚清民初女性形象與性消費的變遷中，討論性資源與租界社會權力多邊互動。

論文組主題

2.4 物質與體驗：明清文本中的技術與感官

議題說明

本論文組以技術視角檢視明代到晚清的文本，深入物質、工具與技藝描繪，試圖解析背後隱而不顯的意會體驗，進而理解技術知識與感性的交織過程。

從技術稜鏡映射的視角看明清文化，有助於重新想像個體經驗的時代意義。我們以 Francesca Bray 的「社會—物質網絡」為觀點，關注由物質而來的科技知識，及其與社會網路的連結。但不同於學者以國家與制度切入的視角，本論文組有意聚焦於個人感官體驗與技術所碰撞出的化學反應。

陳柏言與鄭博元的文章討論日用技術：《金瓶梅》的生火技藝和《兒女英雄傳》的計算知識。透過小說的物質性描寫——點燈燃燭、指掐算盤，分析由工具而來的技術知識在明清士商生活中的重要性。掩映在物質與符碼之後的，是晚明思潮中關於欲望的辯證，以及清中葉以降士人社群對日用計算知識的需求，與其複雜的迎拒姿態。

曹鈞傑和吳佳鴻的研究則深入域外技術，分析清代耶穌會修士郎世寧的花鳥畫作細節，以及晚清小說中關於奇觀的演劇敘事。花獸器物的繪製策略揭示了技術與宗教體驗、政治意圖的關係，而從魔術、馬戲敘述中的重層視線，則能發現既有經驗與新式科技的互動。

透過物質與技術眼光，本組四篇文章旨在掘發日用知識與域外知識如何召喚感官、形塑體驗，並深遠地影響文本與歷史。

物、身體與日常技藝：論《金瓶梅詞話》 「火」的多重維度

陳柏言（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在《金瓶梅詞話》中，「火」被反覆述及，卻鮮少獲得學者關注。筆者以為，「火」的湧現並不只是小說作者偶然為之，亦折映出明末思想潮流中「火」的血氣與精神。除了作為象徵的生命／慾望之「火」，作者亦反覆提點「火」——此一難以觸摸之元素——的物質性意義。藉由「火」的書寫，作者不只展示紛呈的物敘述，亦藉由「火」相關的詞語想像人體，進而刻畫「火」如何成為一種「日常技藝」。綜此，本文不只指出「火」如何形塑小說中的生活世界，亦探究「火」如何作為蠡探古典小說的思考進路。

工具／技術如何日用？——《兒女英雄傳》的算盤與計算知識

鄭博元（Po-Yuan Cheng, Doctoral Student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摘要

清代中葉以降的小說中，計算知識常被文人作者提及，並視為經史知識之外的範疇。文康《兒女英雄傳》描寫士人家庭生活，便呈現了熟習經史的士人面對計算時的困窘無策。測量、算學與記帳等技能的匱乏，導致小說人物家庭治生維艱，也肇引任官時的工程與財政危機。本文從技術視角出發，首先檢視小說中三項工具——算盤、硯台與彈弓，探討物質性與功能性如何影響人物習用技術的過程，並形塑其社會身分與認同。再者，考察小說中不同技術間的交流與競爭，和在家庭空間內外施展的效力，以揭示計算知識在日用與施政的重要性，及其與經史知識的複雜關係。

萬物細語：郎世寧與他的花鳥畫

曹鈞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比較文學系博士生與英文系講師）

摘要

作為盛清最具代表性的宮廷畫家之一，義大利耶穌會修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因引介西方透視法與明暗技法至中國繪畫體系而為人熟知。這一深具宗教性的「獻藝」策略，在嚴格禁教的政治環境中，卻未能實現其傳播福音的終極宗旨。在此困境下，郎世寧何以選擇長居中國，並持續投入繪畫創作？本文以此提問為起點，聚焦於其花鳥畫，援引神學美學家 Hans Urs von Balthasar 的核心概念「形象的榮耀」（splendor formae）進行分析，主張：郎世寧對花獸器物的細緻描繪，實則體現其在傳教受阻之際，轉以萬物之細節作為回應召喚之途，使對美感形式的極致錘鍊，成為神性臨在的可感載體。

電光、獅子與現代迷夢： 晚清小說中的新式演劇的（不）透明性

吳佳鴻（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晚清小說中經常出現魔術、馬戲或電光影戲，不僅只敘述表演的發生，也勾勒了人物觀看的視線。不同於此前《點石齋畫報》或《申報》對環球巡演的報導，小說中疊合了敘事者、人物與潛在讀者的重層視線，以觀看新式技術下的奇觀。惟電光等技術所帶來的視覺經驗，除了預演西式科學的到來，復現現實之外，而也可能重疊於夢境、幻覺或國族寓言。投映於布幅的影戲固然基於科學，小說卻未必服膺於透視法或內在的顛倒。不同於環球巡演所潛伏的視覺技術的廣延性與普遍性，新舊知識觀之間的層層視線往往既看見，卻又同時推遲了公理、精準或透明的世界。

個人組主題

2.5 文字、聲音與身體：明清戲曲的多媒介互動

議題說明

明清時期傳奇戲曲尤為繁盛，傳奇可讀、可唱、可演，其表演在各階層中都廣受歡迎，而這些戲曲活動帶來的對「戲劇性」的思考更蔓延至社會的方方面面。可以說，不僅傳奇本身具備多媒介特質，在其與其他文藝形式如文章、繪畫互動的時候，也為這些文藝形式注入了多媒介體驗。然因材料所限，對傳奇多媒介性的考察主要依賴文字或圖像記載，相關研究因而多注重理論構建但離傳奇所蘊含之聽覺、視覺等身體體驗越來越遠。有鑑於此，本報告小組以傳奇的多媒介性為切入點，結合跨學科視角，發掘傳奇在體裁形塑、案頭閱讀、文類融合、圖像再現等過程中所呈現的不同媒介之間的交互。

本小組的四篇文章從「紙上」媒介出發，並超越「紙上」，探索明清戲曲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視角。盛亦惠以明代各版本的《琵琶記》為例，探討傳奇的表演如何影響了其文學體例的形成。王爾馨以跨文類互動為切入點，分析戲曲家屠隆在傳奇與序文之間所創造的新型文類融合及其戲曲經驗的再現。邱嘉耀關注聲音與戲曲閱讀的關聯，探討明清讀者閱讀劇本時對視聽感官的調動與整合，並從理論層面考察戲曲諷誦的曲學意義。汪一舟從繪畫與音樂、戲曲等媒介互動的角度，論述「失去的」女性貞節如何在明代繪畫中被展演和「演奏」。

From Arias to Scenes: A Multimedia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on of Chuanqi Song-Drama

盛亦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Imagine, if you would, that you are a late-Ming literatus. One of your wealthy friends has invited you to a large banquet in his mansion to celebrate his sixtieth birthday. A highlight of this banquet is a performance by your friend's private troupe. Now a servant is presenting to you, the guest of honor, a menu of scenes that the troupe has prepared and asking for your preference. The menu contains three titles: "The Eight Deities Going to the Feast of Celestial Peaches" ("Baxian fu pantao shenghui" 八仙赴蟠桃聖會), "Officer Cai Getting Married at Niu Mansion" ("Cai yilang Niufu chengqin" 蔡議郎牛府成親), and "Dou at Yanshan [cites] the Five Classics to Reprimand His Five Sons" ("Dou Yanshan wujing xunzi" 獄燕山五經訓子). Which one would you select? The choice is straightforward, at least in this case: although you may not know that "The Eight Deities Going to the Feast of Celestial Peaches" is from a chuanqi play titled Story of Ascending to a Deity (Shengxian ji 昇仙記), it is easy to tell from the title that the scene, both its characters and its plot, resonates best with the theme of your friend's birthday banquet.

All the scenes listed above are from Red Coral of the Musical Poetry (Yuefu hongshan 樂府紅珊瑚, henceforth Red Coral), a late-Ming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scenes (xuanchu 選出). Like many similar imprints in the late-Ming book market, Red Coral provided its consumers

有聲的閱讀「體」驗：明清時期戲曲諷誦的言論與實踐

邱嘉耀（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戲曲出入案頭與場上，與聲音關係密切。本文擬從理論和實踐角度，探討聲音在劇本閱讀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讀者如何藉助聲音達成與文本的互動。明清文獻中有關戲曲諷誦的言論，多屬讀者個人經驗之自述，部分則出於文人趣味及對伶人和劇場的抗拒，乃從文辭和音律範疇肯定其審美功能，顯示出戲曲理論與文章之學的合流。在實踐層面，聲音固可促進意義的理解，引發廣義的文學批評；由於身體的介入，閱讀已非純粹的智識活動，成為跨越媒介與感官的體驗。對戲曲諷誦的歷史探索，可以補充相關曲論的經驗基礎，彰顯出閱讀行為的非視覺面向及其複雜性。

關鍵詞：聲音、感官、身體性、閱讀實踐、戲曲批評

序文、戲曲與屠隆的創造性文類融合

王爾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文從晚明戲曲家屠隆的序文切入，通過文類互動的視角考察其戲曲經驗的書寫。本文將分析屠隆在序文與戲曲之間創造的多重文類關係：他將序文作為一種替代戲曲創作的自我表達載體，一種建構戲曲搬演與觀眾接受的有效手段，以及一種用以突破傳奇傳統結構的文體形式。本文將文類視為靈活流動的“資源庫”(genre repertoire)，探究晚明文人如何以創造性的文類融合來再現其戲曲經驗。在晚明戲曲刊本與出版文化的跨媒介視野中，本文展現了戲曲如何藉其修辭特性、演劇形態及感知體驗，在晚明“文化聚合”(convergence culture)的社會形態下推動了不同文類與媒介間的互動創新。

展演女德：音樂在明代繪畫中的效用

汪一舟（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聚焦明代繪畫中音樂的效用，特別是與琵琶、古箏相對的古琴。以吳偉《武陵春圖》為案例，作者認為畫中古琴功能是「演奏」(musicking)出畫中女性作為名妓無法實現的貞節。研究考察了徐霖作為吳偉合作者和南京劇作家在畫中發揮的作用，揭示了繪畫的戲劇性及與傳奇和虛構傳記的關聯。同時，作者嘗試將其音樂與貞節理論延伸至其它明代繪畫。文姬歸漢題材自南宋興起在明中期繪畫中重新流行，與之矛盾的是明代社會對文姬失節的嚴厲批判。本文審視了《胡笳十八拍圖》，認為畫中重複出現的古琴以「無聲」之樂展演文姬的女性貞操，以對抗批判之聲。

論文組主題

2.6 形塑文學：明清文本內外的物質性與知識實踐

議題說明

本組論文嘗試探索明清時期文本形塑的各種面向，著重其產生的脈絡、物質基礎，以及文人作者們編纂、撰寫和流通文本時所採用的知識技藝。透過「細讀」文本內外，呈現明清文學史在義理旨趣外的不同面向。本組亦試圖擴展文學史的邊界，研究範疇從譜錄、雜鈔、長篇小說到志怪筆記，構建出一個相互指涉的文本世界。本組成員相信，文學史的探索並非先入為主地囊括或排斥「文學為何」，而是依循現有文本，走進明清文人們的文學世界。在個別論文方面，昊玥談論《香乘》中香物與文本的交互關係，釐清晚明譜錄的知識譜系及其形成的社會脈絡；競藝則重構《萬曆野獲編》形成與流通的過程，強調其文本型態與形塑它的物質基礎間不可切分的關聯；晏穎將編纂、傳播等知識實踐的觀察帶進《儒林外史》，分析小說中對此類文人活動的描寫，如何反映盛清文人對媒介環境的反思；最後，康妮思索《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書寫與閱讀活動。這理應順暢無礙的知識交流，如何成為怖異驚恐的文化體驗？而對時人而言，這又意味著甚麼？綜上所述，本組論文欲從「文」與「物」的關係，以及文人作者編、寫、傳、讀的知識實踐視野，結合知識史、閱讀史、細讀分析乃至物質文化的研究途徑，重新介入明清文學史的討論。

Ghosts without Names: Spirit Writing and Anonymous Textuality in *Yuewei* *caotang biji*

黃康妮（南加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中國傳統詩學向來強調「詩言志」，將詩、文視為表達真誠意志的載體。在此框架內，作者、讀者理應和諧共生，通過寫作與閱讀文本實現跨時空的順暢交流。與此同時，明清時期亦有大量關於「文本流傳」的志怪敘事。這類故事往往以讀寫詩、文為契機，引入各種奇詭際遇。《閱微草堂筆記》尤其熱衷此類故事，其中既涉及諸多儒、釋、道經典，亦有多處「扶乩」、「鬼詩」、「殘碑」一類無主之文。本論文主要分析《筆記》中相關故事，並希望以此為例指出志怪敘事中的詩學思辨。

香乘：譜錄中的文本世界與晚明的文化景觀

李昊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生）

摘要

作為「物質轉向」的早期典範，柯律格的《長物》突破了傳統名物學的實證主義框架，轉而深入探討晚明「鑒賞文獻」的文本世界與社會區隔的關聯性。本文借鑑此路徑，以周嘉胄《香乘》為個案，結合知識史的視角，在「地理誌-類書-雜品」的文獻譜系中重構「譜錄」編纂的文本特徵與社會情境。研究聚焦於三個維度：回顧香譜的成書原因；解析香譜中知識收集與分類的特點，理解其知識圖景的建構方式；考察其與晚明考據學風、博學風尚及品物美學之關係。本研究旨在推動當前「物質轉向」，並為「譜錄」研究與晚明文化景觀的探討提供新的思路。

雜纂文獻之物質性探蹟： 以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為例

曹競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摘要

在物質文獻學的研究背景下，考察物質性對於中國傳統文獻的塑造及文人知識趣味的作用，尤其值得從《萬曆野獲編》等中晚明雜纂文獻入手。雜纂文獻的編纂過程中存在著奚囊、箱篋等物質形態的強力參與，不僅塑造了雜纂文獻碎片化的文獻形態，還由此促成了雜纂文獻在流通、接受環節中的性能與活力。本文以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為中心，通過考察其文獻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性特徵及其與記憶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揭示雜纂文本允許後來者改造，得以克服散佚損耗的流通活力；另一方面表明沈德符等中晚明文人的非功利知識趣味，並觀察此一趣味如何產生並被實踐於其文學活動中。通過引入物質性視角，本文力圖發覆雜纂文本之價值，同時為物質文獻學研究提供新的取徑。

關鍵詞：《萬曆野獲編》；沈德符；物質性；流通活力；雜纂文獻

位處其中：《儒林外史》的文化技術與媒體世界

廖晏穎（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儒林外史》的內外皆與媒體、訊息傳播密切相關。在文本內，透過描繪文人挾帶消息、蒐整詩文及編選墨程的過程，呈現名士文化的物質條件與生產機制；就文本本身而言，吳敬梓藉周遭文人網路中的耳聞親見，修訂增刪該著，也使其無法置身當代儒林之外。援引德國媒介理論，本文將上述的諸種文人活動，視為創造、詮釋、操縱符號的「文化技術」，並思考其於文本內外的交互關係。結合 18 世紀中國印刷、書籍史及思想史視角，本文指出《儒林外史》中所描繪的各種媒介環境和其運用，並非只是背景設定，更是吳敬梓反思自身文化處境時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論文組主題

2.7 明清理學的實踐精神

議題說明

在理學的學術討論中，過去的研究多著重於理學家如何建立理論基礎、如何詮釋並傳達聖人之道。然而，當我們細讀明清理學家的相關文獻時，會發現他們普遍期盼哲學與道德最終能夠付諸實踐，進而造福社會。許多理學家不僅關懷基層民眾，更致力於將聖人之道推廣至個人生活，使道學得以深入民間、落實於日常實踐之中。雖然從宋代已經開始強調實踐精神，明清理學家在延續這些傳統的同時，更進一步深化實踐層面。對他們而言，聖人的理想與精神不再只是皇帝與官員的教化責任，而是強調普羅大眾同樣應當皈依道學、親自力行仁義道德。

本場論文組的各篇論文皆聚焦於理學在實踐層面的展現。我們希望進一步討論：明清時期有哪些理學家針對地方治理、教化與政策實施提出了具體方案？他們如何建構更為完整、貼近民間的教化活動，或促進某些實用知識的流通與推廣？這些理論與實踐，往往並非空乏的理想，而是與日常工夫與制度設計緊密相連。

我們的研究將檢視地方層面的實踐與推動：有哪些措施實際被實現？推動者是哪些人物或機構？其成效如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又是什麼？我們將透過對文獻的詮釋與歷史脈絡的梳理，呈現明清理學較完整的樣貌。

「官箴」中的理學話語實踐對明清官僚文化的形塑——以呂坤〈實政錄〉及其傳播為核心的考察

黃奕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研究型碩士生）

摘要

理學在晚明的實踐，在以往通常被解釋為以王陽明心學學派及其傳人的自我修身與鄉里教化——即逐漸以「覺民行道」為主流風氣，並且通常表現為書院、講會、同善會諸形式。作為晚明的理學大儒，呂坤在〈實政錄〉中展現了另一種理路：將理學的相關話語與議題融入公牘文獻之中，從而達到對下屬地方官員「啟其良心」，「信其約束」的效果。及至清代，該書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閱讀，涵蓋此類寫作風格的「官箴」書籍越發普遍，逐漸形成主流。同時，此類理學話語及其載體的閱讀推動部分清代官僚進一步投入實際事務的關注，從而形成了不同於前代的理學官僚文化。

陽明學的實踐：羅汝芳知寧國府的地方教化與社會建構

Immanuel Spaar（石善也，德國烏茲堡大學哲學系講師）

摘要

羅汝芳(號近溪，1515–1588)於 1553 年進士及第後，官歷太湖令、刑部山東司主事，1562 年補寧國府知府。赴任寧國之前，羅汝芳已建立起穩固的人脈網絡並獲得高層支持，將來內閣首輔的張居正 (1525–1585) 曾特為其撰寫〈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日後亦有書信往來。

羅汝芳在寧國當任至 1565 年，推行了一系列教化活動。此論文旨在梳理並解讀羅汝芳知寧國時的宦游狀況，包括他的講學活動、地方設施建構，以及交流情況。本研究主要依據羅汝芳的「鄉約全書」，並參考程玉瑛教授整理的羅汝芳生平，以及鳳凰出版社校對的羅汝芳集。羅汝芳在短短三年知寧國的政績，不僅展現了明代理學受到陽明學實踐精神的影響，亦可作為理學在地方社會建構的縮影。

清代理學官僚修身實踐與地方教化的困境 ——以劉宗周〈人譜〉流傳史為中心的考 察

陳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摘要

晚明大儒劉宗周講學以“誠意”“慎獨”為宗旨，所著《人譜》一書在清代刊刻次數不少於六十四次。蕺山後學始終是傳播《人譜》的重要力量，但是自乾隆帝追諡劉宗周“忠介”，至道光年間正式將其從祀孔廟，清廷對蕺山學說的推崇逐步制度化，官方意志日益凸顯。在這一背景下，如雷鋐、松筠等先後出任地方學政的官員，向地方士子推廣《人譜》，宣導以“證人改過”為內核的修身實踐。此舉的理想是將《人譜》納入州縣教化體系，積極推動“誠意”“慎獨”觀念及操作方法向一般士人的日常生活滲透。就其實際功效而言，《人譜》作為案頭箴規，對於少數讀書人的修身實踐頗有正面砥礪作用。不過，存世的《人譜》刻本與印本比例嚴重失衡，暴露出供過於求的現象。從書籍史的角度剖析清代地方教化的困境，可知蕺山所倡“記過不記功”的道德訓誡過於嚴苛，世俗讀書人望而生畏，致使此類修身實踐因難以制度化，缺乏社會根基，終未形成穩固的文化傳統。

關鍵字：劉宗周；《人譜》；理學；地方教化

個人組主題

2.8 圖志・植物・醫書：自然書寫、知識航程與健康實踐

議題說明

清代《寧夏河渠圖》中的地理知識視覺化 與空間秩序

吳挺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摘要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寧夏河渠圖》為清乾隆年間所繪墨綠寫本地圖，詳繪寧夏水利設施及其與地景的互動，為研究清代寧夏治理的重要史料。本文以此圖為核心，探討清帝國治理脈絡下地方水利知識的視覺化與政治意涵。圖中呈現黃河幹支水系與灌排網絡，並整合山川地勢、聚落、邊防設施與道路等資訊，構成以治理需求為導向的地理圖式。本文主張，此圖非單一測繪成果，而是水資源緊張、軍屯並行與災害風險交織條件下，地方知識與中央治理邏輯整合的產物。透過地物配置的分析，本文揭示地方地理知識如何被視覺化為帝國的治理空間。

清中葉嶺南文人筆記「不鍾於物，而鍾於人」的敘事轉向——以《靄樓逸志》為中心之探討

張閏熙（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約聘助理教授）

摘要

漢唐以降處於帝國中心的文人長期視嶺南為殊方異域，他們多半基於博物學之心態書寫嶺南地理與物類知識，直到明代文人突破過去嶺南敘事「獨鍾於物，不鍾於人」的現象，逐步聚焦於記載人物，始有所變化。此書寫精神經屈大均《廣東新語》之發揚，影響了後起的嶺南筆記，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嶺南文人歐蘇《靄樓逸志》已全都記載其耳目所及的平凡鄉邑人物韻事，有別於過往好奇領異的嶺南書寫以及關注鬼神精怪、花妖狐媚的志怪體例，此書呈現了嶺南在地的人性，而非物性，在當時編纂《大清一統志》的時代氛圍下，別具突顯嶺南意識之意義。

From Foreign Luxury to Local Delight: Pineapple's Expedition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China

胡中原（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uropean travelers entered East Asia driven by religious missions, trade, and diplomacy. Pineapples, originally from Brazil,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Europeans while later became a cultural symbol of China in European texts and images.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pineapple's entangled history.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Portugal introduced pineapples into mainland China via Macao,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the Dutch first transplanted it to Taiwan, from where it then entered China.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relied heavily on European sources, with limited attention to Chinese-language materials. Drawing on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bencao* texts, literati travelogues, as well as European travel illustrations, it reconstructs the pineapple's itineraries into China, tracing its linguistic adaptations and botanical ambiguities.

Through the pineap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intersecting layers of relationships: (1)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2) among competing European powers seeking to control commercial routes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and (3) within China, between imperial centers and southern peripheries, where local knowledge and botanical practice often preceded official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fruit in China to further explore early global knowledge exchange, economic networks,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highlighting the underlying power dynamics that shaped these processes.

Key Words: Pineapple, Sino-European Exchanges, Botanical Knowledge, Local Gazetteers

從東亞柿到歐洲奇珍：16-18世紀的植物傳播與文化知識構建

梁樹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摘要

本文以柿這一東亞特有植物為中心，探討其在16-18世紀東西方交流中的跨文化傳播及知識構建，分析其如何在全球化初期成為歐洲視野中的異域奇珍與文化符號。柿因地域獨特性與經濟潛力，引發首批歐洲來華者的興趣，傳教士卜彌格（1612-1659）、俄國外交官米列斯庫（1636-1708）都以柿子為大自然中「不尋常的植物」而帶回歐洲，彰顯其「異域性」與其在跨文化知識轉譯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結合歐洲植物學文獻、中國地方志及相關圖像，採用文本分析與圖像學方法，系統梳理柿在中歐之間的文化流動與知識轉譯過程。通過對柿的跨文化象徵的研究，本文揭示了植物學知識與文化交流在全球化初期的交織互動，並進一步闡明東西方如何重塑自然與文化的多重認知。

關鍵詞：柿（*Diospyros kaki*）、植物文化、耶穌會傳教士、自然史書寫

Between Scholarly *Materia Medica* and Everyday Foodways: Indigenous Medicinals in Qing Guangdong

羅淳滄（康乃爾大學博士生）

摘要

十八世紀的嶺南本草著作中包含了許多並非該地獨有的物產，著意突出道地物產，並大量使用地方俗語記錄藥物知識。這些本草的關懷所在，是記錄當地的易得藥材，便人取用。它們對食療的重視，亦反映出作者重塑傳統醫療知識，以符合日常所需的意圖。雖然嶺南本草的通俗性、日用性與本土性均符合早期現代知識的特征，其將嶺南置於清帝國、日常飲食置於傳統醫療知識體系的實踐，卻合於傳統知識的特性。另外，若一同考量嶺南、朝鮮與越南本草，處於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嶺南本草啟示學者審思早期現代性的另一面相，即書寫多重而非線性歷史的可能。

驅瘴：清代臺灣的環境、疫病與異體之身 (Dispelling zhangqi: Dangerous Environments, Perilous Diseases, and Foreign Bodies in Qing Taiwan)

Francis Newman (牛法鑫，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摘要

「地方」是否可能是不「健康」的？清朝統治臺灣時期，許多來自中國沿海的官員與移民皆認為臺灣瘴氣重、環境毒。對他們來說，身體的病與土地的病，密不可分。他們或許感到恐懼，或是身受其害，便以各種方式應對：有的人依據醫書調整飲食與起居；有的人透過祈禱與儀式驅疫除瘴。根據官員的看法，只要開墾田地、「開山撫番」、興建城鎮、鋪設道路與水利設施，企圖從根本改造風土，變能驅散瘴氣。本研究結合方志、遊記、醫書與官文，探討清代來臺各類殖民者如何運用自身知識體系、身體經驗與自然環境，試圖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健康問題。

論文組主題

2.9 明清家鄉禮的文本、論辯與實踐

議題說明

明清時期，禮的經典文本與官方規範如何在具體的社會脈絡中被理解、詮釋乃至施行，其間充滿複雜的互動。本組於此一背景下，聚焦考察明清的家、鄉禮領域中，文本權威如何受到挑戰與再確立，不同禮說如何引發論辯與尋求折衷，以及禮儀最終如何在官方典制、士人詮解與地方習俗的多重影響下被落實。我們尤其關注此過程中考證方法的運用及其意義，並兼及禮儀在東亞不同地域文化間的傳承與變遷，期能更細緻探討此一時期內家、鄉場域的禮儀，在文本規範與具體實踐間的動態關聯。

本組四篇論文分別展示了此主題不同面向的例證探索：第一篇以鄉飲酒禮為例，對比明清《會典》制度變化與學者的論辯異議，呈現官方規範與學者考據在實踐細節上的分歧；第二篇則剖析方苞如何融通三《禮》與家禮經典，嘗試建構其「家—鄉」關係的禮說，此實清代學者回應「禮下庶人」的教化關懷，和「禮學理學化」的表現；第三篇利用《欽定禮記義疏》稿本，深入〈鄉飲酒義〉留下的底本、草本、清本、副本痕跡，揭示確立官方經解權威時，纂修官間的商榷論辯；第四篇比較明代丘濬與阮朝杜輝琬的家禮著作，考察二人如何運用考證調和經典與現實，展現禮學回應實踐挑戰並進行跨地域調適的樣貌。

實踐中的考據——明清鄉飲酒禮的官典與私議

莊民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鄉飲酒禮由來已久，於明、清著於官典，行於學校鄉里，真正達到普遍意義的推行。然細考官方典制，正德、萬曆兩朝《明會典》以及康熙、乾隆、嘉慶三朝《清會典》所載鄉飲酒禮儀注、圖式，卻屢有更動，甚而引發如沈槃、文林、駱問禮、姚履素、李之藻、陸世儀、萬斯大等學者具有復古意味的考據與議論，彰顯時制與經典之間的拉鋸。本文上起洪武頒行的〈鄉飲酒禮圖式〉，下至趨於穩定的嘉慶《會典》，聚焦在鄉飲酒禮中賓僎身份、坐次方位、詩樂採用三方面，梳理官方典制的變易和學者的反思檢討，展示特定禮學議題在明清之間的連續性。

方苞《禮》學的「家—鄉」關係及其教化 義蘊

鄭雯馨（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明代頒行朱子《家禮》於天下後，家禮與鄉禮逐漸結合，至清朝猶然。本文擬比對三《禮》注疏、《家禮》及方苞三《禮》論著，探討方苞的「家禮-鄉禮」觀及其教化義蘊，以呈現社會環境與禮學的交互作用。文中首先觀察行禮者身分、儀節詮釋的異同，以描繪家禮性質的變化。其次，探討鄉的定位及其對「家」的影響，實質說明禮學重心由廟堂轉向「禮下庶人」之教化關懷。最後，闡述方苞藉由「家-鄉」關係，補足〈大學〉「齊家」與「治國」的中間環節，實乃「禮學理學化」的表現。

《欽定禮記義疏·樂記》纂修考

黃羽璿（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杭世駿於乾隆元年（1736）始充三禮館纂修，負責《禮記義疏》之〈學記〉、〈樂記〉、〈喪大記〉、〈雜記上〉、〈雜記下〉、〈祭法〉、〈祭義〉、〈祭統〉八篇，其刪述之過程皆留存於今見《三禮義疏》稿本四種——底本、草本、清本、副本。乾隆八年（1743），杭氏因言事離館，由張為儀遞補，同年，任啟運升副總裁，考察〈樂記〉稿本呈現的纂修紀錄，發現杭氏案語多取當代學者成說，包括李光坡、納蘭性德、朱軾；而張氏接手改纂後，或為奉「任大人」意，一以任啟運為依歸，盡刪杭案而替之以任氏《禮記章句》，導致今見《欽定禮記義疏·樂記》中未標姓氏之案語半數皆為任說。本文透過《三禮義疏》稿本還原案語之來源組成，可知《欽定禮記義疏》實際上隱示了清初（中）禮說之階段性成果。

關鍵詞：杭世駿、〈樂記〉、《三禮義疏》、稿本、張為儀

明清中、越家禮書之考證方法與實踐：以丘濬《文公家禮儀節》與杜輝琬《文公家禮存真》為中心

劉柏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明儒丘濬編撰《文公家禮儀節》流傳甚廣，東亞諸國皆見此書蹤跡。丘濬於書中對名物禮意有所考證，以矯當時「儒者失禮」之弊。越南阮朝嗣德二十三年(1870)，南定省儒者杜輝琬為糾正越南民間多循《壽梅家禮》行禮風氣，乃參酌明代《性理大全》、署名楊慎《家禮儀節》，旁及古禮經，編成《文公家禮存真》，對喪祭二禮內容多有考證。本文旨在梳理丘、杜運用考證方法於家禮書中之現象，針對二人考證的對象、徵引文獻、禮俗折衷、禮意建構等面向進行觀察，以期探討明清時期中、越家禮以考證回應現實的表現及意義。

論文組主題

2.10 輯古・考禮・釋經——清代「漢學」視域下《春秋》三《傳》的詮釋途徑

議題說明

漢代今古文之爭，在《春秋》的領域中尤為激烈。時至清代，惠棟首開「漢學」之風，治經重訓詁名物，依循「古義」，考索典章制度。清儒於此脈絡下，甄別漢代今古文之學說，作為考索禮制與《春秋》三《傳》交會的重要切入點。儀徵劉氏提出「釋《春秋》以『周禮』明之」，以賈逵、服虔等漢儒之說為注，釐析「周禮」。考禮過程中，秉持「師授各異，理宜兼存」的理念，將漢儒爭今古的論述，變為述古義的證據，破除師法之藩籬，建立以「周禮」解釋《春秋》的架構與路徑。陳立《公羊義疏》重述今文禮制，以證何休及《公羊傳》之旨趣，並於何休家法未申論處，藉周公「非王而制禮」以供孔子改制之正當性，且於《公羊》學「文質循環」的框架下，解釋今古禮制異同與互證的問題。晚清廖平《今古學考》所持「平分今古」說，廣受重視，然其《起穀梁廢疾》與《箴左氏膏肓》，不僅是回應劉逢祿《起穀梁廢疾》與《箴左氏膏肓》的重要著作，更可藉其《穀梁》學視野，觀其如何回應何鄭之爭、《公》《左》之辨等今古文議題。本組擬以禮制與《春秋》三《傳》之融通為主軸，從清代「漢學」對漢代今古文經說的運用切入，闡發輯古、考禮以釋《春秋》，推溯聖人大義的解經體系。

今古文之「辯」與「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引何休、鄭玄論辯探蹟

張壹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儀徵劉氏作《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主要取義於賈逵、服虔等漢儒之注釋。漢儒詁訓師說、家法各有脈絡，《疏證》裒集漢代今古學各家的論述，嘗試以「師授各異，理宜兼存」的理念，破除師說各異藩籬。其中，有若干引用何休、鄭玄論辯作為「注」，且為之疏證的現象。藉此現象，可以管窺劉氏藉由申論漢儒今古文經論難的內容，達到劃定解釋的邊界，以辨明禮制、解釋《春秋》的目的。

「三代禮」到「春秋制」： 陳立《公羊義疏》對今古文禮制的再定位

陳威睿（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文以清儒陳立《公羊義疏》為中心，從今古文禮制之辨析及運用，探討他論證《公羊傳》的學術面向。過往研究多認為陳立遵循何休家法，不以古文混淆今文經說，但若細讀《公羊義疏》，卻可見陳立在特定情境下援引古文禮制輔助解讀《公羊傳》義的情況。有鑑於此，本文將從兩方面切入討論：一、考察陳立是否藉周公「非王而制禮」之例，為孔子改制提供正當性；二、探討他在「文質循環」框架下，以古文禮制詮釋《公羊》學之限度。預期本文的成果，能深化陳立以禮解經思想的討論，並增益清代「漢學」治學方法的理解，為相關研究提供進一步的方向。

《穀梁》學視域下的何鄭之爭——論廖平 對東漢末年今古之爭的認識

程雪茹（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博士
生）

摘要

東漢末年何休與鄭玄的《春秋》論爭是為今古論戰之高峰，時至晚清，三傳異同與今古之辨亦再成學界註之焦點。本文擬以廖平《起起穀梁廢疾》與《箴箴左氏膏肓》為對象，首先梳理其對《春秋》三傳異同的理解，其後，復針對兩書內容進行細部考察，梳理廖平對劉逢祿的質疑與回應，辨析其對何鄭之爭的不同詮釋。最後，本文將結合廖氏其他著作，以見其如何以《穀梁》家之視角對集中於《公羊》與《左氏》之辨的今古學問題進行回應。藉此，或許可在廖平《今古學考》之「平分今古」說之外，提供一條考察其今古學研究脈絡的全新視點。

論文組主題

2.11 晚清文學中的跨域行旅與文化轉譯

議題說明

本小組以「晚清文學中的跨域行旅與文化轉譯」為主題，探討晚清文學如何透過跨文化經驗、行旅書寫與翻譯實踐，展現多重文化認知與文學型態。藉由遊記、教科書、小說譯述等多樣文體，分析晚清文人跨越地域、國族、語言、文化與文類邊界的書寫表現。

羅秀美從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切入，分析其在轉譯日本下田歌子《家政學》過程中，特別是對中西飲食話語的重寫與在地化。鄭雅尹則探討巖谷小波日譯《格理弗遊記》中〈小人島〉如何進入臺灣漢文人蔡啟華〈小人島(誌)〉的翻譯視野，並展現文體轉換下的文化轉譯與文化選擇。陳室如聚焦晚清中國人遊歷歐美時對西方兒童形象的觀察，指出兒童在中西文化理解與轉譯中的媒介角色。黃郁晴則以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深入長江河谷》為例，從女性旅行者的視角，探討十九世紀晚清中國在歐美筆下的異國再現與性別、文化、帝國經驗交織的行旅書寫。四篇論文分別從飲食話語、兒童形象、文體翻譯與行旅書寫切入，呈現晚清文學中「自我」與「他者」在跨域與文化轉譯中的互動與位移，展現晚清文學跨文化實踐的繁複意涵。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的中西飲食話語——兼論它對日本下田歌子《家政學》的（不）接受

羅秀美（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是下田歌子《家政學》四個中譯本之一，但其實是「最不像譯本」的重寫本，只接受《家政學》的架構與概念，全書幾乎以中國語境「重寫」，尤其是飲食部分。因此這部譯本其實也是她自覺撰著的專書。其次，《聶氏重編家政學》貌似傳統，書中篇幅最大的飲食話語卻透露曾紀芬對西餐飲食文化與傳統中國食單的雙重接受。第三，《聶氏重編家政學》的飲食話語是傳統文人書寫飲食中少數的女性寫作者文本，由此開展的飲食話語與性別文化交織的向度饒富興味。綜言之，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的中西飲食話語值得深入探賾。

晚清歐美遊記中的兒童形象

陳室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摘要

西方現代兒童觀約於 15 至 17 世紀逐步形成，兒童被視為需特別照護與教育的獨立個體。晚清赴歐美的旅行者一開始對兒童的理解多仍沿襲傳統視角，以家庭與社會結構為主。然而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兒童在這些記敘中不僅是異文化的見證者，更以直接而鮮明的驚奇反應，呈現出新奇事物初次進入華人視野時的感知經驗，並成為跨文化理解與翻譯過程中的一種獨特媒介。本文擬以晚清歐美遊記中的兒童形象為研究焦點，透過旅行文本中對西方兒童教育、社會地位與日常行為等描繪，探討兒童形象如何映射出晚清旅人的異文化認知。

蔡啟華的文言體〈小人島(誌)〉(1909)譯本考察：兼論巖谷小波(1870–1933)《世界お伽噺》系列在晚清/明治時期的東亞轉譯

鄭雅尹（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巖谷小波(1870–1933)為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重要推手，其主編的《世界お伽噺》(1899–1908)系列，不僅在日本流行，也傳播至中國、臺灣、朝鮮等地。日治時期臺灣文人蔡啟華(1863–1918)以文言文翻譯的〈小人島(誌)〉(1909)，為目前所知臺灣最早的《格列佛遊記》漢譯本，其底本即巖谷小波《世界お伽噺》中的節譯本。本文首先探討蔡啟華漢譯〈小人島(誌)〉與巖谷小波日譯本的關係，進一步分析《世界お伽噺》如何進入大稻埕公學校教員蔡啟華的閱讀視野，最後從文體角度比較日譯的言文一致體與漢譯的文言體，討論二十世紀初期臺灣漢文人翻譯時的文體選擇及其文化意涵。

一位英國奇女子的中國探險：以 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 川藏行旅紀錄為主的討論

黃郁晴（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約聘助理教授）

摘要

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 1831-1904)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一位傳奇女性冒險家。為了改善背疾，透過行旅療癒，一八五四年赴美加，自此醉心旅行三十年，冒險足跡遍訪澳洲、夏威夷、印度、中東、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中國等。旅行紀事極富傳奇性，傳奇成就因此成為英國皇家地理協會的第一位女性成員。本文聚焦其六十五歲(1896)來中國川藏行旅紀錄《深入長江河谷》(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之討論，一方面著眼伯德的他鄉經驗和體驗，以及自我個性展演；另一方面試圖將其人其行放在晚清中國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女性進行思索，凸顯十九世紀西方女性行旅書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個人組主題

2.12 在裂變中救贖：清代民國詩文的倫理、身體與焦慮

議題說明

從明亡、盛清到清亡，政治裂變催生精神困境，有關詩文是心靈秘道，是思想載體，卻容易被整齊劃一的宏大敘事遮蔽，因此探尋個體的幽微心事是本小組的共同旨趣。詩文表層的隱語系統、意象網絡、歷史面具有利士大夫曲折流露內心深處未被他人甚至自身理解的焦慮情緒與救贖思想，於是從國體、身體到文體的隱喻結構交織而生。王夫之詩文的衰病書寫，將形骸之衰老苦痛化作存活之實現動力；浙東地區明遺民詩作的眼疾書寫，別有幽懷寄寓重見天日的復明希冀；汪啟淑的上京紀行詩，在山川與建築投射相互拉扯略顯病態的負罪感與救贖感；清遺老詩詞的子嗣書寫，示現倫理秩序崩毀後的憂患、頽靡與破碎的生命變局。細讀這些苦心經營的詩文，它不失為一面鏡子反映歷史人物的精神面貌、複雜情緒與鮮活記憶，有效呈現文人在盛世或衰世的病態心理與救贖寓意，可豐富宏大歷史敘述之外的細節圖景。要之，清代民國詩文中倫理、身體與焦慮的書寫，既關乎政治裂變、人心裂變，亦關乎文士在國體與價值觀崩解後如何啟動心理調適機制，遂在生死、義利、進退、繼絕的張力之間尋求妥協的可能，相關詩文的文學技藝、情感皺摺、政治寓意有待深入抉發。

「觀我生」：論王夫之詩文中的衰病書寫和身體反思

張歡歡（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

摘要

王夫之對身體有自覺的深刻觀照，致力於將「身所生起之事」納入生命反思以「觀我生」。本文首先從王夫之晚期文本中反覆書寫的「病骨」「朽殼」「老醜」等形驅衰敗，說明其持續的病理狀態與衰老進程，並分析其明亡後「此身無主更無依」的隱喻結構和生存困境。其次，本文論說王夫之如何將形骸苦痛衰老轉化為存有之思。他通過「珍重凋零却後身」、「愛身以全道」的身體實踐和身體反思，收拾殘身病骨，以身作藥，賦義於「活埋」，試圖將身體衰敗的焦慮化作自我意義實現的動力。

關鍵詞：王夫之，詩文，衰病書寫，身體反思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輯錄詩作的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

吳志廉（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前賢多從編書體例、編纂意圖、鄉邦文化、文獻價值的外部視野研究全祖望輯纂的《續甬上耆舊詩》，但較少從內部的視野闡釋佔書中最大比例的詩作。本文直接切入書中詩作，挖掘當中數量與質量最為矚目的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以豐富學界對《續甬上耆舊詩》的認知與引起相關議題的反思。要之，本文抽繹書中詩作有關追究甲申之變的價值判斷，對於考察從古到今不同人思考明緣何而亡的解答歷程，具有樹立起點的參照作用；本文以明亡清興的動態歷史脈絡觀照書中寫於崇禎帝死忌三月十九日的詩作，並以這些詩作補充政權交替下的心態史；《續甬上耆舊詩》收錄不少有關林岳隆的眼疾書寫，揭示明清之際士大夫在政治審查與言說禁忌之下鍛鍊出一個新的隱語——「從失明到復明」，此一隱微修辭之詩作技藝與政治寓意有待深入抉發，我們亦能藉此重探輯纂者全祖望游移明清兩朝之間微妙的政治立場。

關鍵詞：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明清之際，國難書寫，復明隱語

盛世文人的自我救贖：汪啟淑的上京紀行詩

葉倬璋（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摘要

乾隆三十九年，鹽商汪啟淑上京捐官，他從茸城開始，經揚州、高郵、陰平、兗州、新店，再從雄縣入京，沿路有詩。這種上京紀行詩，著重抒寫上京者的自我與外界對照的心理；而且上京目的、行旅時間的明確，使其照射出動態的心理和情感。是以自我不斷跟山川、建築、遺跡、官民、民族、傳統等互動。汪啟淑的上京紀行詩，將盛朝下仕隱掙扎、士商身分矛盾與捐官者心理，及自我價值的反詰等，寄託在沿途所歷之山川和歷史遺跡，使「朝聖之旅」在負罪感與自我救贖之間往復不絕，略顯病態，又為觀察盛世文人的幽微心理提供一個實在的視角。

未了因與他生果：清遺老詩詞中的子嗣書寫

陳建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摘要

古典遺民總是有待，在中國崇尚循環的世界觀中，天道好還，王者必興。縱使遺民不世襲，眾人還能如此自我開脫：族人子弟尊祖、敬宗、收族，則天下尚不亡。然而，舊秩序崩毀後，清遺老憂患、頽靡與破碎的生命景觀，有逾前代。他們間最積極的行動，只是些組織鬆散又嫌兒戲的復辟之舉，英雄缺席，妄想不再，「革命自有後來人」，而遺老一輩似乎沒有。無論生子（「來客作賀神俱懶，乃母佯歡語不多」）、殤子（「但見衰翁時哭子，近來顛倒是乾坤」），他們詩詞中的子嗣書寫充滿裂變之聲，救贖兩字，該如何在書寫中成其可能？

遠距會議室

論文組主題
3.1 地氣的接通：明清的地方性知識體系與 帝國基層治理
議題說明
<p>本小組旨在探討明清時期中央與地方如何透過地方性知識進行溝通與治理，形塑出具彈性、多層次的統治機制。相較於以往常將明清視為高度集權的官僚帝國，近年研究則強調其治理的在地實踐特性，尤其在基層社會中，政策推行需仰賴地方中介者的詮釋與轉化。此處的「地方性知識」涵蓋地理、禮俗、宗教、制度操作、財政實務、空間認知等多種形式，既扎根於地方社會的「地氣」，又在國家規訓下與官方制度互動、協商與再造，展現帝國治理在不同區域與層面的多樣面貌。</p> <p>本小組由四篇個案研究構成，涵蓋鹽務、邊界劃定、游移人口結社及民間信仰，從制度與社會的交界，分析地方知識如何轉化為治理資源，或反之成為帝國控制的對象與挑戰。</p> <p>我們將圍繞以下核心問題進行討論：1.地方性知識的建構、傳承與 實踐方式；2.地方官與地方精英如何運用知識應對挑戰；3.地方性知識與中央制度間的互動與張力；4.不同區域與時期地方知識形式與功能的差異。透過上述議題，本小組企圖重新審視明清基層治理的知識條件，也希望提供一個跨越制度、文化與實務層面的整合性視角，理解地方社會如何以自身知識與實踐，形塑帝國的統治秩序。</p>

清末淮鹽總棧的遷徙與地方治理的爭論

江豐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晚清以降，由於戰亂的影響或是長江水文的改變，身負兩淮鹽運重責的淮鹽總棧，曾多次遷徙。對朝廷來說，兩淮鹽稅乃國家財政的重中之重，淮鹽總棧的選址，影響食鹽的運銷效率、管理品質甚鉅。然而，淮鹽總棧的坐落處，也必然吸引大量來自他處的商業投資與勞動人群，為地方帶來預料之外的風險與潛在的治理危機。這也意味著，中央認為有益於國計的舉措，卻很可能造成地方的動蕩和失序。

本文以淮鹽總棧的選址與遷徙為例，探討地方官員如何運用地方性鹽務知識，與朝廷政策進行折衝與調適，並將其轉化為地方的治理資源，創造彼此皆能接受的治理形式。

清季西北中俄勘界交涉的地方實踐——中 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滿文外交字據研究

蔡仲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滿文檔案的發掘與解讀，已成為深化清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聚焦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一件鮮為人知的滿文檔案，透過文本解讀重構歷史脈絡，揭示伊塔地方駐防旗員在第一線承載對俄交涉的外事職能。該字據滿文用字簡單內容具象，具語言學習價值；所紀錄 1900 年伊犁駐防派員會同俄方履勘塔爾巴哈臺段邊界、檢查修補沿線界牌的過程，不僅提供勘界交涉的第一手視角，也補充清季劃界的實務操作面向，使中俄國界得以清晰不再是幻影。本文期望回應滿文檔案於清季外交、邊務研究的潛在貢獻，並為清代國界形成的既有理解提供地方角度的實證基礎。

清代臺灣地方社會遊移人口的結社活動與清政府地方治理——戴潮春事件前的臺灣 (1684-1865)

齊汝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政府將臺灣納入版圖，閩粵地區的漢人即憑藉地緣之利陸續移墾臺灣。大量隻身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遊移的人群，自來臺班兵官員乃至於一般墾民為求互助，結社風氣盛極一時。這些種類繁雜的結社團體中，又以發展出擬血緣關係的秘密社會，因其具有互助互靠、心靈寄託等功能，佔數不少，除了本身具有變天思想的新興教派外，多半不具反政府的特性。而清政府在面對帝國龐大領土的治理策略上，除了在大方向具核心（core）與邊陲（periphery）的治理差異外，亦對各地有著「多元」的治理策略手段，這個部分的施展體現於清政府的統治上以皇權結合朝野官員特殊的奏摺制度靈活運用，同時亦具有完整系統性的法典——《大清律例》為依據。因此，本文將以戴潮春事件前為時間界限，從清代臺灣地方社會與清政府間的互動，探討臺灣社會隨著漢人移入發展及變遷下，臺灣的移墾社會特徵如何影響清政府的治理方式與策略，以及清政府的社會控制手段如何影響臺灣的地方社會發展樣貌。

孝女與女神：明清時期的曹娥論述與神格轉化

曾双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曹娥，東漢浙江上虞縣巫者之女，投江尋父而死。本文從明清官方與士人的視角，探討二者如何論述曹娥，同時也關注百姓對曹娥信仰的理解與實踐，如何使曹娥在「孝女—女神」（「倫理—神聖」）雙重屬性之間擺盪。本研究發現，儘管國家將曹娥標誌為「孝」的象徵，納入祀典，作為治理地方的資源，然地方社會自有關於曹娥神格的口傳知識流布。在明清國家教化思想與地方性知識共構的宗教場域中，曹娥信仰受地方神明的競爭、百姓的宗教需求以及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影響，其發展終究未能如媽祖般成為全國性的神祇。

論文組主題

3.2 地景・奇觀：近世東(南)亞的地理文本與知識環流

議題說明

明清積聚異代並世的「敘述共同體」，將地理文本經重組、剪輯、刪略、增益、改寫以編織知識、傳承概念，跨域散播於東亞各國，產生文化碰撞與融匯遞轉。本組成員對方志、插圖、畫譜、地圖、遊記、報導等多元地理文本進行考索：一、明清幾種西湖方志以文化技術纂輯知識，讀者被想像力裹挾入帝國視野。融合考古徵實、文學漫遊與視覺化插圖等面向，衡以書籍史脈絡，考察權力的鑿痕，並觀照東亞諸國。二、明末《名山勝槩記》東傳，韓日文人各自運用審美手法，或凸顯儒家正統、或傾慕江南風光、或描摹福地洞天，映射並共享同質異趨之價值觀和世界觀。三、鴉片戰爭給日本幕府帶來危機感，迫切由蘭學轉向洋學。美傳教士禕理哲傳入、介紹五大洲人文地理之《地球說略》，掀起西學漢籍翻刻風潮，藉多本比對與紙張分析考察中日引進西學之異同。四、1885 英國殖民緬甸，中文遊記熱切描繪末代國王錫袍即使謬之千里亦不停歇，卻引發中國菁英滇緬邊地的科學考察風氣。菁英自我、錫袍他者、滇緬地理想像與民族主義興起，將如何互文共生？本組四項子題環繞著漢籍東移、西學傳入之文本路徑、帝國視野與殖民想像等維度，構建近世東(南)亞之人文地景，並輻射出層次富饒的知識環流奇觀與文化轉型意涵。

帝國馴化的地表：明清地理圖籍的知識纂輯與東亞觀照

毛文芳（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明清方志如宮廷勅編《盤山志》、《避暑山莊圖詩》、全國性《一統志》、邊疆《西域圖志》等，莫不顯現著帝國階序與皇權景觀。本文擬以「西湖」為核心，探討多種西湖方志，衡以書籍史脈絡與知識纂輯所涉文化技術，融合考古徵實、文學漫遊與視覺化地景等向度，考察帝國權力的鑿痕，並試與東亞諸國之地志對話如：江戶時代好古賞鑑產物「名所圖會」、岡田玉山尚友編述《唐土名勝圖會》；朝鮮時代韓弼教繪編《宿踐諸衙圖》；越南北使文獻寫本《皇華使程圖》。經古今「敘述共同體」前仆後繼的努力，東亞人文地理的知識融接創造著無盡的共享資源。

《名山勝槩記》在朝鮮與江戶文人中的活用樣態

申正秀 (Shin, Jeongsoo, Associate Professor, Major of Korean Cultural Studies,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摘要

明末編纂《名山勝槩記》蔚然成風。此風傳入朝鮮與日本後，兩國文人分別對其進行各具特色的運用。以此為背景，本研究系統考察現存選集之目錄、筆寫本、抄本、序跋、作品及圖像，探討兩國文人在審美趣味與世界觀之相似處及獨特性。朝鮮文人以儒家價值觀重構山水地理體系，著力彰顯中華正統與孔孟之道，此特點在李麟祥的《名山紀》等作品中尤為突出；而江戶文人則更注重圖像系統的構建，例如鈴木芙蓉的《名山勝槩圖》，展現道教名山與洞天福地的象徵意義。本文最終將揭示兩國文人如何以《名山勝槩記》為藍本，重構出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傳統。

東亞紙張之間的西學流轉：《地球說略》 中日版本的物質性與知識傳播

徐小潔（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

摘要

《地球說略》為美國傳教士裨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1819-1895）所著，1856年在寧波美國長老會印刷所華花聖經書房出版。四年後日人箕作阮甫添加訓點並刊行，後又多次再版。此書內容豐富，附有多張地圖，詳細介紹五大洲物產風俗等多樣化信息，成為東亞近代地理知識轉型的重要見證。《地球說略》在東亞的流通，不僅是語言的轉譯，同時也是東亞書籍出版印刷史轉折期的產物。本報告以紙張為切入點，結合書誌學與物質文化視角，探討中日《地球說略》版本所呈現紙張選材、印刷技術等形式之異同，進而揭示這些物質細節如何反映各自語境中對西學的理解、再造與互動。

「放流何處置君王？」——晚清民國緬甸 末代國王書寫的地理想像

郭勐（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

摘要

西元一八八五年底，英國攻克曼德勒，征服上緬甸。戰爭結束，貢榜王朝末代國王錫袍被流放至印度 Ratnagiri。緬甸喪國在中國掀起巨大的漣漪，之後幾十年，不時有人論及緬甸淪陷和錫袍命運。晚清民國的新聞報導、詩歌和遊記中，錫袍的形象不斷變化，且其流放地甚至出現謬之千里的種種版本，確切地點並無人在意。對比強烈的是，上緬甸被殖民竟引發中國菁英對滇緬邊域的地理考察熱，咸強調要採取科學精確的方式。透過謠傳和勘察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本文探究中國菁英自我想像與對錫袍他者想像之間的互動，以及滇緬地理想像與民族主義興起如何相輔相成。

論文組主題

3.3 明清大眾識字與女性識字

議題說明

傳統的明清識字研究專注於科舉體系與精英群體，相對忽視文字在庶民階層的滲透性實踐。本組以書信、雜字、小說、圖像等新材料揭示文字在大眾生活中的多元樣態：從跨國宗教網絡中的女性書寫、鄉土雜字讀物的知識生產，到市鎮空間的商業文字景觀。三者共同證明，庶民識讀能力不宜以「識字率」作為單一指標，而需關注「功能性識字」「自我涵化」等差異化的動態過程表現。此過程展現出跨越城鄉與性別之異的實用主義訴求。清代鄉村地區廣泛流傳針對性的雜字識讀文本，以滿足民眾習得各種應對日常的文字能力。而此以日用性為旨的文字活動，亦涵蓋中下層女性的識讀體驗，並展現出以宗教與商業目的為主的雙重路徑：天主教的教義傳授體系是的下層女性獲得基礎讀寫能力，宗教語匯更成為此類女性身份認同工具與情感表達載體。市鎮經濟催生的「文字視覺型」街頭景觀，成為參與商業活動的女性務須應對的職業空間，促使我們重視小說中的下層女性識字書寫。在龐雜多緒的民眾文化實踐之中，識讀成為文化整合之於下層社會的重要途徑。循此出發，文字可作為獨特的跨越性工具，透析明清社會分層、性別分工以及知識流動等現象。本組研究期待明清識字研究從「量化統計」向「實踐分析」、從「精英特權」向「庶民生活」轉型，為探討近代中國民眾識字現象提供範式參考。

天主教與晚清女性識字研究

李紀（香港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摘要

海外教會檔案館零散收藏天主教女性書信，本研究以筆者數年所收八十餘封書信手稿為研究對象，考察天主教在性別身份構建與基層識字能力發展中的歷史作用。天主教女性書信文獻，為探究晚清底層女性讀寫實踐與信仰表達提供了珍貴文本。天主教傳教體係通過要理傳授，突破傳統教育的性別限制使底層女性獲得基礎讀寫能力。女性書寫者通過模仿宗教文本，將宗教概念融入私人書寫，宗教語匯既成為身份認同的建構工具，亦被創造性轉化為情感表達載體。宗教客觀上推動了邊緣群體識字與讀寫能力的發展，書信依託跨國宗教網絡，促成底層女性全球互動。

明清「文字視覺型」社會中女性平民的識 讀能力

徐寧（香港大學博士生）

摘要

識字往往被認為是閨秀賢媛的文化特權，而明清小說提供了非精英階層女性接觸文字活動的特殊材料。此類女性群體主要分佈於市鎮與城鄉聯動地區，包括下層文人之女、商賈家眷，以及從事職業活動的「三姑六婆」等。她們在日常交際與經濟活動中展現出層級化的功能型識讀能力。鑑於正統史料對此記載匱乏，平民女性的識讀研究應結合多元材料予以考察。透過明清市井風俗畫可知，經濟繁榮的市鎮地區出現了「文字視覺型」的街頭景觀。市鎮街巷中密集分佈的文字標識構成了理解功能型識讀能力的社會語境，亦直觀呈現了市井婦人參與文字空間的具體方式。

「文字下鄉」：近世中國雜字讀物的知識 社會史考察

溫海波（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摘要

雜字是近世中國鄉村社會生產流通、認讀使用的識字讀物，透過雜字生產流傳的「功能」與「歷史」，有助於重新認識傳統中國識字的意義，重構鄉民與文字關聯的動態進程。這類由鄉間下層知識群體編纂的讀物，雖被士人貶斥為鄙俗淺陋，卻因滿足民眾習得各種應對日常的文字能力，而在鄉土社會廣泛流通。從費孝通倡導的學術反思出發，下沉到民間社會的知識脈絡，「文字下鄉」應視為動態持續的實踐而非靜態的結構。這一考察突破了識字率統計的迷霧，折射出超大規模農耕文明對基礎文字的多元需求與供應，也暗含中國社會整合的獨特文明邏輯。

論文組主題

3.4 明清士人融貫幽明的倫理與治理

議題說明

張載利用氣之幽明聚散開拓天文地理的知識界域；朱熹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解釋鬼神與物的問題。本組三篇論文主要探討明末清初士人如何援引、反思前人關於「幽明」的視野，並展開關於人與人道的論述。

明志怪小說比起前代更重視利用類目形式表達對常、異的認知。以「天、地、人」表述廣大悉備、渾淪詳密之宇宙存有，在鬼神的位階游移中，凸顯人既是能夠賦予意義的認識主體，亦能在萬物幽明、顯隱中實踐道德自性之人文化成。

透過安世鳳、程智、許三禮和宋儒的對話，探究治理與幽明兩界的關係。天和鬼神在儒學治理中扮演何種角色？人道的意涵以及人的作為對於幽明秩序又產生何種影響？

再則進入儒家「賢愚善惡與死後歸趨」生死觀的核心議題，以胡統虞、王夫之、毛先舒為探討對象。當儒者強調人生前道德修養必然影響死後歸向時，他們如何描述人死後之情狀？關於多次生死變化的論述，在儒學史上有何新意？如何與佛教輪迴觀區別？如何既反駁又襲承宋儒的思想？

本組的討論雖集中於十七世紀，凸顯明末清初士人在知識、倫理修身、治理等面向所顯示出的獨特性，但也提供長期歷史比較的視角。無論透過與前代志怪小說類型的比較，或與宋儒思想對話，三篇論文都涉及宋元以降的變化與比較。

明清儒士論個人修身與生死變化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明末清初許多儒家士人都強調不應以形氣論生死，他們反對舜與跖死後同歸於盡的看法，並主張人生前的道德修養會直接影響死後之情狀，顯明賢愚善惡之別。因此，我們在十七世紀的儒家士人的論述中，也確實看到比前代更多關於人死後情狀或生死變化的描述。本文主要研究胡統虞（1636-1697）、王夫之（1619-1692）、毛先舒（1620-1688）、方殿元（1636-1697）等個案，說明他們如何論述個人修身與死後情狀的關係，如何描述生死變化，也探討他們如何自覺地與佛教區辨，並將進一步檢視他們如何界定儒學，他們的論述在修正宋儒之餘，是否也承繼了宋儒闢佛與公私義辨之辨的傳統。

明志怪小說分類編輯的知識與倫理

呂柏勳（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摘要

明代志怪比起宋、元更重視利用分類編輯把握對常、異的認知，將原先隨聞隨記的筆記體裁分門別類，把小說當作治學、格致的對象。本文試圖從知識史的角度探討書籍的分類情況，並思考如何藉由類目編排神鬼物怪的知識建構，反映不同層次的天人關係。大致區分三種形式：一是「三才分類」，仿效類書運用天、地、人存有思維，將神鬼物怪納入原先的知識體系，企圖建立一套能夠歸納異事異物並彰顯編纂意圖的模式。二是「以人為首」，按異人、鬼神、物類排列，主要以仙道、僧佛作為書寫目標，標榜人的可能性和超越性。三是「德行為先」，儒家倫理道德先於佛、道被提至首位，以詮解道德知識的需求結合鬼神禍福、輪迴報應作為天道施予賞罰的判準，帶有喻勸戒的善書色彩。

關鍵詞：分類、三才、知識史、幽明

晚明清初儒學之融貫幽明的治理論述

林峻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摘要

在明清之際儒學思想中，將幽、明二者之關係納入於儒學的知識範圍，並探求如何妥適地維繫幽、明二者間的和諧，呈現此際儒家士人著力於思考治理活動所及之範圍、規模及其特徵為何的問題。本文將以安世鳳（1583進士）、程智（1603-1651）、許三禮（1625-1691）為主要案例，藉以考察兩個問題：其一，天與鬼神在人之恪盡修養與倫職的過程中具有何種角色？其二，人之政教實踐對於幽、明二者間之關係可能產生何等影響？在這幾個個案的文本中，明顯地蘊含有與宋儒對話的意味，因而我們能夠從中觀察，宋儒之說在明清之際儒學的視野中如何被檢討，以及由此構築出之治理論述的面貌。

論文組主題

3.5 明清文化與韓國繪畫的連動

議題說明

本小組將探討明清文化與韓國繪畫的關聯現象中尚未被研究的內容，旨在揭示明清時期的文化力量如何向周邊國家擴散，以及中韓兩國在東亞文化史形成過程中的連動關係。朴慧美將關注明代的上層文化直接傳入朝鮮，以及促發了兩國文化交流的明朝使臣訪朝事例。探討明使們在朝鮮展現的學問、思想、文化行為與禮物交換等情況，並結合朝鮮時代繪畫如何對此作出回應，從而揭示明使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作用。周鶴群將分析明清時期盛行的神仙圖文化，如何被朝鮮後期王室接受且轉化為名作《群仙圖》，展現朝鮮的儒教王室對道教主題所表現出的關心與趣味性結合。元勢進則將以朝鮮十六世紀性理學者李滉所眷錄、出自明代朱權《活人心》的《導引圖》(八幅)為中心，對比中日韓三地的各版本，考察朝鮮性理學者對明代道教養生法的接受與轉化。最後，高蓮姬將考察目前由韓國私人收藏且尚未公開的作品(暫名《百花圖卷》)的國別與製作時期。指出此作品雖有十八至十九世紀朝鮮文人的題跋，實際上應屬明清時期中國流行的花卉長卷流入朝鮮的例證。總體而言，本小組以朝鮮時代繪畫文化的多樣面貌為研究對象，通過揭示明清時期政治、文化與藝術對外影響力的研究，旨在呈現兩國文化之間的連動性。

從「訪朝明使」看明朝與朝鮮的繪畫交流 (Painting Exchanges between Ming– Chosǒn through Ming Envoys)

朴慧美 (Park, Haemi, Ph.D Candidat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摘要

朝鮮自建國初至明清更迭，就一直與明朝保持着正式的外交關係。負責明朝與朝鮮交流的使臣們是由國家任命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代表了各國文化水準的文化精英。隨著外交交流越發倚重文化能力作為手段，他們的接觸呈現出兼具私人性與官方性的特徵。

本研究擬對截至明末約 200 餘次赴朝的明朝使節進行目錄化整理，考察其文化背景，探討他們攜入或攜出朝鮮的繪畫作品，以及在外交過程中進行的作畫活動。而後確認這些作品對兩國具有何種意義。另外，還將分析隨著時代與局勢的變化，明使的角色、身分與地位的轉變如何反映在繪畫交流之中。

朝鮮後期神仙圖中的明代版畫影響考察——以金弘道《群仙圖》（1776）為例

周鶴群（成均館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朝鮮後期神仙圖發展過程中，明代版畫所產生的影響，並以金弘道《群仙圖》（1776）為核心進行具體分析。朝鮮後期神仙圖一方面繼承傳統圖式，另一方面又積極吸收外來圖像資源，形成了具有複合型特徵的畫風。特別是刊行於萬曆年間，後傳入朝鮮的《有象列仙全傳》、《仙佛奇蹤》、《三才圖會》等明代版畫集，對朝鮮神仙圖的圖像構成與表現方式，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本文將通過對明代版畫圖像與朝鮮後期神仙圖的比較，細緻檢討《群仙圖》中登場神仙形象的來源與特徵，並探討朝鮮後期神仙圖與明代版畫集之間的影響關係。

從退溪李滉《導引圖》看 16 世紀明代與朝鮮養生觀之一隅

元勢進 (Won Sejin, Ph.D. Candidat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摘要

朝鮮十六世紀性理學者李滉所眷錄、出自明代朱權《活人心》的《導引圖》（八幅）為中心，對比中日韓三地的各版本，考察朝鮮性理學者對明代道教養生法的接受與轉化。“導引”意指“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是一種自古以來在東亞地區長期流傳的養生修煉方式。退溪李滉（1501～1570）曾親筆抄錄臞仙朱權（1378～1448）所著《活人心》，並臨摹其中八幅導引圖，現傳於《李滉筆蹟-先祖遺墨帖》之《活人心方》中。明代朱權所撰《活人心》傳入朝鮮後，陸續刊行了羅州版本、慶州版本等多種翻刻本。本文旨在考察韓國、中國與日本現存《活人心》諸版本現況，並以李滉所繪導引圖為中心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其作為手抄本的意義。進一步，本文嘗試以此為基礎，分析並考察 16 世紀朝鮮與明朝在養生文化上的一隅。

明末清初花卉文化的東傳：論姜世晃、金良驥跋《百花圖卷》所扮演的角色

高蓮姬（Kho, Younhee，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副教授）

李東拳（Lee, Dongkook，韓國京畿道博物館館長）

摘要

《百花圖卷》為現由韓國私人收藏的絹本花卉長卷，附有朝鮮後期文人畫家姜世晃（1713–1791）與金良驥（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前期，畫院畫家金弘道之子）的題跋，內容以沒骨設彩技法依季節排序描繪了二十餘種花卉。該作品的作者、創作時期與國籍皆未確定。本研究將此畫視為起源於明代吳派並延續至清代的花卉長卷傳統之一，試圖對其內容進行詳細探討。

朝鮮後期花卉文化的興盛在文學與繪畫領域皆有深刻表現，本研究旨在討論《百花圖卷》作為一幅自中國傳入，曾為18世紀後期多位優秀畫家所觀賞的作品，如何對韓國的花卉文化與花卉圖表現產生深遠影響。

論文組主題
3.6 衝突與交融：晚清藝術在全球現代性構築中的角色
議題說明
<p>晚清（1840–1911 年）藝術的全球流通呈現出一種文化悖論：它既是文明權威的標誌，又是充滿異域風情的「他者」象徵，處於一個難以簡單以東西方、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去界定的模糊地帶。隨著晚清藝術和視覺文化跨越國界，在這個日益相互關聯的世界中，它們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本次專題研討會，通過靈活的敘事手法，審視晚清藝術的接受狀況。我們避開諸如東方主義、霍米·巴巴所提「第三空間」這類後殖民二元論，與區域研究中的全球轉向趨勢相契合。突破以往將晚清藝術局限於靜態文化真空的研究方法，探索其在塑造全球現代性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把它視作一個動態的意義生成體系。</p> <p>四篇原創研究論文為此次探究奠定基礎，每一篇都揭示了晚清藝術在調和美學、權力與身份的跨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p> <p>首篇論文追溯了晚清文人美學在江戶—明治時期日本的演變。在日本，諸如文人石「瘦、透、漏、皺」的質感等概念，經由日本的侘寂美學重新詮釋。明清繪畫典籍激發了融合的藝術形式，日本學者順應晚清的園藝審美，將盆景從普通盆栽升華為煎茶文化的高雅象徵。</p> <p>第二篇論文通過巴黎中產階級收藏家德內利夫婦的視角，重新審視歐洲的收藏習俗。他們的折衷式沙龍，將晚清山水畫和裝飾藝術與法國浪漫主義理想相融合。儘管他們展示的「奇珍異寶」看似符合東方主義的異域風情，但他們的收藏超越了帝國主義框架，體現出一種世界主義的資產階級身份，將晚清美學融入個人和職業追求之中。</p> <p>第三篇論文揭示了晚清禮器捲入全球資源開採和科學研究網絡時期，玉器收藏背後的地緣政治因素。通過剖析美國收藏家畢紹普先生委託製作的精緻作品集以及日本的類似藏品，該研究強調了玉器如何既被重塑為藝術奇蹟，又成為礦物學研究的對象。</p>

第四篇論文追蹤了美國插畫媒體對中國勞工的種族化描繪。在主流週刊和諷刺雜誌中，移民被醜化為怪異的「苦力」，即斜眼、留著辮子的漫畫形象，還被與道德墮落和性威脅聯繫起來。然而，海外華人通過重拾晚清的圖像符號進行反敘事，維護自身文化合法性，將勞工形象重塑為堅韌的象徵，而非種族屈辱的代表。

這些論文共同表明，晚清藝術並非被動的商品，而是全球關係中的積極參與者。當文人石演變成日本高雅文化的支柱，巴黎沙龍通過美學對話打破殖民等級制度，玉器地圖揭露帝國間的資源競爭，海外華人的圖像重新定義被種族化的身體時，這些歷程印證了晚清藝術既是現代性的產物，也是推動現代性的催化劑這一雙重角色。通過將物質性、勞動和權力相互聯繫，本專題研討會重新定位晚清藝術，將其視為一個充滿爭議的媒介。在這個全球相互關聯卻又存在不平等的世界裡，身份、等級制度和主權都借助這一媒介被重新想像。

重現「異國風情」：晚清德·艾內裡夫婦的中國藝術品收藏

黃悅行 (Wong Yuet Heng,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摘要

雖然在晚清時期中國與西歐在政治上關係緊張，但在國門被迫打開以後，西方對收藏中國藝術品的興趣乃至文化交流日益增加。本研究探討一對被遺忘的法國中產收藏家阿道夫·德·艾內里 (1811-1899) 及其妻子克萊孟絲 (1823-1898) 和其收藏行為與實踐。

有關西方對東方文化的表現，大多研究都難以脫離後殖民理論，尤其是愛德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不論文學、遊記、或視覺表現，他們都被聯系至帝國主義此一大背景，並被視為西方對東方優越性的一種反映或工具。然而，本報告將會突出夫婦二人的獨立性，審視收藏展示的細節，探討他們對中國藝術和文化的具體理解，並揭示一些超越帝國主義、多層的文化社會意義。

儘管他們以非科學的方法收藏並展示大量神獸雕像，但本研究旨在打破異國情調美學與帝國主義之間似乎密不可分的聯繫，從而展示夫婦如何強調收藏與其日常生活的長期關係，如何將中法兩國之浪漫主義進行類比，及如何於巴黎文化圈中建立另類的品味及社會身份。

從《芥子園畫譜》到盆栽：明清文人審美 與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微型園藝實踐

樊夢瑩（Meng Ying F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摘要

本文探討十九世紀末日本文人如何借鑒並重釋明清時期的儒家文人美學，以重塑日本的盆景藝術。在明治維新背景下，日本社會迅速邁向現代化與西方化，然關西地區（尤其是京都與大阪）的儒學士人仍持續實踐自江戶中期以來盛行的煎茶文化。在這一精緻審美的文化圈中，“盆栽”一詞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出現，指帶文人煎茶聚會中的微型園藝陳設，並區別於“鉢植”這一江戶時期大眾化的園藝藝術。“盆栽”的風尚可見於 1892 年出版的《美術盆栽圖》。

本文指出，日本文人在欣賞微型樹木之美的過程中，往往借鑒《芥子園畫譜》等中國畫譜中的樹木造型，並配以自中國進口的素燒陶盆，以體現含蓄典雅之趣。通過對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流通於日本的煎茶會圖錄及中日兩國文人畫作的分析，本文考察明治維新時期的文人在社會結構劇變、封建制度解體的歷史語境中，如何借助儒家思想與中國文人藝術傳統作為文化資本，以維持自身在審美領域的權威與社會影響力，並通過區隔於其他階級的趣味取向，構建自我文化認同。

玉石、知識與文化權威：十九世紀末中國工藝圖像的全球收藏與再現

問曉敏（PhD, Art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摘要

自古以來玉在中國文化中承載著宗教信仰、道德規範與禮儀制度等多重意涵。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在鴉片戰爭的衝擊與全球收藏網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中國玉石才逐漸在在國際視野中被界定為一類具有藝術與學術價值的文化遺產。美國的收藏家畢紹普先生及明治日本的文化機構開始有系統地收集、記錄並展出中國玉器，將其定位為兼具美學精緻性與民族誌、礦物學研究價值的對象。在此過程中，玉石不僅作為物質材料受到關注，更被視為中國長久以來工藝傳統與自然資源的象徵，成為一種文化權威的物質表徵。

本文聚焦於一組描繪北京玉石生產過程的晚清繪畫作品。這組圖像為畢紹普先生的委託繪製，並被裝訂於其 1906 年出版的限量圖錄《畢紹普收藏：玉石的研究與考察》的一百套之中。這些手工繪製、極具工藝性的圖像，不僅作為工序記錄之用，更在視覺上建構出一種物質性與勞動價值的合法性，進而強化玉石在西方收藏體系中的學術與藝術地位。而另一套幾乎相同的在日本收藏的圖冊則多出一幅描繪清朝主要玉石產地的新疆地區的地圖。此一製圖元素顯示出收藏的某種轉向：從對工藝美的欣賞，轉向對自然資源與地緣政治的科學性關注。

通過考察這組圖像的委託、生產與跨國流通，本文揭示十九世紀末美國與日本的收藏實踐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國玉石在全球體系中的認知與價值，並介入了有關勞動、生產資源與知識建構的更廣泛帝國敘事與視覺秩序。

苦力還是華工？美國插畫媒體對早期中國 移民的視覺衝擊與回擊

朱文祺（香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19世紀中後期，清朝瓷器與水墨畫作為「東方」高雅品味的象徵，風靡全球市場。然而，另一種「出口品」——華工（即中國勞工），也就是所謂的「苦力」，卻引發了一場形象呈現危機。本文追蹤了在美國種族與政治局勢動盪的背景下，中國勞工形象在三種媒體語境中的呈現：《哈珀斯周刊》（1857 - 1916）中充斥著異域情調的獵奇式描繪、《黃蜂》雜誌（1876 - 1885）裡飽含種族歧視意味的威脅性刻畫，以及《世界主義者》雜誌（1886）所展現的海外華人的反敘事表達。基於陳國維和艾明如關於種族奇觀和排外主義的理論框架，筆者認為，這些圖像反映了一場圍繞政治主權展開的跨國博弈。美國媒體將中國勞工醜化為可隨意棄置的存在，而像王清福（1847-1898）這樣的記者，則在一個極力排斥華人的新世界秩序中，重新詮釋了「華人特質」的內涵。

文章開篇先闡述主流插畫報紙對中國勞工的兩種典型刻畫：其一為具有濃厚畫意的刻板形象，戴著斗笠、身著棉襖、悠閒品茶的人物；其二是將他們視作資本主義工業機器上的齒輪。陳國維指出，這些圖像把中國商品化，使其淪為遙遠的「東方奇觀」的一部分，與美國本土的形象涇渭分明。接著，筆者深入剖析喬治·弗雷德里克·凱勒（1846 - ?）的反華漫畫，其中哥特式的荒誕元素——如爬蟲般的斜眼、鼠尾辮子，以及吸食鴉片等描繪手法，將中國勞工誣蔑為入侵的「污染源」。最後，筆者探討王清福的反敘事創作，他藉助約翰·德金對唐人街日常生活的「寫實」插畫，明確區分了「華裔美國人」與「海外華人」。本文最終揭示，在排外政策橫行、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各方圍繞著身份認同、公民權和權力分配展開了激烈的視覺較量。

論文組主題

3.7 Entangled Landscapes: Rethinking Ming Art through Eco Art History

議題說明

This panel rethinks the art of Ming China (1368–1644) through the lens of eco-art history. Recent scholarship in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has emphasized the urgency of reexamining cultural production in light of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long-term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world—concerns that art history is only beginning to address in a sustained way. Focusing on the Ming period, a time marked by regional climatic instability, demographic growth, intensifying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aesthetic engagement with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this panel explores how the period's painting contemplated, resis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haping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 four papers gathered for this panel foreground Ming literati painting's ecological entanglements, examining how limitations in access to and extraction of resources, landscape's capacity to shape human behaviour, pharmaceutical interes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re reflected in visual culture. Themes considered range from literati tea gatherings shaped by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certain spring water and tea leaves, to garden paintings that aestheticize medicinal plants drawn from *materia medica* traditions; from depictions of grotto landscapes shaped by waterway access, to a case study of Xiang Shengmo registering late Ming climate change. Together, these studies reveal how painters, patrons, and viewers engaged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s a dynamic, agentive force.

By situating painting within broader regimes of resource us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material exchange, the panel offers new ways of understanding Ming art. Rather than reading Ming painting solely as a mirror of human ideologies—whether Confucian or

commercial—this panel shifts attention to its embeddedness within broader ecological systems. The panel thus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for writing histories of art that recognize the multispecies, multisensory, and multiscalar condition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in Ming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inclusive and planet-oriented understanding of Ming visual culture.

Fresh Water and Tender Leaves: Tea Drinking in Ming China amid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Henning von Mirbach (米翰寧,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early to mid-Ming dynasty (1368–1644) literati practices through the lens of resource sensitivity, focusing on the scarcity of high-quality water and tea. While the consumption of rare teas and the sourcing of exceptional waters served as markers of elite social standing and aesthetic cultivation, these practices also reflected a broader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aintings such as Shen Zhou's (1427–1509) Getting Spring Water to Brew Tea, Wen Zhengming's (1470–1559) Tea Gathering at Mt Hui, and Qian Gu's (1509–after 1578) Brewing Tea at Mount Hui,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calligraphy reveal a more complex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Such texts and images often celebrated particular springs and teas, or lamented the difficulties of obtaining these resources, indicating an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limitations beyond mere connoisseurship. Through close analysis of tea gatherings, water-sourcing journey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visual and literary arts, this study situates Ming dynasty tea culture within emerging frameworks of eco-art history. It argues that Ming literati used the rituals and aesthetics of tea not only to perform social refinement but also to articulate a relationship to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shaped by natur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that, in turn, informed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Exposed Roots: Medical Plants in Ming Garden Paintings

高瑞迎 (Ruiying Gao, Assistant Professor, Wake Forest University)

摘要

Two works have been repeatedly referred to i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gardens as they encapsulate traditions of scholarly reclusion and elegant gatherings in elite cultures. In Qiu Ying's (1494–1552) famous painting *The Garden for Solitary Enjoyment*,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scholar-official Sima Guang (1019–1086) sits in a bamboo grove surrounded by medicinal plants like “mushrooms for immortality” (*Ganoderma lucidum*) and bunch onion (*Allium fistulosum* L.). Likewise, another well-known garden painting, *Herb Mountain Cottage* (dated 1540), also presents a field of various medicinal plants.

How does the painter guide the viewer to discern “medicinal plants” and what are their roles in the represented environment of a garden? Some plants are depicted with exposed roots—which is unnatural in actual gardening but reminiscent of illustrations in *materia medica* (*bencaos*) books whose rhizomes are recorded to be pharmaceutically effective, such as Chinese ginseng (*Panax notoginseng*) and Solomon’s seals (*Polygonatum sibiricum*). Such discrepancy suggests the tension between how Ming people used and represented natural resources like medicinal plants and how paintings of gardens contributed to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landscapes. Through examinations of the ecological and cultivated environments of medical plant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depictions of medicinal plants in these paintings were shaped by the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of *materia medica* instead of horticultural practices and uncovers how medicine, gardens,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m were intertwined with the mechanism of artistic production in Ming China.

Approaching by a Waterway: Ming Paintings of Zhanggong Grotto in the Context of Jiangnan Literati's Shuhua chuan Practice

Yeohoon Choi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Myongji University)

摘要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gong Grotto, one of the Daoist sacred grotto-heavens located in Yixing newly emerged as one of the scenic spots among Jiangnan literati, as proven by paintings by Shen Zhou (1427–1509), Lu Zhi (1496–1576), and Wen Jia (1501–1583) that all depict the grotto's scenery in detail. What attracted Jiangnan literati most to the grotto was, no doubt, its extraordinary scenery filled with numerous stalactites and stalagmites of various shapes. However, another critical factor that made Zhanggong Grotto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ed grottos in Jiangnan was its accessibility, especially by waterway. Arguably, this acces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Jiangnan literati's shuhua chuan practice of networking, travel,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Notic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ergence of Zhanggong Grotto as a popular scenic spo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huhua chuan route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research begins by raising a few basic questions as follows: was there any specific, frequented shuhua chuan route in the Ming dynasty?; if so, what did the route look like and why was it formed in that way?; since when had Zhanggong Grotto been included in the shuhua chuan route?; and how did it affect the accessibility of Zhanggong Grotto? After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seeks to elucidate the way a waterway formed and reformed Jiangnan literati's travel culture and suggests a way of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and art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 art history.

Hidden in Plain Sight: Xiang Shengmo’s Snow, Shadow, and Fisherman and Ming Visual Cultures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莊鎮元（Chen-yuan Chuang，美國芝加哥大學藝術史博士生）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ntanglement of climate crisis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Snow, Shadow, and Fisherman, a rarely studied hanging scroll painted by Xiang Shengmo (ca. 1597–1659)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in late Ming China (1368–1644). Central to my argument is the claim that this painting operates not merely as aesthetic expression but as a vehicle of social agency—conveying the artist’s culturally mediated response to ecological disruptions. The study unfolds in four sections. I begin with a close visual and historical reading of Snow, Shadow, and Fisherman, situating it within Xiang’s late artistic style and the context of climatic volatility. I then turn to the paratextual materials—inscribed poem and seals—to decipher their interplay with visual motifs and their implicit reference to weather anomalies. The third part analyses how the intimate mode of landscape painting functions as a medium for articulating personal affect in time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Finally, I adopt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drawing connections between Xiang’s work and contemporaneous Flemish representations of wintry landscapes, to consider how climate shaped artistic practices and generated culturally specific responses to ecological precarity. This study thus proposes a new reading of Xiang Shengmo’s painting as an ecological artefact that registers the environmental anxiety of its time.

個人組主題

3.8 帝國邊界的文化實作：轉譯詮釋、跨界協商、族群想像

議題說明

The Secret Code to Wealth: Pidgin, Capital, and Nationalism in Wu Jianren's Novels

柳雨青 (Yuqing Liu, 愛丁堡大學亞洲研究系助理教授)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pidgin English in two novels: *A Secret Code to Wealth* and *The New Story of the Stone*, both written by Wu Jianren 吳趼人 (1866-1910), a highly regarded Cantonese novelist active at the turn of the last century. Set respectively in mid-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se two novels show a critical awareness of Western influence on Sinitic languag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ronic portrayal of foreign language dictionaries as both symbols of modernity and problematic vehicles for the spread of pidgin English, this chapter pursues a two-folded argument: First, I contend that Wu's novels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meaning of "pidgin," from denoting a non-standard form of English spoken by Chinese to one that implies English spoken so proficiently that it poses a threat to the speakers' national identity, due to grow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Second, Wu's critique of the oral focus of pidgin English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aking and writing and serves as a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boundary between traditional scholar-officials (*shi*) and merchants (*shang*). By situating Wu's novels within broader discourses on languag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how linguistic anxie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flected dee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tensions, highlighting the overlooked role of pidgin in 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文聚焦吳趼人（1866-1910）的兩部小說《發財秘訣》和《新石頭記》，分析其對皮欽語的描寫與文化意涵。兩部作品以晚清社會為背景，批判性地呈現了西方語言如何滲透影響本土語言。本文關注小說中對外語詞典的描寫，指出詞典在象徵現代知識體系的同時亦成為語言錯位的載體。本文提出兩個主要論點：其一，吳趼人的小說展現了皮欽語概念的重要轉變——從早期指涉的不規範語，轉變為一種動搖國族認同的語言形式。其二，小說中對皮欽語的呈現，不僅反映了中口語與書寫之間的階序關係，也體現出吳趼人企圖重申士商分野與文化等級秩序的企圖。

Prefacing the Foreign: Hermeneutic Mediation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Paratexts of Liu Zhi

李剛 (Li Gang, Research Associate, Erlangen Centre for Islam and Law
in Europe)

摘要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non-Muslim Confucian literat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ead, framed, and reinterpreted Liu Zhi's seminal Han Kitāb works—Tianfang xingli (Nature and principle of Islam) and Tianfang dianli (Norms and rites of Islam). Departing from a passive reception model, I argue that the Confucian preface writers did not merely introduce Liu's texts but performed acts of hermeneutic mediation—actively translating, rationalizing, and at times domesticating Liu's Islamic metaphysics into a Confucian moral and ritual vocabular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lose philological reading and 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how these paratextual writings function as strategic sites of cross-cultural negotiation, where issues of textual authority, orthodoxy, and translation politics were contested and reconfigured.

戰爭與市場：萬曆前期明蒙對河湟洮岷的爭奪與茶馬貿易的發展

王永曦（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自明初以來，茶馬貿易既是明朝獲取戰馬的重要方式，也是執行朝廷「限隔藩虜」政策的具體形式。前人有關明代茶馬貿易的研究雖然已有不少，但基本集中於明代前中期，萬曆時期的茶馬貿易不僅較少受到注意，而且往往被視為明中葉衰敗趨勢的延續。這或許是因為與之前相比明代後期較少有系統性的茶馬資料存世。本文以學界較少利用的《歷朝茶馬奏議》為中心，將萬曆前期明蒙雙方在河湟洮岷一帶的戰爭納入貿易變動的考量。萬曆前期茶馬貿易出現劇烈增長，這與明蒙雙方對番族的爭奪有密切關聯，明末的茶馬貿易不應以「失敗敘事」概括。這一研究亦為明清茶葉長途貿易的形成提供新的思考。

明清時期侗族掌墨師的身份重構：技術權威、文化資本與權力網路的互動（1368-1911）/ The Reconfiguration of Dong Zhangmoshi's Ident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teractions Among Technical Authority, Cultural Capital, and Power Networks (1368-1911): Technical Authority, Cultural Capital, and Power Networks (1368-1911)

王薈（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要

明清時期，侗族掌墨師作為木構技藝傳承者，其身份經歷了從技術權威到文化象徵的轉型。本文基於歷史人類學理論，結合方志及口述史料，剖析制度變革、文化互動與經濟轉型對其身份重構的複合機制。研究表明：掌墨師借參與官署工程獲“半官僚化”身份，職能由技術壟斷轉向文化調停；木材貿易促使技藝傳承由血緣轉向契約，形成跨地域技術網路；漢式建築的引入則通過《魯班經》本土化重構“技術—儀式”雙重權威。此轉型既是技術精英應對國家權力滲透的策略，亦折射侗族在文化涵化中對傳統性的符號再造，為少數民族技術群體研究提供新範式。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Dong ethnic master craftsmen (Zhangmoshi), as inheritors of timber architectural techniques,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ve shift in identity from technical authorities to cultural symbols. Employing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utilizing local gazetteers and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i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ree key findings: 1)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ster craftsmen acquired a semi-bureaucratic status, transitioning from technological monopolists to cultural mediators; 2) The timber trade shifted craft inheritance patterns from kinship-based transmission to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fostering cross-regional technical networks; 3) The introduction of Han-style architecture facilitated the localization of Lu Ban Jing (Classic of Lu Ban), reconstructing dual authority encompassing both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ritual practices.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both technical elites' adaptive strategies to state power penetration and the Dong ethnic group's symbolic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during cultural acculturation, offering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ing minority technical communities.

1881 年《中俄改訂條約》的長期影響：以索倫遺骨問題為例

松尾健司 (MATSUO Kenji,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生)

摘要

由於 1881 年簽訂的《中俄改訂條約》，清朝成功從俄國手中收回伊犁地區的大部分。儘管此舉常被視為中國外交上的一項成就，清朝仍將部分伊犁地區割讓予俄國。然而，鮮少有人知曉，原先駐紮於該地的右翼索倫的墓地仍遺留於新劃定的俄國領土上，致使乏人照料。雖然蔡仲岳的博士論文曾指出，時任伊犁將軍已意識到索倫墓地無人看管的情況，但對其最終處理結果並未作出具體說明。本文擬運用哈薩克斯坦中央國立檔案館所藏之俄文檔案，揭示俄方最終於 1890 年代前期同意清方收回索倫遺骨之事，進而分析伊犁地區領土變動所帶來的長期影響。

Drawing Nationhood on Maps: A Han Chinese Elite's Map of Qing China and Its Multiethnic Entities from 1789 to 1841

關文昊 (Wenhao Gua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摘要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diting and printing circumstances of a map of China made by the Han Chinese mapmaker Li Zhaoluo 李兆洛 (1769-1841) to show how the private cartographic knowledge of Chinese elites contributed to 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a multiethnic Chinese nation and its geo-bod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elite cartographic projects was influenced by a 19th century academic trend that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 use of knowledge. By consulting two Qing imperial atlases and combining the Chinese grid map-making system and Mercator-Sanson projection, Li's map transformed his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bout a multiethnic China into his spatial imag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Li's method continued after his death in 1841 and was adopted by a group of late-Qing Chinese elites in their own mapmaking activities, which then bridged China'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geographic understanding.

Keywords: Li Zhaoluo, multiethnic China, cartography, nation-building, geo-body

論文組主題

3.9 明代史學的再評價：以國朝史編纂為中心

議題說明

近三、四十年間的史學史研究，雖已逐漸跳脫明末以降的批判框架，從多樣性、通俗性等角度重新審視明代史學的成就，但目前無論在官書或私史方面，仍有許多尚待深挖的面向，包括纂修過程的細節、書寫體例的變化，甚至可由「明代史學」的邊界往外延伸，結合當時的政治、社會、學術等層面進行討論，或嘗試不同文化之間的比較分析。本組的三篇論文即以「國朝史編纂」為中心，分別從全球史的比較視野、制度與組織變動帶來的影響、體例的演變等角度出發，探究明代官私史籍修纂的特色、多樣性與複雜性，並由此重新評估明代史學的價值。

戴彼得（Peter Ditmanson）與何幸真的研究均聚焦於實錄。前者將明實錄置於全球史的脈絡下討論，比較其與同時期世界各國宮廷記錄之間的異同，並探究這些記錄反映的宮廷文化、權力運作與歷史觀念，在十四至十五世紀全球範圍內呈現的多樣性與動態性；後者由承擔實錄修纂任務的館閣體系入手，分析明代前期內閣發展及其與翰林院關係之變化，如何影響實錄編纂規制的建立與定型，乃至曾任太宗、仁宗、宣宗三朝實錄總裁的楊士奇，於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黃聖修則透過梳理明代私修史書於體例上的動態演變，揭示其多樣性、探索性，和在史學史及學術史上的意義。

全球視野下的《明實錄》

Peter Ditmanson（戴彼得，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教授）

摘要

本文將探討《明實錄》與同時期世界各國宮廷記錄之間的異同，並試圖揭示其背後對宮廷權力、文化與歷史觀念在十四至十五世紀全球範圍內多樣化理解的啟示。這些記錄的功能遠不止行政用途。它們承擔著複雜的敘事角色：一方面講述了個體——國王或皇帝——的私人生活，並以其生死構成敘事的骨架；另一方面亦是對國家，甚至更廣義的「天下」之記述。它們也都擁有多元的讀者群體，包括君主本人、其家族、社會精英，部分情況下還有外國讀者，甚至是後世讀者。本文將在此種比較語境下，分析明代《實錄》的特徵，及其所反映的宮廷文化特性與政治運作邏輯。

三朝總裁：楊士奇與明實錄編纂規制的建立

何幸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在過往的史學史討論中，政治經常僅被充作一種背景資訊，用以解釋史籍編纂者的考量，及其由此完成的內容。但就官方修史制度而言，其從創建、發展到逐步定型的過程，都與實際政治發展乃至官僚系統的變化彼此牽動。

明實錄編纂規制的建立，和靖難戰後由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代內閣職權，及其與翰林院關係的變動，密切相繫。總裁永、洪、宣三朝實錄的楊士奇，雖非明代官修制度的創建者，卻極深地影響其延續與確立的走向。他以閣臣、史官身分在實錄編纂及個人書寫中展現的各種策略，其實也是明代前期政治變動與內閣制發展之下的產物。

明代私修國史的「變體」與「備體」

黃聖修（泉州師範學院文傳學院歷史系教授）

摘要

自晚明至清初以來，學界對明代史學發展評價普遍偏低，尤其對數量龐大、體例繁複的「私修國史」多所詬病。這些著作雖然在史實考證上有偽誤疏漏等問題，但在體例的創新與探求上，卻不應全然否定。

將傳統紀傳體視為「變體」，並積極尋求「備體」的明代史家，實已在編纂實踐中展開對「國史」型態的探索。這些作品既回應當代政治與社會變遷，也挑戰舊有史學體制，展現對「新國史」可能形態的積極實驗。因此，從史學體例的動態演變出發，重新理解明代私修史書的多樣性與探索性，將有助於揭示其在史學史與學術史上的意義，並重估明代史學的價值。

論文組主題

3.10 捏碑修史：清代金石學典範的建立與中心轉移

議題說明

本小組關注乾嘉以來金石碑刻在學術體系、地方實踐與日常文化中的認知變化，探討其如何從物質遺存轉化為經典範式的文化對象。隨著金石學的興起與碑刻收藏的普及，碑刻迅速成為考據學與地方志書寫的重要素材。與此同時，不同地域與群體對碑刻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並不一致。學術上，碑刻因其歷史物質依存性成為地理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並應用於邊疆實務；在地方社會，它既可成為文化認同的象徵，也可作為日常生活中表達記憶與信仰的工具。本小組試圖透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展現碑刻在不同語境中所承載的多重文化功能，並進一步討論其「典範地位」建構和遷移的歷史過程。

三篇論文分別從地方士人書寫、學者訪碑鑑藏與民間題刻出發，呈現碑刻視覺性、環境文化融洽性、史證性等多樣化的接受與詮釋路徑。施天宇關注清末雲南士人如何藉助方志與地景建構強調碑刻的地域屬性；王晶從黃易《裴岑紀功碑》的鑑藏實踐出發，論述邊疆石刻在史地知識建構中的作用及清代學人金石考據中的近代科學與政治意識；李子怡則以西湖遊跡題刻為線索，探討民間實踐如何重新定義碑刻的空間意義。本小組旨在透過區域性個案，討論碑刻如何在地方與中心之間，不斷被賦予、重構與傳承的動態文景。

金石生根：清末雲南土人對碑刻的在地化 詮釋

施天宇（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摘要

清代金石藏家多親赴或委託搜訪碑刻。而此類活動常帶有濃厚的文化中心主義色彩：藏家傾向將地方碑刻納入全國性的書法史敘述，視之為主流傳統的「遺珠」，並有意無意地削弱其地域性特徵，將地理空間視為碑刻保存的「容器」，而非其風格生成的「根源」。此種認知並未獲得地方土人的認同。本文以方志為線索，考察道光、咸豐年間雲南土人對碑刻的在地化詮釋。他們透過方志編纂、地景建構等方式，強調碑刻與本地歷史文化之間的密切關聯及其地域屬性。儘管難與文化中心抗衡，然所體現的地方主體意識，構成清代金石熱潮中不可忽視的在地迴響。

海祠之辨：金石考據與清代邊疆史地知識的生成

王晶（愛丁堡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以黃易（1744–1802）對東漢《裴岑紀功碑》的鑑藏實踐為線索，結合乾嘉金石學文獻與清代西北史地研究，探討邊疆石刻在史地知識建構中的作用。乾隆時期平定伊犁後，《裴岑紀功碑》被重新發現。黃易之兄黃庭謫戍新疆時獲得其原境拓片，成為黃易建構「碑刻—地理—邊疆認知」的基礎。透過分析黃易對拓片文本「海祠」疑古考證，及其臨寫、題跋流轉活動對此碑的塑造及對之後西域研究的影響，本文認為黃易《裴岑紀功碑》的鑑藏活動體現了清代學人金石證史的考據方法，並融入近代科學意識將金石活動應用於多民族與廣域疆界的學術與政治互動。

不朽的遊蹤：清代西湖遊跡題刻輯略

李子怡（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

西湖周邊的山林水體在明清時期逐漸轉變為泛社會化的遊觀場所，大量附庸風雅的遊跡題刻“侵入”原本由僧道爭衡、文士指認的歷史空間，暗含著民間社會對於“存在”與“不朽”的企圖。儘管鐫刻游蹤的風尚古已有之，對於景觀的解釋權與命名權長期以來被文士群體所佔有。清代西湖地區湧現出的

“無名”遊跡題刻，在客觀上進一步鬆動了精英與大眾在“進入山林”這項活動中的區隔，甚至以此為起點生成了新的文化景觀。本文旨在跳出精英與大眾的二元對立框架，聚焦遊走在模糊邊界之間的人物與他們留下的物質痕跡，鉤沉民間社會真實的價值與信仰。

個人組主題

3.11 瓷韻畫聲：東亞近代藝術物質與視覺文化的跨境詮釋

議題說明

由「承清館」到「學山園」：晚明太倉張灝家族的印藝活動與文化事業初探

林宜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摘要

印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堂印譜」，置首為晚明張灝《學山堂印譜》，開創了後世集譜先例。其前身為《承清館印譜》，初始張本自有其重要性，邇來則更因各家館藏巨量數位化之便，促成諸版匯校之可能，學者們遂留意到此中羅列之印人姓名，出現「增刪」、「改異」、「沿用」，乃至於「全數削名」的編輯現象，從而謹慎建議：這些向來視為定論的明前期印人印作，亟須再次審視；而吾人更以為，由「承清館」到「學山園」，所積累而成的《學山堂印譜》，則當在藝術史、印學史的既有成果之外，重新賦義。幾經披閱諸版要本並旁涉文集、方志，筆者抽絲剝繭地歸結出關鍵線索，即在於「人」與「地」。蓋印人或序跋姓名可以因時而抽換更替，甚或剷除消失，唯獨編輯者，始終為張灝一人；而生發印譜的初始處所，亦皆在此即「承清館」後發展為「學山園」。所有來訪的藝文印友，或歡聚一時或常為門客，刻就了印章，寫下了詩文序跋，最終為張灝所藏。究其主要的閱讀者，即為園主張灝，次及普羅受眾。由此看來，「印章」作為載體，明顯符應了「園主、文人、藏家兼編刊出版者」張灝的情感需求與生命風調；現今既要重審《學山堂印譜》，就該鎖定張灝本人與「學山園」前身之「承清館」一地以及此時期多次刊印之《承清館印譜》，進行輻射式的深究追索。

關鍵字：印譜、張灝、承清館、晚明、太倉

18世紀清宮典藏塞弗爾陶瓷—中法檔案交叉 詮釋研究

李招瑩（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試著將禮物放在 17、18 世紀的全球化架構，作為歐洲跟亞洲的外交關係，找出其運送者及中介者，歐洲贈送者的企圖，通過的中介組織與物質的管道，其中的權力結構，以及送到亞洲的路徑，所產生的另外一個文化環境社會結構的物質轉變及影響，試著去理解文本的敘事者的觀點。擬就法蘭西學院中的書信資料談及 18 世紀中法陶瓷交流議題及清宮活計檔 1790 年之後的紀錄，並就凡爾賽到紫禁城的圖錄和台北故宮文獻調查寄送賽弗爾瓷器圖像、器型、展示及使用的紀錄，此批瓷器為法國內政大臣貝爾丹所贈送的外交禮物。因中西飲食文化不同，避開贈送塞弗爾餐桌瓷器，精選贈送清宮無法製作的花瓶、香料瓶、化妝盒及白瓷雕塑，最後一次贈送茶具包括茶盤、茶杯、糖罐，呼應乾隆皇帝喝茶的品味。比對法文檔案及中文檔案呈現傳教士觀點及清宮內部觀點，呈現清宮此批賽弗爾陶瓷的不同視點評價及交叉詮釋。

關鍵字：塞弗爾陶瓷、十八世紀中法交流、禮物、檔案、耶穌會

Western Paradise Remade: Framing Peacocks and Territorial Aesthetics in Qing Imperial Gardens

Lianming Wang (王廉明,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摘要

This paper departs fro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sual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Peacock Cages, built c. 1756, to argue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s (r. 1735-1796) two phases of the 'European Palaces' were conceived as conceptually separate projects. It posits that this avian enclosure served as an entrance at the western end of the second European garden compound. It explores the gateway function of the 'Peacock Cages,' the significance of peacocks in Buddhist symbolism, and the hidden imagery within the 'Calm Sea Palace' and its adjacent structures and scenic views.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the second European compound adhered to Buddhist Pure Land (also known as the 'Western Paradise') iconography, particularly as rendered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Buddhist painting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several other imperial garden sites were conceived as parallel projects, wherein peacock imagery was reframed within Confucian utopias or fantastical realms. The concurrent expansion of garden projects and the presence of peacocks reflect the Qing's successful annexation of the Dzungar territory, highlighting the territorial linkage of the peacocks to this area. Within this all-encompassing compound, the conceptions of the 'Western Ocean' (Europe), the 'Western Paradise' (Buddhist Pure Land), and China's historical 'Western Regions' (Central Asia) intertwined to convey a broader vision of the territories beyond the empire as perceived by the emperor.

Keywords: Peacock, European Palaces, fountain, Pure Land, Qing dynasty

從天津到臺灣：晚清八國聯軍下的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

劉錡豫（專欄作家，獨立研究者）

摘要

1900年八國聯軍，日本小說家佐藤紅綠前往天津，以報社記者身份撰寫《從軍記者決死隊》，收錄當時擔任從軍畫家的石川欽一郎之戰地速寫，呈現八國聯軍「天津之戰」中的日本視角，以及作為戰場的天津城市空間變化。

本次發表首先解讀《從軍記者決死隊》中的圖文構成，說明石川受命繪製戰地速寫，並敬獻明治天皇的過程，且畫作內容如何反映前線戰果；其次，石川作為故事人物出現在書中，他在晚清的戰地經驗，與他日後來到臺灣，創作山岳風景畫之事有所關聯。本次發表以石川的經歷為經緯，串連晚清中國與日治臺灣的藝術史跨地域研究視角。

京都畫壇中的晚清美術留學生—鄭錦 (1883-1959)

游閨雅（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資訊室助理研究員）

摘要

鄭錦為中央美術學院的創校校長，兼具畫家與美術教育家身份，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擁有重要地位。光緒年間，他赴日留學，成為第一位京都中國留學生。京都素有中國書畫收藏傳統，且鄭錦在學期間，適逢羅振玉攜藏品於校內展出，對當時的學生們影響深遠。這促使鄭錦的作品與其他留學京都的嶺南畫家風格相近，成為東亞近代藝術交流的重要案例。本文聚焦於鄭錦的旅日學習經歷，分析其所處的藝術環境、展覽活動與創作實踐，追溯其作品中日藝術元素的來源與影響，並兼論同為晚清留學生的陳樹人、鮑少游等人如何形塑出界於文化與地域中間地帶的作品。

個人組主題

3.12 書籍、日記與碑刻：知識生產與社會擴散

議題說明

明代史學的邊緣化與再評價：從政治動盪到「史學」繁榮

王晴佳 (Q. Edward Wang,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要

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明代史學常被忽視，學者如杜維運、瞿林東、謝保成等人的著作對其論述有限。這一現象的原因包括明初政治高壓和官方《元史》的粗疏，以及靖難之役後的政治動盪，導致《明實錄》存在偏頗。然而，明代歷史的複雜性深刻影響了史學發展。明中葉後，印刷文化繁榮和儒商合流推動了史學的輯評發展，史鈔盛行，王世貞、焦竑、李贊、卜大有、張岱等士人因此成名。《史記評林》、《漢書評林》等巨著的出現及對《史通》的系統研究，突顯明代「史學 (historiography)」的蓬勃發展，使之成為中國史學史上一個開創階段，需要用新的視角加以重新論述。

關鍵詞：史學 (historiography)；明代史學再評價；史學批評；《史記評林》；義理化史學；印刷文化

開書考：書院課藝與十九世界中國的知識生產

徐兆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自從《詁經精舍文集》在 1801 年刊行，各地的書院陸續仿效這種結合書院經營與出版的模式。所留下的大量書院課藝總集，近年越來越受到學界注意。其中，課試容許學者開書甚至帶卷回家，看似一個微不足道的改變，卻扮演關鍵的位置。容許「搜檢書傳」後，書院課藝往往大量直接引用，標明版本出處，甚至採取史鈔的模式。又如俞樾主持詁經精舍時，提出書院課藝的經解不能「徒襲前人之說」。開書考這個制度上的改變，對書院課藝的內容帶來質變，更接近於單篇著作，別出於一時應付考試的科舉文章。在清末現代期刊興起前，成為創造與發表知識的重要媒介。

黃丕烈與清中葉蘇州地方的唐詩傳播網絡 ——一個書籍史的數位人文研究案例

羅珮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級研究人員）

摘要

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所出版以中晚唐為核心的唐人詩集，自晚明時人銳意蒐集與影刻，成為清初官刻《全唐詩》的重要基礎。清中葉以降，地方文人轉以收藏、題跋、校勘、鑑賞為主，形成活躍的區域性的詩學網絡。黃丕烈尤為代表，其藏書題識涵蓋版本考辨、藏書交易、讀書記趣，展現書籍作為個人知識與集體記憶的交流場域。本文運用關聯識資料庫技術（Relational database）建置可追蹤宋本唐人小集傳播的知識庫，擷取圍繞其間的社會網絡體系和極為豐富的版本資訊，觀察黃丕烈收藏與鑑賞古籍所建構的書籍傳播網絡，在官方總理《全唐詩》的脈絡之外，梳理地方的唐詩閱讀與傳播網絡。

生計、前途與不朽： 《山左金石志》的資訊累積及呈現

丘文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清代金石學是一個突出的文化與學術活動，儘管金石學的研究方法與目標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系統；在現代制度化學科的定義下，其定位一直曖昧不明。但金石實踐在模糊的邊界中，確實累積了極為大量的經史資訊與知識，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實作方式與邏輯。本文以《山左金石志》為核心，探討清代金石活動中資訊與知識的累積與呈現之具體實踐方式與過程。《山左金石志》是由阮元主導，朱文藻、武億與段松苓等人實際編纂而成。在清代中後期考據學風氣下，士人透過金石活動追求經史學術之發明與原創，透過蒐集、整理與編纂金石資訊，達到著書立言的目標。中下層士人也可以透過努力與見識得到地方大員的青睞，獲得謀生與前途的入場券。這場特殊且廣大的文化活動累積了大量與金石相關的資訊與知識，構成了所謂「金石學」的內容。總之，「金石學」是在士人謀食、謀道與謀位的多種動力下共構而成。另一方面，清代士人面對廣大金石資料的思考與實務操作，也與當代史料彙編、數位化與資料庫建構中，如何取捨與編排史料，甚至是何謂「完整資訊」的思考有所呼應。

臺史所 802 會議室

論文組主題

4.1 東亞海域「界」的探索：15-19世紀的跨域互動

議題說明

歷史上國家的疆界偏重在陸上，但實際上臨海之地或海域之內也都有「界」。這樣的「界」是異域交匯的模糊空間，經常隨著國家治理、人群流動而不斷變動。15至19世紀，東亞各政權透過行政機制、外交互動與港口管理來塑造「界」，本組將探討朝鮮與琉球之間的漂流民處置、清代澎湖的澳甲制度，以及上海租界內英籍水手的生活秩序，聚焦討論東亞海域中「界」的多重性、變動性、模糊性。

15至18世紀間，朝鮮與琉球的漂流民問題揭示「界」的模糊性。在朝貢體系下，中國負責東亞各國的遣返事務，而朝鮮與琉球在此過程中建立外交互動。漂流事件成為兩國跨域交流的媒介，凸顯海上「界」的彈性與多變性。

至於清代澎湖的澳甲制度的討論，則彰顯行政上的「界」的變動性。即清國如何借助原用於管理漁船與防範海盜的澳甲制度，進一步發展成地方基層行政區劃，讓這個陸地上行政的「界」自陸地延伸至海洋，使港口秩序與陸地治理密切結合。

而19世紀上海租界英籍水手之酗酒與戒酒問題，揭露不同文化交匯於「界」的混亂與管制。英國政府與傳教組織在租界內建立醫院、推行禁酒運動，試圖透過健康與道德規範來維持港口秩序。「租界」作為此時中國沿岸的特殊治理空間，呈顯「界」的異質、交雜與多元內涵。

從漂流事件看朝鮮和琉球的外交互動及文化接觸（15至18世紀）

廖子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朝鮮和琉球為主體，探討兩國如何透過漂流事件建立交流。據《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歷代寶案》、《中山世譜》記載，遣返漂流人是兩國外交互動的重要媒介，國君以諂文說明遣送始末，並贈禮表達友好。琉球常以夏布、芭蕉布、排草為禮，朝鮮多贈白苧布、白綿綢及人參，反映外交禮儀與物產特色。此外，漂流人接觸並記錄外國語言、禮俗與服飾，成為認識異國文化的管道。例如朝鮮漂流人觀察琉球的喪葬習俗，驚訝琉球人不為父母服喪、如常食肉。不同時期的漂流見聞拓展朝鮮／琉球對東亞海域航線、疆域邊界、異國文化的認識。

清代澎湖的澳甲制度與地方行政區劃

鄭竣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在清代縣級以下的行政邊界中，澎湖群島呈現一個相當特別的行政空間建構經驗。本文以澎湖的縣級以下行政空間「澳」作為切入點，探討行政空間與制度之間的互動與演變。澎湖在多島嶼與港灣交織的特殊地理條件之下，逐步發展出兼具海港與鄉村治理功能的行政編制，最終形成以「澳統社」為核心的行政治理空間。反映出清代行政治理中「界」的多重性與變動性。透過澎湖的個案分析，本文旨在揭示清帝國如何在海島地理環境的限制之下，發展出獨具地方特色的治理方式，進一步理解海疆秩序與行政邊界的轉化，以及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上海租界內英籍水手之酗酒與戒酒（1870-1880）——以《海關醫報》為中心

楊雅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水手，又稱為海員、船員被統稱為海事勞工（Maritime Labour），負擔海上的航務工作，無疑是海洋史不可忽略的角色。18世紀末，受到歐美各國禁酒運動的影響，酗酒被定義為疾病。而水手的酗酒行為，被認為與其航海的生活習慣、社會階級等面向息息相關。1870年代，英國長老會的傳教士、醫師等群體，一方面在中國口岸進行傳教，另一方面亦致力於解決水手的酗酒問題。本文以《海關醫報》為中心，旨在關切1870年至1880年禁酒認知逐步建構的時期，上海租界內的英籍水手如何受到禁酒運動的影響，又海關醫員對於酒精的認知，以及觀察、紀錄疾病的視角又有何變化。

關鍵字：《海關醫報》、水手、上海、船員、酗酒、戒酒

個人組主題

4.2 東亞跨文化視野中的知識、文學與社會實踐：交換、流動與轉型

議題說明

清末家政教科書的多元脈絡

周敘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摘要

過去對現代「家政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以後，如 Helen 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清末到五四以前為「近代中國轉型時代」，該時期的「家政學」研究尚少。本文探討近代中國的早期家政概念，以 1907 年〈奏定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正式將女子教育納入學校制度，前後兩年出版的多種家政教科書為研究對象，就多元作者的角度，分析留日學生、日籍女教師和國人自編等三種不同類型的家政教科書，在知識背景、編纂策略及形塑主婦文化之異同。

晚清中國「傳記叢書」源流考——以明治日本《世界歷史譚》的影響為中心

崔文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晚清時期，「傳記叢書」作為一種新興出版形式風靡一時。儘管中國自古便有刊刻叢書的傳統，但此時的傳記叢書實則移植自明治日本。自明治二十年（1887-1897）起，博文館、民友社等出版機構借鑒西方傳記叢書（如英國的“English Men of Letters”系列），陸續推出《世界百傑傳》、《十二文豪》、《世界歷史譚》等系列，成功將現代評傳體裁與大眾出版媒介相結合，形成兼具知識性與商業性的新型叢書。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掀起學習日本的熱潮，各書局紛紛仿效《世界歷史譚》等日式傳記叢書，編譯出版同類作品，以配合啟蒙與救亡的需求。然而，這一時期的中文傳記叢書多屬機械模仿，未能真正消化日本經驗，無論在內容編排還是書寫策略上，均未臻成熟。直至商務印書館推出《少年叢書》，編者方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新式教育制度的需求，打造出一套暢銷三十餘年的經典之作，終使「傳記叢書」這一出版形式在中國落地生根。

關鍵詞：傳記叢書、晚清中國、明治日本

清朝與印尼華僑婚姻關係的研究

James Masaki Fujitani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摘要

據說 18 世紀印尼華僑的婚姻關係與同時期清朝的婚姻關係截然不同。八達維亞的婦女在社會和經濟層面上享有較大的獨立。相反，清朝的婦女受比較嚴格的限制。但是這種印象很有可能源於史料的歪斜。八達維亞華僑研究利用《公案簿》的民事訴訟記錄，因此有豐富多彩的夫妻互動描寫。清朝婚姻研究通常依靠法律彙編，因此強調夫妻間的僵硬秩序。為了正確的比較，需要用同類的文獻。所以這個報告用清朝民事記錄的「徐公讞詞」，與「公案簿」進行進行對比探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罵貪官〉詩 篇於東亞三國五世紀間之傳衍流變（1400– 1900）／

“When the Great Dao prevails, All Under the Heaven is shared by all”: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em Scolding the Corrupt Official across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over Five Centuries (1400-1900)

Nguyễn Thanh Tùng (阮青松,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Philology,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Trịnh Thuỷ Dương (鄭垂楊, Lecturer at Faculty of Philology,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摘要

明代（1368–1644），約於十五世紀末，詩篇〈罵貪官〉或最早見於丘濬（1421–1495）所撰《伍倫全備記》。其後五百年來，此首詩於中國流傳不息，且遷徙至東亞之至少兩漢字文化圈國家——朝鮮與越南。其跨越時空之流傳，遂衍生眾多變體。諸變體見於多種文獻，題名不一，用途各異，所託作者亦多有不同。異文保留核心特徵，並依語境需要增損、改易，以應功能轉變。本文將考察相關文獻，重構〈罵貪官〉詩篇於三國之出現與流播歷程，並透過異文比較與分類，探討其傳衍路徑與文化遷移的可能。〈罵貪官〉詩篇之跨境流傳堪為古近代東亞文化接觸與轉化之典型範例。

關鍵詞：罵貪官、傳衍流變、文化涵化、東亞、古近代。

In the mid-Ming period, around the late 15th century, a poem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Scolding the Corrupt Official” (罵貪官) first appeared—likely in WuLun QuanBeiji by Qiu Jun (1421–1495). Over the following 5 centuries, the poem continued to circulate widely within China and traveled across borders to at least two other Sinospher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Korea and Vietnam. Its cross-temporal and cross-regional transmission gave rise to a wide range of variant forms, which appeared in diverse textual sources under different titles, with varying purposes and attributions. These variants preserved the poem’s cor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ransforming them to serve new functions with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document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poem’s dissemination in each of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By analyzing, comparing, and categorizing these versions, the study proposes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poem’s possible routes of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The journey of “Scolding the Corrupt Official” serves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cultural acculturation in premodern and early modern East Asia.

Keywords: Scolding the Corrupt Official,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acculturation, East Asia, premodern and early modern.

越南集句詩引用清代文獻初考)

NGUYEN TIEN LAP (阮進立)
(越南文郎大學外語系)

摘要

集句詩是選摘他人詩文的成句，連綴成篇的一種詩，在中越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越南文人創作集句詩時，除了採錄中國古人詩句，以另行組合成一詩的作品外，還特意採取前人的詩句或文句，為自己或他人的詩集作序或題詞。在創作的過程中，大量采錄了清代時期的文獻，引用材料十分豐富，如：《青雲集分韵試帖詳注》或《唐詩鼓吹》等。本文撰寫目的，就是通過越南集句詩對清代引用文獻的分類和分析，總結出其引用的特點，從而探討及瞭解當時文獻發展及傳播的狀況及清代文獻在越南文獻學、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論文組主題

4.3 近世東亞佛教之區域文化與社會：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議題說明

本組聚焦於明中期至民初江南地區的佛教實踐，透過地方誌書、女性傳記、與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探討佛教如何在地方社會中延續、轉化與生成。徐維里 (Philip Hsu) 以明中期 (1426 – 1572) 江南寺志為核心，分析佛教制度在被視為「思想低潮期」中的實踐能動性，重估其社會嵌入與宗教活力。劉瑋 (Jeffrey Liu) 則以《武林梵志》為資料基礎，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與數位人文的量化分析方法，提出衡量平民參與佛教的代理指標 (proxy indicator)，揭示明末非菁英信仰網絡的空間佈局與地域性。吳瑾暉 (Jinhui Wu) 則從晚清與民初尼僧筆記《梵門綺語錄》入手，檢視女性出家人如何在宗教修行、藝術活動與情感實踐中靈活調適、展現主體性。三篇論文皆強調區域佛教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透過文本與方法的多元結合，呈現出制度佛教、草根信仰、與性別主體之間的動態交織，並為近世佛教文化史提供新的觀察視角。

明中期佛教的再思考：以江南寺志為中心的分析

徐維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擬以明中期（1426–1572）江南地區的寺志為主要史料，考察佛教於所謂「思想低潮期」中的制度與實踐層面。相較於以往以高僧傳記或思想發展為主的研究取徑，本文嘗試透過對五山體系與西湖周邊寺院志書的系統分析，檢視寺院空間重構、住持更替、佛教儀式、田產管理與地方士紳互動等面向，進而重估明中期佛教在地方社會中的具體運作與宗教表現形式。透過對寺志中具體記錄的解讀，本文將探討佛教在制度延續與社會關係中的能動性，並提出對「中期衰微」敘事的修正與補充，進一步思考制度性佛教如何在不以思想突破為特徵的時期中持續調整與再生。

帝王與士紳之中：以代理指標衡量平民與佛教

劉瑋（Jeffrey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摘要

本文透過對《武林梵志》的分析，探討明代杭州地區平民參與佛教活動的情形。相較於帝王與士大夫階層與佛教互動的研究已相當充實，平民層級的宗教實踐卻長期被忽視，儘管其在佛教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傳統史料往往將平民描繪為同質化的群體，導致對其宗教經驗的過度簡化與模糊。為補足此一研究空白，本文運用數位人文方法，結合 Python 進行變異數（Anova）與熱門寺廟分析（Top N Analysis），並以地理資訊系統（GIS）進行地名與空間分析，建構衡量平民參與佛教活動的代理指標。本文以《武林梵志》為主要史料並搭配同時期的杭州寺志，並利用 ArcGIS Pro 進行資料視覺化，呈現平民信仰空間與帝王、士紳信仰網絡的異同。研究發現，平民在宗教空間的塑造上具有高度自主性，其信仰實踐常獨立於傳統權力結構之外。寺廟記錄中顯現出的區域差異，也進一步揭示了平民佛教實踐的去中心化特質與其深厚的地方根基。本文透過數位工具與寺志資料的結合，提供一套辨識中國近現代草根宗教實踐的新方法論架構。

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Jiangnan Buddhist Nun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吳瑾輝 (Jinhui Wu,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ves of Buddhist nun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Fanmen qiyu lu (1910s), a little-studied biji-style biographical collection. It analyzes three dimensions of nunhood: their religious and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their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negotiation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revealing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agency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doing so, the study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binaries of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showing how nuns integrated spiritual devotion with worldly pursuits. It situates these women as active participants in Jiangnan's socio-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and offer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nuns' multifaceted roles in this transitional era.

Keywords: Buddhist nuns; Fanmen qiyu lu; Late Qing Buddhism; Early Republican Buddhism; Women's agency in Buddhism; Jiangnan.

論文組主題

4.4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840-1885

議題說明

Between the Opium Wars and the Treaty of Tianj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underwent cru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the First Opium War (1840–1842), Chinese refugees and bandits entered the Nguyễn borderlands, resulting in chaotic conditions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This situation was exacerbated by the aftermath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Regular tribu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Nguyễn court (1802–1945) and the Qing court (1644–1911) were interrup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guyễn faced a gunboat attack by Franco-Spanish forces in 1858 and were subsequently forc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Saigon in 1862. Meanwhile, the Qing became embroiled in the Second Opium War (1856–1860) and ended up signing a series of treaties with Western powers. When tributary activities resumed in 1868, both the Nguyễn and Qing courts were struggling to respond to Western challenges.

Information was crucial to the Nguyễn's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treaty negotiation process. As early as the 1860s, the court began dispatching agents to southern China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Westerner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contacting Westerners, these agent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group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ir reports submitted to the emperor often contained news about China's and Japan's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s and suggested that the Nguyễn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 and resist Western influence. These repor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Nguyễn's perception of the Qing's position and its confrontation with Western powers.

The Qing began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Vietnam when the French sought a direct route from northern Vietnam

to southern China via the Red River. The Qing openly opposed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that the Nguyễn had signed with the French in 1874. In response, the French authorities deliberately obstructed Qing effor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Nguyễn. Eventually, in 1881,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network of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輪船招商局, CMC). In addition to its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bureau actively collected information on Vietnam, maintained ties with the Nguyễn court, and facilitated the travel of Nguyễn diplomatic missions to China.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Vietnam, and France reached a definitive resolution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Sino-French Trea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in Vietnam in 1885.

In this panel, we explore key aspects of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based on original sources, including the Nguyễn central government archives (Châu bản), the Nguyễn Veritable Records, French archives, local records, and other materials. Our aim is to contribute new insights into China-Vietnam relations between 1840 and 1885. Trần Thị Xuân's research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Qing-Nguyễn relations, analyzing Nguyễn court's contact with Qing literati in the case of Wang Tao. Taga Yoshihiro's study compares court documents with French diplomatic texts to analyze the activities of the CMC in Vietnam. Yoshikawa Kazuk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guyễn ru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adjacent to China and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is process.

A Chinese Liaison in Southern China: Wang Tao's Influence on the Tự Đức Court's Response to Western Expansion (1848–1883) (華南仲介人：王韜對嗣德朝 (1848–1883) 應對西方拓境之影響)

Trần Thị Xuân (陳氏春,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摘要

Before signing the Provisional Treaty of Peace with France in August 1883, the Tự Đức嗣德 court (1848–1883) explored a range of strategies to resist Western incursions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 These efforts included dispatching agents to southern China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Western activities and observing how China and Japan were responding to Western powers. Nguyễn officials also sought connections with a group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ased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Wang Tao 王韜 (1828–1897) and the Nguyễn court, assessing his influence on the court's responses to Western powers between 1873 and 1883. As a political journalist and commentator, Wang Tao continually adjusted his perspective on Vietnam'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response to shifting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s early as 1873, Wang Tao's idea of "opening trade to repel insults" (tongshang yuwu 通商禦侮)—which advised the Nguyễn court to forge alliances with other Western powers to counter French domination—was first conveyed to Emperor Tự Đức.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ang Tao played a pivotal role as an intermediary for the Nguyễn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ng with officials on diplomatic issues concerning Vietnam and facilitating the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prepared by the Nguyễn court in Hong Kong newspapers. Meanwhile, the Nguyễn court began adopting Wang Tao's ideas to adjust its diplomatic policies. However, by the early 1880s, some of Wang Tao's earlier ideas had become outdated. He no longer believed that any foreign power could help Vietnam preserve its autonomy. By the time he wrote the preface to the Chronicle of the Franco-Vietnamese Wars (Pháp Việt giao binh kỷ / Fa Yue jiaobing ji 法越交兵紀), he believed that the Sino-French War would end quickly and that Vietnam would soon fall under French control.

Vietnam and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Reconsidering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越南與輪船招商局：19世紀後半清越關係的再思考)

多賀良寛 (TAGA Yoshihiro,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aka)

摘要

This study sheds new ligh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CMC) in Vietnamese waters, draw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Vietnamese and French archival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unexplor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expansion of CMC into Vietnam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inextricab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ce transport system of the Nguyễn dynasty.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 tons of rice were shipped annually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Hué under government sponsorship. Beginning in the 1870s, government rice transport was subcontracted to Qing merchant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a shipping contract between the Hué court and CMC in 1881. This contract stipulates that CMC transports 420,000 phuông of government rice annually from Hải Phòng to Thuận An, where CMC was allowed to possess storehouses to facilitate shipping services. CMC's growing influence in Vietnam triggered suspicion among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The CMC enterprise in Vietnam abruptly ended with the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into northern Vietnam. In the military campaign led by Henri Rivière, assets owned by CMC in Hải Phòng were seized in 1883. Subsequently, establishing a French protectorate over the Hué court rendered the shipping contract unworkable. After the Sino-French War, the CMC sought compensation from the colonial authority in Tonkin for damages suffered due to French military action, but without satisfactory results.

19世紀後半葉越南北部山區阮朝統治的變遷與華人群體——以諒山省與高平省為中心

吉川和希 (YOSHIKAWA Kazuki, 關西大學副教授)

摘要

The history of late-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 has long been regarded negatively as a period leading to colonization.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 innovative aspects of Nguyễn Dynasty policies and their continuity with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leading to rethinking the evaluation of Nguyễn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presentation, taking these recent research trends into account, focuses on Lạng Sơn and Cao Bằng provinces in the northern uplands of to examine the governance transition of Nguyễn Dynas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armed groups flowed from Qing territory into northern Vietnam, causing disorder in the northern uplands.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e authorities in Lạng Sơn and Cao Bằng provinces granted military positions such as battalion [thiên hộ] and company [bách hộ] to local elites, allowing them to command indigenous people. Additionally,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increased military expenditures, the Nguyễn court introduced new revenue sources such as the opium tax. This presentation examines how Chinese community residing in Lạng Sơn and Cao Bằng provinces was involved in this new form of loc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guyễn Dynasty.

論文組主題

4.5 朝鮮史視角下的明清重構：理解帝國的另一種方式

議題說明

傳統明清史研究多聚焦於中國內部發展，本場研討則試以鄰國視角重新思考帝國秩序。朝鮮作為與明清王朝關係最緊密的鄰國之一，不僅是其帝國秩序的被動接收者，更是帝國秩序積極參與者。朝鮮史料為明清帝國的正統性與法律體系相關辯論提供了獨特視角。永樂帝賜予朝鮮的祥瑞畫揭示了儀式實踐與祥瑞的政治性運用；透過朝鮮記錄得以釐清崇禎帝施行並被清朝繼承的「八包貿易」制度的實際情況與起源。朝鮮既是帝國秩序的參與者，亦是其詮釋者。清初，朝鮮在清廷對日外交中扮演了情報仲介與戰略緩衝的角色，「倭情諮文」更是成為影響清朝對日政策的重要文書。另一方面，朝鮮的明朝遺民，於朝鮮社會中交織「朝鮮人」與「真正的明遺民」的雙重認同，使朝鮮成為延續與重塑明帝國遺產的重要場域。這些例子說明，朝鮮並非邊緣的消極回應者，而是一個帝國理念被積極實踐、抵抗乃至轉化的動態場域。朝鮮史料不只是補充中國內部記錄，更揭示出帝國意識形態的裂縫與不同秩序構想。將朝鮮置於明清史研究的核心，不單單是擴大研究範圍，而是對東亞歷史敘事的根本性重構。透過朝鮮視角，可以呈現一個由多個地域行動者共同創造、互動與協商的近世東亞國際秩序，展現出更為細膩且多極化的歷史面貌。

While conventional studies of Ming–Qing history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internal developments within China, this panel propos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reframe the historiography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China’s neighboring states in shaping the imperial order. Among these neighbors, Chosŏn—one of the Chinese dynasties’ closest diplomatic partners—offers a particularly valuable vantage point. Rather than viewing Chosŏn as a passive recipient of imperial authority, this panel positions it as an active interlocutor through which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ing–Qing history can be reassessed.

Chosōn serve as an "external archive," offer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l Chinese debates over legitimacy and legal order that would otherwise remain obscured in domestic records. The paintings gifted by Yongle Emperor, for instance, offer new perspectives on ritual practices and commemorative strategies surrounding heavenly omens at the Ming court during Yongle's reign. Similarly, the "Eight Bundle Trade," initially imposed on Chosōn missions by the Chongzhen Emperor and later inherited by the Qing, reveals a continuity in trade regulations that can only be traced through Chosōn sources.

As a neighbor of the Chinese dynasties, Chosōn functioned both as a participant in and an interpreter of the imperial order. As the newborn Qing empire sought relations with Japan, Chosōn functioned as both an intelligence conduit and a strategic buffer, with the Japan Reports (倭情諜文) serving as active diplomatic instruments that shaped Qing's perceptions and policy toward Japan. Meanwhile, Ming refugees to Chosōn, while negotiating survival and advantage within the local context, cultivated a dual identity as "Chosōn subjects" and "authentic" Ming loyalists, making Chosōn a key site for sustaining and reimagining the Ming imperial legacy.

Taken together, these examples reveal Chosōn not simply as a responsive actor on the margins, but as a dynamic site where imperial ideals were enacted, resisted, and transformed. Chosōn's archives do more than supplement the dominant narrative—they expose the fault lines of imperial ideology and occasionally articulate alternate visions of regional order. To approach the Ming–Qing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Chosōn is thus not an act of peripheral inclusion, but one of fundamental rethinking.

This seminar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lacing Chosōn at the center of Ming–Qing historiography. Doing so reveals a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that was not solely defined by the Chinese imperial core, but co-produc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and

interventions of multiple regional actors. A Chosŏn-centered reading of the Ming–Qing world enables a more nuanced, multipolar understanding of East Asian history—one that foregrounds interaction, negotiation,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empire.

對「模範朝貢國」實施貿易配額：崇禎年間「八包貿易」制度的起源（Imposing a Trade Quota on the “Model Tributary”：The Genesis of Eight Bundle Trade (八包貿易) System during the Chongzhen Reign）

李在璟（Lee, Jaeky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Kookmin University）

摘要

十七世紀後期，朝鮮依循「八包貿易」制度控管朝貢使團的對華貿易規模。本研究試圖探究此制度的歷史淵源，並將其追溯至崇禎年間明朝對朝鮮朝貢使團貿易的限制。明朝到十七世紀初未管制朝鮮使團貿易。然丁卯胡亂後，朝鮮與後金建立外交關係，促使明朝限制朝鮮使團貿易量。崇禎五年（1632），明帝限制朝鮮使臣於北京購買的私貨量，每人四包，每包一百二十斤。崇禎八年（1634），朝鮮在明朝要求下，將使臣私貨出口量限制為每人人蔘五十斤。明政府於崇禎十年（1637）確定朝鮮使臣入京之人蔘數量為每人四包，總計八十斤。此規制在清朝入關後重新被認識並應用，並被稱為意指每包十斤，八包八十斤人蔘的「八包」。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Chosōn controlled the trade scale of its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according to the "Eight Bundle Trade" system, signifying ten jin of ginseng per bundle, totaling eighty jin for eight bundl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is hitherto unclear system to the Chongzhen court's regulations on trade by Chosōn tributary missions, the measures aiming to economically blockade the Manchus.

Until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Ming exercised almost no control over the trade of Chosōn tributary missions. However, after Chosōn ha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s in 1637, the Chongzhen government began to limit the trade volume of Chosōn missions.

In 1632, the Chongzhen Emperor limited the quantity and weight of private trade goods that Chosōn tributary envoys could purchase in Beijing to four bundles per

person, with each bundle weighing 120 jin. In response to Ming's demands, Chosōn limited the scale of private export goods for tributary envoys to 50 jin of ginseng per person in 1634. Finally, the Ming government in 1637 fixed the quantity of ginseng that Chosōn tributary mission participants could bring into Beijing at four bundles per person, totaling 80 jin. This regulation was re-recognized and applied after the Qing Dynasty entered the China Proper, and it came to be called the "Eight Bundle."

Beyond the Narrative of Legitimacy: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Yongle's 1419 Gift of Paintings to Chosŏn

黃慧智 (Hwang Hyej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將探討明成祖於 1419 年賜予朝鮮的祥瑞畫，分析其政治象徵與外交意涵。既有研究將此類描繪佛道靈異事件與西域異獸的作品視為永樂帝宗教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的產物，旨在用以建構靖難後其非正統即位的合法性。本文以賜朝鮮個案為中心，結合《朝鮮王朝實錄》與燕行錄等史料，指出該畫除正當化遷都北京，塑造佛國形象外，亦回應朝鮮進貢佛舍利與佛像之舉。此畫在朝鮮引起強烈反響，並於朝廷內部激發政治辯論與多重詮釋。本文藉此案例揭示，永樂帝的外交贈禮不僅為帝國意識形態的視覺載體，亦成為十五世紀初東亞秩序中促發知識論辯的外交媒介。」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paintings of auspicious signs (祥瑞) gifted by Emperor Yongle (r. 1402-1424) to the kings of Chosŏn Korea in 1419.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interpreted such paintings—depicting miraculous Buddhist and Daoist events as well as exotic animals—as the result of two major initiatives during Yongle's reign: his extensive religious patronage and the maritime expeditions led by Zheng He. Although distinct in nature, both have been understood as part of a broader visual strategy to legitimize Yongle's rule following his controversial usurpation of the throne.

This study, however, reexamines this narrative by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case of the 1419 gift to Chosŏn, drawing on both official chronicles and private accounts written by the Korean envoys who received the paintings.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 artworks were originally commissioned to support Yongle's political project of relocating the capit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to portray Ming China as a Buddhist paradise, their re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to Chosŏn also served to express the emperor's gratitude for the kingdom's earlier tribute of Buddhist relics and sculptures—offerings that were believed to have manifested miraculous signs in China. The gift elicited strong responses in Chosŏn, where it became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debate and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By analyzing this exchange, the paper offers new insight into early Ming court rituals involving auspicious omens and demonstrates how diplomatic gifts functioned as vehicles of imperial ideology and catalysts for intellectual contestation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East Asia.

Reframing East Asian Diplomacy: The Role of Chosōn’s Japan Reports in the early Qing Empire

鄭相元 (Jung, Sangwon, Ph.D. Candidat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摘要

清朝侵略朝鮮後，欲以朝鮮為仲介與日本建立外交。然朝鮮基於地緣戰略考量予以迴避，並向清廷遞送「倭情諮文」，以阻撓清日直接通交。比較 1639 年諮文與同期朝鮮國內情報，可知朝鮮選擇性地編輯內容，以配合其外交利益。1640 年前的「倭情報告」主要是為避免軍事介入明清之間的戰事，隨後則轉為維持區域秩序並延緩清日接觸。最終，清朝與朝鮮形成默契，奉行對日不接觸政策，直至 1871 年清日正式建立關係。

After the invasion of Chosōn in 1637, the Qing sought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Japan, using Chosōn as an intermediary. However, due to geopolitical concerns, Chosōn resisted the demand and instead began dispatching the Qing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Japanese affairs—termed in this study as the “Japan Report”—to discourage Qing-Japan relations.

The first Japan Report, dispatched to the Qing Ministry of War in early 1638 amid regional unrest following the Shimabara Rebellion, reframed the issue as military issue instead of diplomatic issue. It emphasized instability along Chosōn’s southern border to dissuade the Qing from requesting troop deployment in its war against the Ming. Interestingl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1639 report and the contemporary domestic intelligence reveals that the report was selectively edited to align with Chosōn’s interests.

Until 1640, the Japan Reports primarily served to avoid Chosōn’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the Ming-Qing war. After Chosōn’s deployment of troops, however, their function shifted: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o continue discouraging direct Qing-Japan relations. In following reports, Chosōn described Japan’s invitation of a ceremonial envoy in deliberately amicable terms.

Once the Qing confirmed that the Ming had not maintained relations with Japan, it seemed that they abandoned plans for direct outreach to Japan and came to rely on Chosōn’s reports. Ultimately, both the Qing and Chosōn implicitly agreed a policy of

non-engagement with Japan. Even after entering China proper in 1644, the Qing continued to monitor Japan through Chosōn's irregular reports, delaying Qing-Japan relations until as late as 1871.

朝鮮明遺民的認同重構與真正遺民之競爭

徐源翊（Seo Wonik，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十七世紀前中期，大量明人遷徙至東南亞與朝鮮半島。遷入朝鮮的明朝遺民可分為三類：一為參加萬曆朝鮮之役的明軍及其後代，二為因東江鎮設置與撤退而遷徙者，三為隨鳳林大君返朝者。明遺民的身分並未在朝鮮得以延續，他們不得不描繪新的未來。不可否認朝鮮朝廷的政策雖然對遺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但遺民集團也確實主動應對，明遺民努力適應朝鮮社會。在此過程中，遺民集團一方面新增了作為「朝鮮人」的新認同，另一方面則以「真正的明遺民」之名相互競爭。此外，他們亦致力於與故鄉的遠親聯繫，或是強化集團內部的網絡，以不忘自身作為明遺民的認同。

關鍵詞：明遺民、明清交替期、朝鮮、認同變遷、認同重構

論文組主題

4.6 身體作為超凡的象徵與據點：明清醫學實踐中的宗教面向

議題說明

本議程探討明清醫療實踐中的宗教面向，重點論述各宗教醫學傳統如何塑造對身體、疾病與醫者角色的認識。學者從史學與文本角度分析明清醫籍及宗教典籍，揭示身體作為宇宙力量結合點，以及非典型病症的指示作用。討論涵蓋三個方面：

1. 身體作為宗教實踐的據點：劉世珣博士的研究，聚焦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跨宗教語境下的身體論述。該經典圖文並茂，融合了傳統佛教教義、道教符籙以及密教與藏傳佛教元素，揭示了明代早期複雜的宗教世界，堪稱宗教融合的典範。劉博士從宗教醫學的視角切入，對該經典進行開創性的論證，呈現宗教對身體的多元理解。
2. 身體作為超凡的象徵：吳靜芳博士調查明清醫籍中那些超出「正常」醫學範疇的奇異病症是如何被處理和解釋的。她對人面瘡類型與病因的案例研究，展示明清醫家如何結合醫學與宗教觀點，詮釋身體呈現出的難以解釋之怪異病變。
3. 身體作為難治疾病與醫生之間的邊界：Gessler 博士探討明清醫籍中治療各種內障的「金針撥障術」的宗教醫療側面。該技術深植於佛教醫療實踐中，Gessler 博士的分析表明，在這些文獻中，宗教面向已成為治療程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研究對明清眼科治療中的宗教向度供一個新的視角。

總之，本組別旨在深化對明清宗教醫療實踐的認識，為身體與疾病之醫學與宗教觀念交融提出新視角。

是病是邪？——傳統中國醫籍所載奇病中的人面瘡

吳靜芳（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摘要

傳統中醫理論中，提到人們出現疾病的原因，常引用的依據是三因論，將病因分為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不過，，有特殊怪異的的病或難以解釋的的疾病在，，而這些疾病往往被收入醫書「奇病門」，其中最著名的奇病就是人面瘡。人面瘡的初始紀錄並非起自醫籍，而是來自佛經《慈悲三昧水懺》，其序文記載知玄法師膝上生人面瘡的故事。由於當中涉及因果報應的意涵，加上人面瘡的詭的情節，因此長久流傳民間社會，並衍生不少類似情節的人面瘡故事，進而被醫書編作者收入奇病門，作為醫療結合宗教的案例。本文將對醫書等文獻所載人面瘡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例如各類文本中，人面瘡長，主角身體部位之的同所反映的意義等問題，來探討人面瘡、疾病與身體之間的關聯。

關鍵字：人面瘡、奇病、因果報應

跨宗教語境的身體知識：試析《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中的身體論述

劉世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摘要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由明代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書寫，商喜（生卒年不詳）彩繪，是一部融合佛教密教、藏傳佛教、阿吒力信仰以及道教符籙傳統的宗教文本，內含106幅彩色附圖，如〈眾生原形圖〉與〈玉兔日月女身圖〉。這部經典的文字記述與圖像描繪，呈現一種將身體、宇宙與宗教相互結合的論述方式，映現跨宗教傳統對身體的多重理解。本文試圖透過分析經典中關於臟腑、方位、神祇等論述，以及圖像所反映的身體——宇宙映射邏輯，探討是書如何構築一種特殊的身體知識，並將其作為宗教實踐與宇宙秩序的對應載體，進一步揭示宗教對身體的多元解讀。

關鍵字：身體、密教、藏傳佛教、道教、阿吒力信仰

Invoking the Mercy of Guanyin to See the Light of Day Again: Religious Practices as Recorded in Ming-Qing Ophthalmic Texts

Elena Gessler (高蓮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Through the medium of Buddhist texts and missionaries, Chinese ophthalmic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evolved into a unique area of cross-cultural fusion in medical thought directly influenced by Ayurvedic medical concepts. To this day, several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hthalmic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still bear this influen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one such foreign installment in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namely, the surgical “golden needle technique for plucking the [eye] screens” (jin zhen bo zhang shu, 金針撥障術) for couching cataract-like disorders.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involved in treating patients have generally been overlooked in modern academia, and this research aims to address that gap.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igious aspects of the “golden needle” couching technique in Ming and early-to-mid Qing ophthalmic texts, with special focus on A Precious Book of Ophthalmology (Yanke shen shi yao han, 眼科審視瑤函, compiled in 1644) by Fu Ren-yu 傅仁宇, and to trace their origins in earlier medical traditions and broader religious healing practic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religious and magical aspec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medical procedure. Moreover, it shows that the Buddhist influence on ophthalmic practices lasted well beyond the Sui-Tang dynasties and remained very much alive in later medical traditions.

Keywords: “golden needle” technique 金針撥障術, medical amulets, Buddhist medicine, Ming-Qing 眼科

論文組主題

4.7 「國」文脈的形成：近世東亞複數文脈的重編與創生

議題說明

本小組取徑多種視角與議題，探究在近代「新世界—新文脈」的生成過程中，和文脈、漢文脈等「傳統」文脈扮演的角色與歷史機能。

明清時期，以漢字漢文寫就，並在漢文脈的流域廣泛傳播的多樣文本，與相伴而生的和文脈，一同構成了近世日本的知性空間。自江戶後期，在以日本列島為中心的力學空間中，上述龐大的知識積存被重新理解與整合，並根本性地決定了吾人理解近代東亞知性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方式。為深究此議題，四位發表人分別就以下主題進行報告：在明治初期的帝國大學，作為相異書寫次元的和、漢文脈，漸次明確化為「國（日本）學—中國學」對立體系的歷史過程；同一時期，在部分現代作家眼中，以漢文訓讀體創作小說，成為區分中日的關鍵，並與「新日本」的理念乃至對中開戰的主張相聯繫；較之稍後，於殖民地臺灣搬演的傳統戲劇，其審美感知遵循漢文脈的邏輯，基於聽覺而非語言，使其鑑賞得以跨越口語的差異，與同時期強調言文一致的日本本土「聲音」帝國，拉扯出令人深思的張力。

本小組立足近世漢文、和文的流通圈域，思考差異的書寫—知識傳統，如何回應 19 世紀以降諸「國」鵠起的歷史動態，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代書寫世界中，或呼應或背離，激盪出別開生面的文脈流向。

古典、神典、国典：明治初期における 「古典」の転身

葉宇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與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摘要

明治維新以來，在文明開化論昂揚的同時，眾多知識人對於「漢文之學」不減反增的興趣，素為學者所關切。但在明治初期的帝國大學中，近代學術的先行者及領導者們，事實上對漢文學進行了根本性的改寫，令其從「以漢文寫就的學問」，轉為「如何讀寫漢文的學習」。本研究以古典講習科的創設者，近代著名國學家、日本法制史學者小中村清矩的論述為核心，探究曾兼具「宇宙秩序」與「書寫實踐」雙重面向的漢文學，如何喪失其形上學的指導意義，成為工具性的讀寫能力習得，而這一變化在往後國文學與中國學的確立過程中，又帶來了哪些決定性的影響。

‘Stillborn’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 Lifeblood: Ueda Kazutoshi and the Life-and-Death Dialectic Between Japanese Language as “Orality” and Chinese Language as “Writing”

Zahid Daudjee (PhD Candidate,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摘要

Following imperial Japan’s victory over Qing China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the role of literary Sinitic in the Japanese linguistic ecosystem was subjected to rapid re-ontologization, prompting new epistemologies which saw Chinese characters as metonymic of the Qing state itself. One of the earliest proponents of this standpoint was Ueda Kazutoshi (1867-1937), founder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s Kokugo kenkyūshitsu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who in a two-volume series entitled *Kokugo no tame* (“For the National Language”), published from 1895-1903, refers to Chinese characters as foreign interlopers literally ‘standing amongst’ the Japanese citizenry. While extant scholarship has often reduced this line of discourse to mere ‘anti-Chinese sentiment,’ I examine Ueda’s writings to reveal how his attempt to twin the literary Sinitic context and a defeated Qing China served to suggest that oral Japanese language was in fact ‘alive’ vis-à-vis ‘dead,’ or ‘stillborn,’ Chinese language as “writing.” Specifically, I investigate how rather than simply existing as an ethnonational ‘foreignness’ to be purged from Japanese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initic vocabulary serve an essential role for Ueda as validation of the idea that only spoken Japanese—and not its written counterpart—could embody an organic, modern national subjectivity. Finally, building on Ueda’s *Kokugogaku jikkō* (“T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 explore how this dichotomized essentialism of Chinese language as “dead” and Japanese language as “living” serves to conceal the inventedness of standard Japanese, which Ueda otherwise represents as a natural, shared, and “spoken” national heritage.

Building “New Japan”: Yukio Ozaki as a Writer in the 1880s

飛田英伸 (TOBITA Hidenobu, Part-time lecturer, Meisei University;
Part-time lecturer, Hosei University)

摘要

Yukio Ozaki (尾崎行雄, 1859-1954), today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liticians in modern Japan, worked as a journalist before his election to the First Parliament in 1890. One of his noteworthy achievements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e production of a novel titled *Shin-Nihon* (新日本), namely, “New Japan,” published from 1886 to 1887. Although it was discontinued due to his banishment from Tokyo under the Safety Preservation Law (保安條例), the work written in kundoku style (訓讀體) strongly shows his intention to create a new nation by becoming independent of the traditional order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m he called *sho-nen* (少年).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thought for the newness of Japa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distinction from China was the major concern,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advocacy of war against it. Here, we can see the tie between the use of kundoku style, which became Japanese standard in place of Literary Sinitic, and his idea of “New Japan,” which must be distinguishable from China. In the presentation, I am going to focus on how Ozaki placed himself as a writer in the literary field which had a long connection with Literary Sinitic and demonstrate what role kundoku style played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riters and writing, as well as of a nation-state.

日治初期臺灣傳統戲劇中的漢文脈語聲與觀眾聽覺

林芳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以日治初期臺灣傳統戲劇的實踐與相關討論為切入點，嘗試探討戲劇文化如何可能成為將非識字觀眾納入漢文脈的聽覺裝置。當文人以書寫淡化了地域差異，而在音聲層面，漢文脈透過日常口語的「差異」表演性來彰顯其文化價值，系統化地促使對語言邊界的理解轉化為美學風格的標誌。這也讓傳統戲劇得以跨越方言或語言地流動，即使當地觀眾在語言上難以完全理解。傳統戲劇展演這種基於聽覺美學而非語言的文化歸屬感，呈現了日治初期漢帝國文化邏輯的延續，並與明治日本轉進殖民時期，強調言文一致、重視口語表達的「聲音」型帝國產生拉扯。

個人組主題

4.8 海洋知識與邊疆視野：明清臺閩政治、文化與視覺實踐

議題說明

清代鳳山縣令宋永清渡海來臺經驗及其 「海外」／「海國」話語

王建國（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康熙 43 年（1704），宋永清（1664？-？）來臺擔任鳳山縣令（曾兩度兼署諸羅縣），著有《谿翁詩草》二卷，內容充分反映其來臺宦遊心理與情志，乃目前學界所罕見暨討論者。尤其，宋永清從廈門啟碇來臺，一路留下相關渡海詩作，抵臺之後，續書寫「海國」經驗／「海外」宦情，一定程度上，具有揭蘋清初宦遊來臺文人渡海見聞與仕宦心境之重要意義。本文將由知人論世觀點及作品細讀方式，梳理其詩中呈現海洋的多重層次——既是閻關險阻之地，亦是跨越疆界的的文化通道，進而展現清初文人從中原視角觀看「海上臺灣」——從海外到海內——的獨特視域。

當牧師拿起相機：馬偕牧師北臺灣傳教攝影史（1872–1900）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本文透過馬偕日記考察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牧師十九世紀末在北臺灣傳教期間的攝影活動，這些攝影活動包括馬偕牧師自己以及其他同僚的攝影活動。馬偕牧師似乎有意識地在日記裡記錄拍攝照片之事（「相機」（camera）、「攝影」（photo、photograph）、「照片」（photos）、「圖片」（picture）、「幻燈片」（Magic Lantern）等），留下很多詳細的攝影活動記錄。這些攝影活動，一方面是傳教攝影，建構傳教社群認同也見證福音傳播，回覆母國教會教徒支援。另方面馬偕的攝影記錄了北臺灣的環境、社會與族群影像。馬偕攝影史與西方傳教士中國攝影史比較，有共同點也有地方特色。

關鍵字：馬偕牧師、普世福音、傳教攝影、臺灣、社群

清代台灣郵驛體系的發展及其效用

牟立邦（南京郵電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摘要

本文以清代官方檔案奏摺、上諭為核心史料，結合地方碑文、輿圖、福建方志等，重新詮釋台灣郵驛體系的演變歷程，剖析清帝國對台的治理策略及其郵驛效果。由於台灣地理及地域的特殊性，使得郵驛體系的發展，有別於關內各省區域，包含對台灣原住民「麻達」的運用，川溪渡口規章的確立，牛隻推廣與道路建設，形成「無驛之驛」特殊運作機制；而清代台灣郵驛網絡的擴張並非單純因應行政需求，更與民變平定、災荒救濟等突發事件密切相關，反映清廷「以變促建」的邊疆治理模式。最後，本文借由台灣進貢案例，分析臺閩驛路與京城驛遞的時空效率。

臺灣史上的喀爾吉善時代：番界政策、官僚體制與十八世紀中葉政治文化的轉向

黃宥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清帝國任期最長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為核心，探討十八世紀中葉臺灣在番界政策實踐過程中政治文化的變化。喀爾吉善為滿洲正黃旗人，於 1746 至 1757 年（乾隆 11 至 22 年）出任閩浙總督。其任內諸多政務措施，標誌著臺灣治理課題與政治文化正在轉變。臺灣在此期間首次完成實體番界繪製，並在後續的清釐過程中，番界逐漸成為政治攻防的議題。隨著政務推動，巡臺御史失去皇帝的信任，而總督等省級官員則強化對地方人事的掌握。本文指出，臺灣的政務變化反映帝國正在摸索新的地方政務模式。而喀爾吉善在位時期，可視為臺灣政治史的重要轉型階段。

縉紳互殊：晚明泉州士紳政治與海疆政策

王威（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晚明泉州沿海之國家政策深受社會環境影響，其制定、推行和變動在在與地方社會、政治等因素緊密相關。本文以泉州士紳群體為核心，探討其內部差異如何形塑海疆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指出地方政治力量在邊疆治理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文章以先後發生的兩起軍政變動，亦即浯寨移設和安平設縣，具體討論泉州晉江縣士紳在晚明泉州的關鍵角色及其影響。本文首先嘗試以主導浯嶼水寨移設官員之人際網絡和經歷指出，泉州府晉江縣士紳除了彼此往來緊密外，其人際交流也延伸到中央官場，與當時朝中要員多有來往。這一實力基礎得以讓他們決定將地方軍事設施設置在泉州府城附近。其次，泉州晉江縣士紳並非單一整體，其內部因地域發展亦在晚明出現差異。具體而言，安平鎮士紳雖在經濟發展下，開始以安平設縣之方式尋求自身城鎮行政地位，卻在競逐過程中，為晉江縣等地士紳所阻撓。最後，本文也嘗試從地方社會經濟環境之脈絡出發，指出晉江縣士紳等地方勢力競逐軍事設施的背後考量，可能牽涉到地方如何在國家有限的貿易政策下，尋求擴大商業活動之機制。綜合言之，晚明泉州海疆政策的變動，並非單純肇因於自上而下的戰略和秩序考量，而是國家制度與地方勢力互動後的折衝結果。

論文組主題

4.9 近代東亞經世致用思想的裂變、重構與知識論述

議題說明

明清鼎革與近代西潮衝擊，皆對東亞知識分子的經世致用思想產生裂變、重構與跨境傳播，並在不同歷史脈絡下展現多樣發展。本群組的四篇論文將分別透過陳確、魏源、鄭觀應與近代朝鮮知識人的思想論述，探討經世思想如何因應政治變革與國際局勢變遷。同時，藉由文學與史學的跨域對話，挖掘經世致用觀念如何在文學性表達與史學書寫中交錯呈現，並透過文史整合的分析視角，更加全面理解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歷史經驗與文化資源回應現實危機，以重構其思想脈絡與改革想像。

陳確作為明遺民，面對亡國之痛，選擇以「盡孝」之名隱忍苟活，與師友的殉節之舉形成對比。他的選擇開啟了關於「隱」與「仕」是否皆可實踐經世致用的討論，並使「孝」不僅成為個人倫理抉擇的依據，更可能成為一種經世致用的理論基礎。這種內在矛盾讓魏源嘗試透過黃老思想的靈活變通，回應時勢變遷，並在《老子本義》與《海國圖志》中，綜合傳統經學與西方技術治理，發展出兼具中國歷史觀與全球視野的改革思維。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進一步將經世致用思想落實為制度改革的藍圖。他透過「道」與「器」的結合，提出涵蓋經濟、軍事與行政的改革綱領，力求經世致用的理念能真正落實於制度變革。相較於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鄭觀應更關注制度設計的細節，力求經世理念與國情需求相契合。與此同時，近代朝鮮知識人以域外視野對清朝進行多層次的觀察與評價。部分知識人仍承襲儒家文化圈的價值觀，對清朝抱持尊重立場；然而，也有知識人受日本明治維新影響，認為清朝改革不力，應為朝鮮引以為鑑。這種對清朝的多重認知，不僅映照出朝鮮內部對改革與外交的不同立場，也突顯了清末經世思想在東亞區域內的傳播與影響。

綜觀而言，經世致用思想並非靜態不變，而是隨著政治局勢與

國際環境的變遷，不斷地被詮釋與發展。無論是個人選擇與家國責任的辯證，抑或是傳統經學與西方技術的結合，皆顯示出知識分子努力在變動的時代尋求經世致用的實踐路徑。這一思想不僅影響中國內部的改革思維，更透過跨境交流，促成東亞各國在面對西方挑戰時的知識對話與政治應對。

明遺民經世致用思想的斷裂與重構——試論陳確「孝」觀的兩個面向

施盈佑（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在明清鼎革之後，陳確以「盡孝」為由，苟活於清朝政權之下，既有別其師劉宗周的絕食而亡，亦異於同門學友祝淵的自縊殉國。「盡孝」乃是從政治回歸親族，是否還有經世致用？何冠彪曾言陳確「隱忍苟活」的不死意義，應當在「經世與延續文化」，顯然認定仍有經世致用的儒者思維。因此，本文試圖從陳確的「孝」觀，爬梳其經世致用的思維方式，意即「盡孝」、「隱忍苟活」及「經世致用」之間，究竟如何串接？「盡孝」只是苟活的藉口，而與經世致用斷裂？或者重構另一種經世致用的樣貌？

關鍵詞：孝、重構、陳確、經世致用、斷裂

魏源經世思想探蹟——以黃老思想為路徑的考察

黃麗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編制外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主以「黃老」思想為路徑，探究魏源（1794-1857）之學術宗旨；魏源特別推崇西漢時期的老學，一再申明老子為「救世之書」，並主張「藥無偏勝，對症為功」，是以本文之寫作，以魏源早期註解之《老子本義》與晚年寫就之〈論老子〉為基礎，輔以《詩古微》、《書古微》、《海國圖志》、《默觚》等著作為證，探蹟其襲用王弼「本末體用」之天道架構，結合氣化遞嬗、質文遞以救弊之史觀，進而推闡出因時制宜、任勢自變之治世理念，期以此文釐清魏氏「通經致用」、「通子致用」以至「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發展脈絡。

鄭觀應《盛世危言》的「經世致用」思想 詮構——以〈通論・道器〉為探究主軸論 述

鄭栢彰（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從鄭觀應《盛世危言》十四卷本至八卷本的篇章目錄當中，明顯可見鄭氏將「富國」、「開源」、「強兵」、「節流」的分類，轉成「通論」、「禮政」、「吏政」、「戶政」、「兵政」、「工政」之架構，筆者嘗試聚焦於其「道」與「器」的理念認知為探究主軸，然後檢視其如何落實於八卷本所論制度實務，從中抉發其「經世」理念與「致用」制度相互接榫之改革構思，進而釐清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定位。如此，則可辨別其與清末洋務運動所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根本差異，觀察出同樣強調「中體西用」的概念下，晚清知識分子所呈現不同的改革思路。

近代朝鮮知識人的跨境交流及其對清評述 ——以《皇城新聞》為核心的討論

唐屹軒（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近代東亞面臨西方衝擊，各國知識人透過跨境交流尋求思想啟蒙與國家改革之道。朝鮮知識人作為東亞思想交流網絡中的重要成員，積極參與對清朝與日本的考察與評論。《皇城新聞》作為大韓帝國時期的重要媒體平台，記錄了朝鮮知識人對清朝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觀察與評價，並反映了其對東亞國際秩序的認識與主張。本文透過分析《皇城新聞》相關報導，探討近代朝鮮知識人在跨境交流過程中對清朝的多層次論述。首先，朝鮮知識人透過遊歷清朝，直接觀察其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並在《皇城新聞》中發表評論，表達對清朝內部動向的關注。其次，部分知識人受日本明治維新影響，將清朝視為改革不力的反面教材，認為朝鮮應避免步其後塵，強調自主改革的重要性。然而，也有知識人基於儒家文化圈的傳統，對清朝仍抱持一定的尊重，並主張應與清朝保持穩定關係，以維持東亞秩序。透過《皇城新聞》中的論述可見，近代朝鮮知識人對清朝的評價不僅具有多元性，亦反映出朝鮮內部不同派別在外交與改革路線上的分歧。此一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近代東亞知識人的跨境交流模式，更可深化對朝鮮知識界如何看待清朝衰落及東亞秩序變遷的認識。

關鍵詞：朝鮮知識人、《皇城新聞》、跨境交流、清朝評述

論文組主題

4.10 聖俗合流：清季以來四川的學術、宗教思想與社會變遷之調適

議題說明

清季以來的四川由於地緣因素，成為聖俗思想交錯、相互調適的重要場域，也表現出與其獨特的風貌。我們群組的四篇文章，從清中末葉以來蜀地知名學者的經學、史學、三教觀念及民間宗教的方向入手，探討地方知識界與社會在變遷中如何交融，以及與國家的主流思潮對話中，重塑自身的思想、信仰與文化。

林書漢從槐軒學派暨「劉門教」祖師劉沅所著的《十三經恒解》文本出發，探討其中如何嫁接釋道思想詮釋儒家經典。這種跳脫傳統註解、會通聖俗的方式，也使經典更融入民間信仰且提升了活力。葉斐理的文章，首先聚焦於劉咸炘如何運用章學誠的史德觀念批判科學化史學；其次分析他在前述基礎上發展的循環史觀、「風」之概念，以與主流的線性史觀對話。這過程體現了近代四川學人胸懷著更多傳統文化信念的特色。延易橋從四川的扶乩文本宣揚的“劫數”及“救劫”論述入手，探討四川地方菁英救劫觀念的形塑；以及面對國家存亡之際，這些菁英的救劫觀又如何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深入進而發生轉變。魏綵瑩的文章，指出四川長期有著以民間信仰雜揉儒學的風氣，但張之洞創成都尊經書院則力排此風，高揚漢學。宋育仁受其影響，調適三教為「同歸而殊途」，三教雖同源於天道，但惟有儒教的禮法制度才是人間道的救世方針。

綜觀以上的論文，將呈現四川地方的知識與精神信仰結構如何交會融合，同時思考聖與俗、菁英與平民，以及地方和國家思想文化大潮流間的互動。

劉沅《十三經恒解》「會通」聖俗思想研究

林書漢（臺北市城市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分從幾個方向探討劉沅《十三經恒解》如何以「會通」聖俗方式樹立儒家思想要義。第一，會通三教思想，以巧妙嫁接釋道與儒學思想解釋經典。第二，會通前人注疏，跳脫漢宋學家解經藩籬，透過略取改寫前人之說，以及貫解、附解方式勾勒經典恒義，直求聖學本質。第三，會通聖俗，由俗入聖。揭示劉沅「聖人」思想的世俗性表現，以俗豁教，由俗入聖。並進一步彰顯「君／民」、「聖／俗」依存轉化關係，以及兩者內在衝突所形成的解釋新貌。筆者以為雖然以世俗化詮解經典無形間削弱經典樹立之聖賢標旨，但同時也提供了經學進入民間成為聖學普遍信仰的活力契機。

Liu Xianxin's Reinterpretation of Zhang Xuecheng and His Critique of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

Felix Erdt (葉斐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在二十世紀，學界越來越多人關注章學誠，許多學者強調其史學思想中與現代史學術相契合之處。而來自四川的學者劉咸炘（1897–1932），則提供了與這一詮釋不同的視角。他進一步發展了章的歷史思想，用以批判當代史學的主流趨勢。本文將聚焦於兩個重點。首先，探討劉咸炘如何運用章學誠所強調的史家道德，來批判現代科學化史學；其次，分析他如何進一步發展具有循環性與雙極性質的「風」之概念，以否定線性且持續進步的歷史觀。通過探討劉咸炘對章的史學、宋學與巴蜀學融合的理論架構。

同歸而殊途：宋育仁的宗教觀

魏綵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摘要

張之洞於成都創辦尊經書院，一大原因即是想轉變四川長期以三教為根基的民間信仰雜揉儒家的學風，代之以漢學的正統。這影響表現在宋育仁的思想上。宋氏強調三教「同歸而殊途」，佛、道雖能提高人格，終究以出世為宗，不能持世。對於近代不少人提倡三教合一，鼓吹修德轉移國家氣運，宋氏視此為消極的空言勸善。尤其自稱道教者未必能符合老子之「道」，例如專主齋醮、喜談神仙，或以扶乩預言劫變等行為皆不可取。惟有儒教的禮法制度才是人道方針，能化現世苦海為極樂。本文以宋育仁為例，彰顯尊經書院對四川知識分子三教觀的影響，及其看待近代中國三教、五教合一思潮所表現的特殊性。

從【庚子救劫】到【挽回國運】：清末以降 四川地方菁英救劫觀念的形塑與演變

延易橋（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

道光庚子年間，關帝在四川定遠縣龍女寺飛鸞闡教，教化世人行善救劫。太平天國戰事平定，庚子救劫一事，隨著各地鸞壇結社，善書流布，逐漸從西南地區擴散開來，清末民初之際，儼然已蔚為成風。本文以庚子救劫乃至中日戰爭期間救國運動為敘述軸線，從扶乩文本中宣揚的【三期末劫】【三相代天宣化】等“劫數”以及“救劫”論述入手，具體探討清末以降四川善書文本如何形塑四川地方菁英的救劫觀念，以及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四川地方菁英的救劫觀又如何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深入進而發生轉變。

論文組主題

4.11 古跡新尋：運用數位人文與機器學習研究明清大型資料集

議題說明

數位人文學者們已逐漸運用機器學習與大型語言模型，掌握不斷積累的數位化材料。對研究明清文史的學者而言，大量新工具與資料的出現，使我們得以回答許多新舊問題。本組四篇論文從兩組致力開發新工具的計畫中誕生，分別探問明清文史研究中的根本問題。第一項研究計畫由呂立亭與李友仁發起，試圖創建新的機器學習流程，以偵測前現代中國大量文獻中的雕版復用情形，進而研究李漁的作品。此時期之著作時常重複利用早期文本，然而，鮮有研究關注此類挪用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實際的印刷媒介：雕版。結合光學文字辨識技術與圖像相似度指標，並應用於此時期印刷物的高品質掃描上，我們希望追蹤包含李漁創作在內的雕版，是如何在之後的印刷作品中被混合重製與挪用。第二組計畫的兩篇論文以數位方法研究明清物質基礎設施的長時段變化。席王知運用大型語言模型，自動標註橋梁、道路與城牆的碑記資料，建立結構化、階層式的資料集供進一步之時空分析。毛元亨則透過 X-MARKUS 平臺分析經數位標註的道路碑記，以可視化方法及地理資訊系統探索四川、福建與山東道路興修中季節、參與者、動機、物資等多要素的關聯。兩文展現數位方法在細緻標註與跨區域比較研究中的效率與潛力。

帝制晚期數位化文獻集中雕版復用的探測 自動化 (Automating the detection of re-used woodblock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digitized corpora)

Paul Vierthaler (李友仁,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Data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摘要

鑑於對早期文獻復用是明清文學的重要基礎，如何偵測復用文本便是研究之重。學者們已研發出諸多能於大型數位化文集中追蹤復用文本的方法，然而，雕版既為早期印刷的主要方式，若能偵測出雕版實際上被復用之情形，亦能裨益此類研究。我將介紹數種以機器學習為主的方法，用以在大型圖像型文集中偵測雕版實際復用的痕跡，期望發展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方法，增進對李漁作品全貌的理解。我將比較兩種方式，進而識別出對此問題更有效的途徑。一，以光學文字辨識流程偵測文本同質性高的雕版印刷品；二，使用圖像相似性演算法偵測非文字面的相似處。

印刷作為「多元行動者系統」：以李漁 (1610–1680) 為例 (Print as Multiagential Medium: The Case of Li Yu (1610–1680))

Tina Lu (呂立亭，Professor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Yale University)

摘要

所謂明清文學，時常是對既有文本的刪改與選擇。透過文本分析，學者們將此現象視為以編輯與作者為主的編纂實踐，其侷限多源於創意或商業考量。然而，我們亦可以木刻版來理解明清文學，其成果或許更多來自木刻版固有的需求，如：保持版型，抑或必須在原有刻板內進行校訂。本研究關注李漁，其作品有諸多相互引用之詞句，甚至將整部劇作稍事整理後便再次出版。透過數位技術分析書籍生產的實際單位：書頁，我將比較李漁不同作品的木刻版版本，進而追問：刻版是否重複利用？書頁是否被保留等問題，以此將書籍理解為「多元行動者」系統下的產物。

基礎建設的季節要素：以明清四川、福建與山東道路碑記所見工程協商為例

(Seasons of Infrastructur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Negotiating Roadwork in the Sichuan, Fujian, and Shandong Regions)

毛元亨（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在明清道路興修中，季節扮演要角。首先，季節決定施工環境。其次，季節對應農時，牽動建設所需勞力與物資供應。再者，隨時節不同，政府施政要務有別，影響對建設的關注。最後，建設推動有賴地方社會參與，但諸社會精英的投入意願也因時節而異。諸因素相互作用下，各地官、民對道路工程的協商，遂與季節相扣，有因地分殊的發展。本研究以數位標註之四川、福建與山東道路碑記為資料集，藉 X-MARKUS 平臺分析道路興修中季節與前述要素的聯動。此研究指出，道路建設除了顯示政府力量的局限，也體現中央統制和地方現實間的矛盾。

數位視野下的明清基礎建設：城牆、道路、橋梁碑記文本的長時段分析（Longue-durée Digital Analysis of Infrastructure Ev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History）

席王知（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生）

摘要

數位技術的發展，為研究者整合、分析史料提供便利。本文以明清方志所收錄數百篇城牆、道路、橋梁碑記為例，探究基礎建設的營建、毀壞、修繕及工程失敗。透過大型語言模型（LLMs），擷取文本中的時空座標、社會參與者、因果脈絡、建材工法與勞力耗資，轉化為結構化、階層式資料集。結合時空視覺化與量化分析方法，呈現明清時期基礎建設的變遷與地域分異。本文亦展示一套數位研究路徑，史學研究者可依需求，自定義分析實體、關係以及事件結構，以低人工標註成本，從大量史料中有效擷取關鍵內容。

論文組主題

4.12 明清思想文化研究的數字化轉型：方法創新與多維整合探索

議題說明

在數位人文技術深度介入的學術語境下，明清思想文化研究正經歷從經驗闡釋到資料驅動的範式革新。本次討論群組聚焦三組研究，深入探討相關技術如何重塑研究方法，實現文本深度解構與多維資訊整合。

王安琪關於戴震哲學文本的研究，構建了“人機協同”的考據學新框架，突破了傳統注疏的主觀性局限，為考據研究提供了可量化的語義分析模型。戰蓓蓓對明清書院文獻的研究則整合文本挖掘與社會網路分析方法，為教育史研究開闢了“差異-關聯”雙重維度的分析路徑。胡明輝主持的《皇朝禮器圖式》數位化項目，實現了傳統禮學研究中文本分析、視覺研究與文化物質史的數字橋接，推動了從文獻整理到知識網路建構的範式轉型。討論群組主席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則長期致力於推進的道教文本語料庫與人物關係網絡建設。

討論群組共用方法論內核——即通過數智技術，提升文本處理的精度（如隱性引文識別、情感傾向分析），及賦予研究者整合多重資訊的能力（如社會網路視覺化、跨模態知識推理），為理解明清思想文化的生成、傳播與演變提供了新的分析維度。本討論群組期待通過跨案例的方法論對話，探索如何在保持人文研究質性特徵的同時，構建兼具技術理性與解釋深度的數位學術體系。

人機協同下的考據學研究——以戴震思想 為例

王安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闡釋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

戴震的反理學思想是清代思想史上頗受爭議的議題，從清末民初的顏李說、惠棟說到理學反動說、西學影響說，乃至近年的乾隆影響說。學者們各執一詞，卻無法相互說服。本研究以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為核心，基於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基礎，對戴震義理學論著進行自動分詞、實體識別，再依據戴震的考據學原則，對文本中的詞、句進行聚類，系統分析其引文溯源策略及哲學體系建構邏輯。研究聚焦戴震如何通過批判性引用、經典重建與考據支撐，在解構宋明理學的同時重構儒學核心概念（“理”“性”“道”）。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明清書院研究：差異與 關聯的雙重維度

戰蓓蓓（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綜合運用文本挖掘與社會網絡分析兩種數位人文方法，深度剖析明清書院史料。借助文本挖掘技術，針對書院學規與章程開展詞頻統計、LDA 主題模型分析，精准提煉高頻關鍵字，明確文本主題，細緻比較不同地域學規與章程的差異，清晰展現其在教育思想、管理模式方面的地域特色。同時，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構建書院教育與管理理念關係網絡，剖析其相互影響和變化模式，結合人物關係深入探究。文本挖掘提供差異資訊，社會網絡分析呈現關係脈絡，二者互補為明清書院研究提供新視角和依據。

A New Generalized Approach to Nominative Record Linkage for Historical Chinese Sources

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 Chair Profess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KUST)
虞越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

摘要

We review the challenges to automated record linkage for individuals recorded in historical Chinese sources and then report on our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eneralized, scalable approach to record linkage that addresses these challenges. New approaches to record linkage are needed because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large databases constructed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requires new techniques. Existing databases like the CGED-Q JSL and CBDB already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and other transcription projects that use OCR and AI may yield information on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Manual or automated record linkage with current ad hoc techniques will not be sufficient. For Western sources written in phonetic alphabets, new techniques for automated disambiguation of names and other attributes written in phonetic alphabets been used to construct of life histories of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by linkage of decennial censuses and other sources. Such techniques do not work for names writte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they are not phonetic. Exact matching of character strings is not adequate becaus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original source or errors during transcription may result in characters being replaced with ones that look nearly identical but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eaning. To address this, we present a novel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stroke-based character embeddings for efficient blocking,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with active learning for record matching, and graph-based clustering for final linkage. We demonstrate its effectiveness using the career records of officials in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Jinshenlu* (CGED-Q JSL) as a test case.

「202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名單

一、開幕致詞貴賓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議程學者（發表人 / 主持人 / 評論人）

1. Caitlin Karyadi (香港大學藝術史系助理教授)
2. 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 Chair Profess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KUST)
3. Elena Gessler (高蓮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4. Elisabeth Kaske (白莎, 德國萊比錫大學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5. Felix Erdt (葉斐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6. Francis Newman (牛法鑫,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7. Henning von Mirbach (米翰寧,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8. Immanuel Spaar (石善也, 德國烏茲堡大學哲學系講師)
9. Jacqueline Armijo (艾敏慧,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fghanistan)
10. James Bonk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ollege of Wooster, East Asian Studies)
11. James Masaki Fujitani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12. Kevin Kind (童楷文,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13. Lei Xue (薛磊,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rt Histor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14. Lianming Wang (王廉明,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5. Michael Szonyi (宋怡明,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和歷史系教授)
16. NGUYEN QUOC SINH (阮國生, 越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7. Nguyễn Thanh Tùng (阮青松,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Philology,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18. NGUYEN TIEN LAP (阮進立, 越南文郎大學外語系助理教授)
19. Paul Vierthaler (李友仁,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Data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 20. Peter Ditmanson (戴彼得,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教授)
 - 21. Qijun Zheng (鄭麒駿, 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生)
 - 22. Tina Lu (呂立亭,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Yale University)
 - 23. Trần Thị Xuân (陳氏春,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24. Trịnh Thuỷ Dương (鄭垂楊, Lecturer at Faculty of Philology,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 25.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Research professor, EPHE)
 - 26. Yeohoon Choi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Myongji University)
 - 27. Zach Berge-Becker (Postdoctoral Fellow,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28. Zahid Daudjee (PhD Candidate,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 29. 元勢進 (Won Sejin, Ph.D. Candidat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 30. 孔令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 31. 尹敏志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 32. 毛元亭 (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博士後研究員)
 - 33. 毛文芳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34. 毛瀟銳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 35. 王晶 (愛丁堡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 36. 王薈 (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 37. 王士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人文講座專任研究助理)
 - 38. 王永曦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39. 王兆珅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講師)
 - 40. 王安琪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闡釋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41. 王威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42. 王建國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 43. 王晴佳 (Q. Edward Wang,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 44. 王敬雅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 45. 王爾馨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 46.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47. 王藝霏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研究生)
 - 48. 丘文豪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49. 申正秀 (Shin, Jeongsoo, Associate Professor, Major of Korean Cultural Studies,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50. 吉川和希 (YOSHIKAWA Kazuki, 關西大學副教授)
51. 多賀良寬 (TAGA Yoshihiro,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aka)
52. 戎宗柳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53. 朱文祺 (香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54. 朱雯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55. 朴敏洙 (Min-Su PARK, 梨花女子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科副教授)
56. 朴慧美 (Park, Haemi, Ph.D Candidat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57. 朴贊根 (Park, Changuen, 延世大學歷史文化學系講師)
58. 江豐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59. 牟立邦 (南京郵電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60. 衣若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61. 何幸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62. 何淑宜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63. 余 璐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師)
64. 吳志廉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65. 吳佳鴻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66. 吳昌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學生)
67. 吳挺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68. 吳瑾暉 (Jinhui Wu,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69. 吳曉芳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
70. 吳靜芳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71.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72. 呂柏勳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73.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74. 李子怡 (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候選人)
75. 李仁淵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76. 李在璟 (Lee, Jaeky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Kookmin University)
77. 李典蓉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
78. 李承洙 (Lee, Seungsuh, 韓國明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教授)
79. 李招瑩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80. 李昊玥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博士生)
81. 李東峯 (Lee, Dongkook, 韓國京畿道博物館館長)

82. 李 紀 (香港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83. 李 剛 (Li Gang, Research Associate, Erlangen Centre for Islam and Law in Europe)
84. 李朝凱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85. 李華彥 (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86. 李爾岑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87.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88. 汪一舟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89. 阮寶玉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90. 周敘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
91. 周鶴群 (成均館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92. 延易橋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候選人)
93. 杭 行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教授)
94. 松尾健司 (MATSUO Kenji,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生)
95. 林月惠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96. 林正慧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97. 林志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98. 林和君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約聘副教授)
99. 林宜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100. 林芳如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01. 林峻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102. 林書漢 (臺北市城市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03. 林素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104. 邱嘉耀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05. 邱澎生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106. 金雄鶴 (首爾大學歷史學部博士生)
107. 金蕙涵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8. 施天宇 (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109. 施盈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10. 柳雨青 (Yuqing Liu, 愛丁堡大學亞洲研究系助理教授)
111. 胡中原 (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
112.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13. 飛田英伸 (TOBITA Hidenobu, Part-time lecturer, Meisei University; Part-time lecturer, Hosei University)
114. 唐立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15. 唐屹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16. 唐雨薇 (南京林業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117. 席王知（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生）
118. 徐小潔（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
119. 徐兆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20. 徐雅容（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
121. 徐源翊（Seo Wonik，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122. 徐寧（香港大學博士生）
123. 徐維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24. 時舒陽（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25. 高志祥（清華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126. 高瑞迎（Ruiying Gao, Assistant Professor, Wake Forest University）
127. 高蓮姬（Kho, Younhee，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副教授）
128. 問曉敏（PhD, Art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29. 崔文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130. 張一帆（Yifan Zh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Scholar, Heyman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131. 張素卿（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32. 張壹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33. 張閨熙（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約聘助理教授）
134. 張樂翔（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135. 張歡歡（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
136. 曹鈞傑（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比較文學系博士生與英文系講師）
137. 曹競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138. 梁鈺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歷史系博士生）
139. 梁樹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140. 盛亦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141. 莊民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42. 莊鎮元（Chen-yuan David Chuang，美國芝加哥大學藝術史博士生）
143. 許富翔（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144. 許暉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45. 許維萍（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46. 連超（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47. 郭至汶（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148. 郭勘（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
149. 陳子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150. 陳丹丹（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歷史地理政治系副教授）
151. 陳玉女（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152. 陳秀芬（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53. 陳威睿（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154. 陳室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155.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56. 陳建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157. 陳柏言（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58.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59.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60. 陳熙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61. 陳 謄（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162. 堯育飛（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
163. 曾雙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64. 溫海波（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65. 游閔雅（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資訊室助理研究員）
166. 程雪茹（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博士生）
167. 賀廣如（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68. 黃羽璿（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69. 黃奕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研究型碩士）
170. 黃宥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71. 黃郁晴（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約聘助理教授）
172. 黃庭彰（Wong Ting Cheung, PhD Candidate, Binghamton University）
173. 黃悅行（Wong Yuet Heng,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174. 黃康妮（南加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175. 黃聖修（泉州師範學院文傳學院歷史系教授）
176. 黃慧智（Hwang Hyej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77. 黃麗頻（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編制外專任助理教授）
178. 楊 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179. 楊 煥（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180. 楊中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181. 楊佳玲（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of Art,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82. 楊雅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83. 楊聖宇（香港中文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184. 葉宇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與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185. 葉倬瑋（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186. 葉詩詩（Yap Sze Sze,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
187. 董思思（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講師）
188. 虞 越（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生）
189. 賈建飛（山西財經大學晉商研究院副研究員）

190. 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191. 廖子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92. 廖小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93. 廖晏顥（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194. 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195. 裴嘯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96. 齊汝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97. 劉 瑋 (Jeffrey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198. 劉世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199. 劉伊芳（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助理教授）
200.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201. 劉怡青（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副教授）
202. 劉柏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203. 劉柏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204.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205. 劉德明（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儒學研究中心主任）
206. 劉錡豫（專欄作家，獨立研究者）
207. 劉瓊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8. 樊夢瑩 (Meng Ying F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9. 蔡仲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210. 蔡名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博士級約聘人員）
211. 蔡松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212. 蔡偉傑（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13. 鄭相元 (Jung, Sangwon, Ph.D. Candidat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14. 鄭相浩 (Jeong, Sangho , 韓國東國大學文化學術院研究教授)
215. 鄭栢彰（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16. 鄭博元 (Po-Yuan Cheng, Doctoral Student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17. 鄭竣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218. 鄭雅尹（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219. 鄭雯馨（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220. 戰蓓蓓（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副教授）
221. 盧樹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22. 蕭麗玲 (Li-ling 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C-Chapel Hill)
223. 賴建誠（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224. 賴惠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25. 賴毓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26. 謝仁晏（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227. 謝忠志（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副教授）
228. 鍾恩瀚（Chung Yan Hon，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229. 齋藤希史（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230. 瞿 見（中國農業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231. 魏綵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232. 羅秀美（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233. 羅珮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級研究人員）
234. 羅淳滄（康乃爾大學博士生）
235. 羅臻輝（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講師）
236. 關文昊（Wenhao Guan，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37. 嚴志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202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般與會學者

1. Choi, Sujung (Graduate studen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n history Doctor Course)
2. Robert Lee (RDI MGR, Lemanns Eng Inc.)
3. Røger T Lee A. (IRC SR.MGR, Lemanns Eng Inc.)
4. Sally Yu Leung (Tracing Patterns Foundation 研究員)
5. 刁亦柔 (堪薩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生)
6. 王正華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系副教授)
7. 王任君 (唐獎教育基金會漢學獎秘書)
8. 王羿涵 (南京大學哲學學院碩士生)
9. 王喬慈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0. 王誠御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11. 王維瀚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12. 王議靚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3. 王馨卓 (復旦大學碩士生)
14. 可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交換生)
15. 左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16. 向希子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17. 江佩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8. 何君霖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19. 何影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20. 吳月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史系博士生)
21. 吳玉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志工)
22. 吳秀玲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館員)
23. 吳宜真 (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24. 吳政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25. 吳智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26. 李丹雯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
27. 李天群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28. 李永玖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29. 李育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30. 李采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31. 李岱樺 (國立政治大歷史學系碩士生)
32. 李航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33. 李郡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生)

34. 李楚凝（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35. 李遠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生）
36. 杜冠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37. 沈璵（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中國藝術史博士生）
38. 邢天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39. 周小牧（廣東肇慶學院美術學院講師）
40. 林于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41. 林小涵（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42. 林介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43. 林玉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所碩士生）
44. 林芝禾（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助理研究員）
45. 林郁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46. 林祐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47. 林遠怡（南加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48. 邱于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49. 邱思慎（退休教師）
50. 洪邵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51. 洪誠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52. 紀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53. 紀淑玲（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學術主編）
54. 胡志興（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55. 胡健文（浙江外國語學院西方語言文化學院講師）
56. 胡婷（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
57. 苗芝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交換生）
58. 范姜筱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59. 范榮（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60. 唐柔瑩（美國天普大學博士候選人）
61. 夏卓浩（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交換生）
62. 夏春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交換生）
63. 徐啟文（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64. 徐惟柔（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65. 馬英豪（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66. 張文虛（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博士生）
67. 張晉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68. 張康文（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69. 張熹鵬（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生）
70. 張藝曦（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71. 曹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72. 曹希文（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73. 梁展達（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74. 梁靜法（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75. 梁羅茜（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76. 許建業（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77. 許凱翔（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專任助理）
78. 許慈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79. 許瀞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80. 郭昭吟（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81. 陳又菁（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82. 陳玉秀（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
83. 陳玉琴（國立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碩士）
84. 陳秀玲（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85. 陳怡融（首爾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碩士生）
86. 陳明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87. 陳軍甫（輔仁大學學士生）
88. 陳昕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89. 陳采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90. 陳俊靖（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91. 陳冠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92. 陳貞於（西凱企業公司助理員）
93. 陳章環（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94. 陳詠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95. 陳靖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96. 陳耀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97. 傅樂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98. 曾港秀（香港教育大學博士生）
99. 曾學杰（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00. 游勝輝（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01. 湯航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交換生）
102. 湯熠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103. 程子玥（澳門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04. 黃子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05. 黃文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06. 黃品欣（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07. 黃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108. 黃詩悅（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
109. 黃睿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

110. 黃薰緣（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111. 楊任瑜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12. 萬子菱（亞利桑那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113. 葉惠芬（國史館退休人員）
114. 董采華（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15. 廖方瑜（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16. 趙元熙（堪薩斯大學美術史系博士生）
117. 趙品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118. 趙蕙（澳門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19. 劉子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20. 劉俐君（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21. 劉若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122. 劉得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23. 劉維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124. 樊宇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125. 潘力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26. 蔡知熹（香港中文大學碩士）
127. 蔡昀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128. 蔡博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29.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130. 蔣瑜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131. 衛姿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32. 鄭雨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33. 鄭俊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34. 黎顯揚（香港大學哲學系 PPE 碩士生）
135. 賴守婉（華梵大學佛教藝術研究所碩士）
136. 薛珮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137. 謝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38. 鍾欣衡（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生）
139. 韓承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40. 顏俊秉（風澤中醫診所副院長）
141. 釋如碩（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42. 孟雨春（世新大學口語傳播與社群媒體應用學系碩士生）
143. James LEE（創顧諮商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144. 吳培珍（空中大學人文科學生）
145. Amanda Zhang（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146. 張優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生）
147. 吳頌琳（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48. 陳立偉（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49. 劉善謙（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法務專員）
150. 林鈞郁（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碩士生）
151. 樊妍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52. 梁嘉琪（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153. 郭明儀（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籌備委員會

召集人

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委員（按姓名筆劃順序）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熙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廖小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劉柏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會議執行小組

王鴻泰、巫仁恕、李貞德、林文凱、陳熙遠、黃冠閔、
雷祥麟、廖小菁、劉柏宏、劉苑如、鍾淑敏、簡金生

工作人員（按姓名筆劃順序）

方炳又、王怡文、王美雪、田依婷、吳美儀、呂建穎、李岱樺、李怡嬪、
李秋芳、孟慶華、林于婷、林百尉、林孝全、林哲銘、林祺、徐惟柔、張
仲君、張裕德、張穩蘋、梁靜法、許惠文、郭家豪、陳亮孜、陳信穎、陳
彥穎、彭靖媛、湯雅婷、黃怡真、黃建中、楊芷涵 Alice Yang、詹巧燕、
廖秋滿、蔡幸真、蔡鈞宇、蔡蓉茹、蔣宜芳、鄭涵尹、盧履彥、謝慶盈、
闕雨彤、顏頌文、羅麗芳、羅麗芳、蘇鈺茹